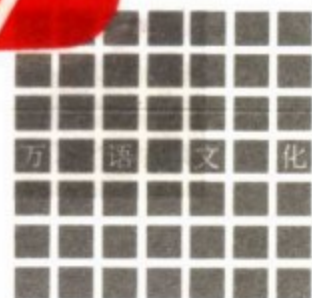


女性小传

〔西〕罗莎·蒙特罗著 王军译

当代西班牙文坛人气最旺的女作家，职业记者

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



Rosa Montero

新平知聲
PDG

《女性小传》收录了蒙特罗以纪实风格创作的十六篇西方杰出女性的传奇：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国女作家，以为妇女争取平等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而闻名；

○塞诺维娅·坎普鲁维，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妻子；

○西蒙娜·德·波伏瓦，法国女作家及女权主义者；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英国文艺事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

○阿尔玛·马勒，奥地利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

○玛丽亚·莱哈拉加，西班牙现代主义戏剧的奠基者兼作家；

○劳拉·赖丁，美国女诗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美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卫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乔治·桑，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乡村小说和风流韵事而闻名遐迩；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瑞士女作家，皈依

伊斯兰教，女扮男装游历北非；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著名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

○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西班牙天才少女，进步活动家兼作家；

○玛格丽特·米德，美国女人类学家，以研究大洋洲无文字民族而知名；

○卡密尔·克洛岱尔，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学生、合作者、模特和情妇；

○勃朗特三姐妹，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三剑客。

她们大都是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都因自己的超凡才能而付出巨大代价，都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精神折磨、贫困（即使出身富裕之家）、对抗常规、受教育权被剥夺、为世人指责或唾弃、早逝或被送入疯人院。

作者没有采用通常的传记手法，而是将传主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片段放入当时深远的时代背景中，以探索的笔触深入到这些女性的灵魂深处，反映出她们在几个世纪中为争取女性自身权利与地位所付出的努力、挣扎和牺牲。这是一部触摸人灵魂的女性精神传记。

ISBN 7-5442-2724-3



9 787544 227247 >



ISBN 7-5442-2724-3

定价： 18.00元

K818.5
5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女性小传

〔西〕罗莎·蒙特罗著 王军译

南海出版公司

新平知
和
PD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4-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小传/(西)蒙特罗著;王军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5.11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ISBN 7-5442-2724-3

I. 女... II. ①蒙... ②王... III. 女性—列传—世界—18世纪~20世纪 IV. K81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105 号

HISTORIAS DE MUJERES by ROSA MONTERO

© ROSA MONTERO, 1995

ALL RIGHTS RESERVED

NÜ XING XIAO ZHUAN

女 性 小 传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论坛·新名著主义丛书

作 者: [西] 罗莎·蒙特罗

译 者: 王 军

策 划: 万语文化

责任编辑: 杨 雯

特约编辑: 邱 红

装帧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24-3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新 知 识
PDG

● 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流

——为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而作（代总序）

陈众议

◎缘起

这套丛书是未竟的“世界文学论坛”的一个分号。它缘起于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一次学术访问。那是2000年9月，大江先生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来到北京。这是1949年以来应邀来华访问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作家徐坤的话说，“他的意义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彰显”。这显然是参照二十世纪初泰戈尔访华所留下的无形遗产而言的。大江先生在北京见到了心仪已久的莫言，并与王蒙、铁凝、余华、阎连科、徐坤等中国同行及社科院的学者和领导进行了亲切交谈并有感而发，提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文学论坛”的动议。

这套丛书便是这一动议的见证。

◎意义

人类以并不乐观的状态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利益引发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然而，相信正义、博爱与和平的人们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热忱进行着消解冲突的努力。本丛书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明证。

丛书为世界著名作家和中国读者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友好交流的平台。他们的著述将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文化不同于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它是大到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小到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某种共同的习性；这种习性，可以抽象为世界观，也可以具体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嗜好。总之，它是以有别于他人为前提的一部分人的共性。正因为这种特殊性，而且又是后天的，所以才有了不同文化间交流互补的必要和可能。实际上，不同规模的文化交流一直存在。交流是为了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平共处，而非倾轧或取代。

事实上，世界文化正是在相互了解、求同存异中不断演化、进步并形成今天这种大自然般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多彩局面的。无论情愿与否，这种局面已经形成。我们希望它的未来没有血腥，而是不同文化友好交流、健康演化、取长补短、自我完善的过程。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又注定要接受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如何保护和发展人类文化生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全世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世界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耀眼明珠，是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形态的形象反映，是各民族历史与现实、情感与意志的集中体现。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而恩格斯则认为，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人不可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却可以通过文学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文学历来并将永远成为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增进理解的桥梁。

作为编译者，我们将努力使丛书成为文学的盛宴、和平的盛宴。盛宴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近二十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将使我国读者感同身受地了解一批世界著名作家、文化名人及其斑斓的世界和关怀，而且对促进我国的文化建设也将不无裨益。

◎基数：为了拿来的甄别

话说有个印第安人居住在深山老林。一天，他有幸来到遥远的海边，看到集市上到处都在买卖舢板。于是，他也掏钱买了一条。他历尽千辛万苦把舢板带回家中，并学着海边人家的样儿把它供在房屋顶上；只不过别人屋顶上的舢板都是底儿朝天的，而他的舢板却仰面躺着。不久，天降大雨，盛满雨水的舢板压塌了房屋……这是一则古老的寓言，意思是别人的宝贝对自己未必有用，稍有不慎，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面对多元的花花世界，我们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难说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编译眼前这样一套体现多元文化的丛书有助于我们处理认知和估价、传承与创新、借鉴与自主、向背与审美的复杂关系。马克思关于席勒化的说法众所周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否定席勒的依据。马克思除了尊称席勒为“市民天性”的权威裁判，还援引席勒名言，谓“智者看不见的东西/却瞒不过童稚天真的心灵”。事实上，认识观和价值观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同样，进步和审美或者革命和美感，也是不可以划等号的。以马克思为例，他并没有因为他的价值观而影响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之，也不因为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知而动摇自己的价值判断。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而且为推翻资本主义这种剥削制度尽心竭力，但是他并不否定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他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济全球化”吗？然而，马克思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趋势而放弃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则进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正确：意识对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与此同时，文学观念和形式的演变也为我们提供了复杂的课题。以二十世纪而论，一方面，文学在形形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存在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后”宏大理论的自话自说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小说基本上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小说的形式主义倾向）。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小说变成了玄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小说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势。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然而，古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小说的起源是轻松自如的故事情节（或谓“稗官野史”），而事实上《左传》及《左传》以降的诸多史书也是中国小说的策源地（是谓“文史一家”）。其中如《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触龙说赵太后》、《蔺相如完璧归赵》以及《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众多美妙的段子，其实都可以视作最初的小说，具有小说的基本因子：故事情节。诚然，由于道统对小说的轻忽，中国小说及小说史研究起步甚晚。一如鲁迅所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且必得到二十世纪），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在西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及小说史研究也是后来的事，但古希腊人对“类小说”的重视早在亚里士多德时期便已然露出端倪。比如亚里士多德对文学（史诗、悲剧）的态度，其实已经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小说（情节）的重

视。亚里士多德视情节为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他还说“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诗学》中差不多三分之一章节是有关情节的。在悲剧的六大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依次是性格、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的，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过去的文学原理大都拿国王和王后的例子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关系，称“国王死了，两年后王后也死了”是故事，而“国王死了，深爱着他的王后便无法独自存活在这个世上，于是郁郁寡欢，最终成疾而终”则是情节。这就是说，情节是有血有肉的故事。当然，这是一种简单化诠释。倘使以《红楼梦》为例，两者的关系就比较明确了。因为，我们或可视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为故事，而家族没落与爱情悲剧则是其情节。诸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等等，在情节中逐渐演化并凸现出来。或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故事是两个世仇家族子女的爱情悲剧，而情节几乎可以说是整部作品。这样，在浪漫主义之前，情节对于文学，尤其对于戏剧、小说甚至史诗一直是精华要素，因而地位十分稳固。相形之下，主题却是后来才逐渐显露和凸现出来的。在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及其之前的文学中，主题是自然显露甚至深藏不露的。荷马史诗是行吟诗人的作品，其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是那样的淡然，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归属问题上煞费脑筋。而作品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阿基琉斯还是帕里斯，个个都是英雄。是非、善恶等价值取向尚不在诗人（或行吟诗人们）考虑的要素之中。古希腊悲剧也是如此。我们的先人却不然。他们处理文史的方式似乎比较老到。司马迁之所以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原因，固然在其修史记事的抱负，但《艺文类聚》中《悲士不遇赋》所表现的悲愤和褒贬印证了他对历史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倒确是“早熟的民族”。如今，当主题愈来愈成为诗人、作家首先考虑或急于张扬的要素时，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崇尚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首先，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小说内容的某个轮廓，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

了某些故事套路甚至于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小说仍然没有抛弃情节。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浪漫主义表现意志、宣扬观念的需要。马克思在评论席勒时，就曾称其作品为时代的“传声筒”。相对于“席勒式”，马克思自然更推崇情节的生动性和内容的丰富性完美融合的“莎士比亚化”。马克思的观点来自于他的立场和方法。他从不孤立地看问题。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思考是对人类社会，也是对肉体与灵魂这对冤家矛盾的昭示。灵与肉、“道”与“器”，人类缺其一便不成其为人类。曲为比附，文学中的主题和情节也有点像人类的灵魂与肉体，二者不可或缺。然而，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意地排斥情节、轻视情节，把情节当做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于是，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小说创作中大行其道。于是，二十世纪的许多小说仿佛专为评论家而写，成了脱离广大读者的迷宫与璇玑。虽然从文学创新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看，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可以说是一种必然。在西方，最早关注和凸现主体意识和主题思想的是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但最初的人文主义作家并没有因为强调主题而忽视情节。恰恰相反，无论是在莎士比亚还是在塞万提斯那里，情节依然是文学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受众的欢迎，他们一度受到经院作家的轻视，被冠以“通俗”。马克思从活生生的存在出发，但又不拘泥于存在本身。他像一位双脚踏入河床的巨人，在感受河水鲜活翻腾的同时，俯瞰人类文明之流从远古奔向未来。而他所选择的莎士比亚恰好是我假定的这个X（两条曲线）的交汇点。在这里，情节和主题是那么和谐、那么水乳交融。新鲜的人文思想和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和北欧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生成为美妙的情节。但这种和谐的、水乳交融的状态迅速被日益高亢的个人主义所扬弃。先是浪漫主义，后有批判现实主义。巴尔扎克等一代作家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现实）的批判如此富有力度，以至于模糊了创作主体（如保皇派和革命派）的界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在高扬的批判意识和价值取

向（或谓主题思想）背后，则是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现代建筑师般的精确图景。用昆德拉的话说，这些精确的图景、过细的谋划使原本相对自由的小说创作形式改变了方向。再后来是以“科学主义”自诩的自然主义或把主题（包括人的几乎一切内涵和外延）和形式（包括技的一切可能与界限）推向极致的现代主义以及反过来否定（颠覆）和怀疑（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些赤裸裸的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其实也是创作主体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鲜明表征，是当今世界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新自由主义便无法生成；同样，倘使不是世界进入了跨国公司时代，西方的政治家也断然没有能力发明“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时鲜谬论。盖因跨国公司不会满足于一国或几国的资源。它们当然要消解各国主权，以致其剥夺在全世界畅通无阻。总之，比起我们过去总结的现代主义成因种种（如科技进步对形式变化或技巧翻新、世界大战对文学宣言或先锋思潮，等等），跨国公司所推崇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更具有说服力吗？无论接受美学如何重视读者（其实这里的读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个人），无论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方面毫无时代意义（借镜作用）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文学（以金庸、琼瑶作品为代表）如何受到欢迎，无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审美、认知、现实意义的所谓“通俗文学”（如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怎样顽强地存活于我们这个世界，似乎都不能改变情节+主题——两条曲线所组成的这一个X。

然而，一如马克思，我们不该因为文学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呈现出这样那样的规律而放弃人文应有的作用与反作用。何况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社会中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主要缘由：为了拿来的甄别、为了借鉴的认知，即给读者一个基数，一个几经筛选的基数，一个尽量多元、多维的空间，既有西方和东方，也有新交和故人（如笔耕正健的大江先生和刚刚仙逝的桑塔格）；既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赓续，也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复归。

总之，我们以最简捷、也最深刻的方法请来了这十余位作家。希望读者在这一文学的盛宴中得到最大的欢愉和启迪。

● 译序

王 军

罗莎·蒙特罗 (Rosa Montero, 1951-) 是西班牙当代最富盛名的女作家和记者之一, 她的作品给 1975 年佛朗哥去世后的西班牙新一代人, 特别是妇女的思维方式打上了很深的烙印。1968 年蒙特罗进入马德里大学文哲系学习, 同时与独立先锋剧团“牛虻”和“卡诺”合作。第二年她决定转学到马德里新闻学院, 改学新闻专业, 并开始从事实习记者的工作。从 1976 年起蒙特罗为西班牙最大、最有影响的报纸《国家报》工作, 常年撰写专栏文章和访谈录, 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1978 年蒙特罗成为第一位获得“曼努埃尔·德尔·阿尔克采访奖” (Premio Manuel del Arco) 的女记者, 而 1995 年出版的《女性小传》 (*Historias de mujeres*) 则是她众多文集中的一部代表作。^①

蒙特罗属于西班牙战后第二代女作家。与前辈相比, 她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 从事新闻出版和文化教育工作, 文学创作是她们的第二职业。同时在创作上受欧美文学影响更大, 视野更加开阔, 女性独立意识更强。蒙特罗坦言, 新闻报道是她的职业, 而文学创作则是她的激情。身为女作家, 蒙特罗尤其关注女性作为社会实体的意识觉醒, 敢于直面现实和历史; 对妇女在男

^①蒙特罗陆续获得“全国新闻工作报道与散文奖” (Premio Nacional de Periodismo, 1980)、“采访世界奖” (Premio Mundo de Entrevista, 1987) 和“新闻奖” (Premio de Periodismo, 1993)。迄今为止她已出版了小说《失恋纪实录》 (*Crónica del desamor*, 1979)、《德尔塔功能》 (*La función Delta*, 1981)、《我将待你如女王》 (*Te trataré como a una reina*, 1983)、《颤抖》 (*Temblo*, 1990)、《美丽和阴暗》 (*Bella y oscura*, 1993)、《食人肉者的女儿》 (*La hija del Caníbal*, 1997 年“小说春天奖”)、《地狱之心》 (*El corazón del tártaro*, 2001)、《家里的疯女人》 (*La loca de la casa*, 2003); 短篇小说集《梦想的巢穴》 (*El nido de los sueños*, 1991)、《情人与敌人》 (*Amantes y enemigos*, 1998); 系列儿童文学作品《巴巴拉的野蛮行为》 (*Las barbaridades de Bárbara*, 1996)、《巴巴拉的神奇旅行》 (*El viaje fantástico de Bárbara*, 1997) 和《巴巴拉对抗科尔米瑞斯博士》 (*Bárbara contra el Doctor Colmillos*, 1998); 文集《西班牙永远给你》 (*España para ti para siempre*, 1976)、《〈国家报〉的五年》 (*Cinco años de País*, 1982)、《赤裸的生活》 (*La vida desnuda*, 1994)、《访谈录》 (*Entrevistas*, 1996) 和《激情》 (*Pasiones*, 1999) 等。

性社会的处境和地位十分敏感，对她们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持抗议立场，对传统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提出质疑。蒙特罗用笔来揭示女性的内心世界，描写或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或为得到社会承认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女性命运；重新审视旧的禁忌和神话，颠覆男性对待性别角色和性生活的传统立场。因此西班牙评论界认为“罗莎·蒙特罗代表了一种持久的、尤其是捍卫女性地位的义务。”^①

受美国流行的“新新闻”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西班牙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创作小说式的散文、纪实报告式的小说和诗歌式的宣言。小说、历史和新闻报道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难以区分各种文学体裁之间的界限。许多西班牙女作家都是从纪实文学起步的，这种写作手法对职业记者出身的蒙特罗来说驾轻就熟，《女性小传》便收录了她以纪实风格在《国家报》上发表的16篇欧美杰出女性的传记：

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 - 1976），英国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 - 1797），英国女作家，以热诚争取妇女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而闻名；塞诺维亚·坎普鲁维（1887 - 1956），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 - 1986），法国女作家及女权主义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1873 - 1938），英国文艺事业的赞助者和支持者；阿尔玛·马勒（1879 - 1964），奥地利指挥家兼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的妻子；玛丽亚·莱哈拉加（1874 - 1974），西班牙现代主义戏剧的奠基者兼作家；劳拉·赖丁（1901 - 1991），美国女诗人、评论家和散文家，对美国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前卫派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乔治·桑（1804 - 1876），法国浪漫主义女小说家，以乡村小说和风流韵事而名闻遐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1877 - 1904），瑞士女作家，皈依伊斯兰教，女扮男装游历北非（死于阿尔及利亚）；弗里达·卡洛（1907 - 1954），墨西哥超现实主义画家，著名壁画家里维拉的妻子；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1914 - 1933），西班牙天才少女，进步活动家兼作家；玛格丽特·米德（1901 - 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

^①Santos Sanz Villanueva: "Introducción a la novela", *Historia y crític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Los nuevos nombres*: 1975 - 1990, Barcelona: Crítica, 1992, p. 264.

以研究大洋洲无文字民族而知名；卡密尔·克洛岱尔（1864 - 1943），法国雕刻家，罗丹的学生、合作者、模特和情妇；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三剑客勃朗特姐妹。

蒙特罗承认，《女性小传》的选题并非遵循某一客观标准（国别、时代或名气），而完全出自她个人对这些女性人物的深刻认识和感悟。由于妇女意识的觉醒和分析很多时候是通过女性创作完成的，所以蒙特罗选择的这些传记人物都从事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工作。我们在这本书里既可以看到欧美著名的女作家、画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能遇到生活在某些伟大的男性作家、艺术家阴影下的女性（没有这些妻子默默的奉献和支持，也就没有那些男性的成功和辉煌）。她们的生活和创作比男性更艰难，充满种种磨难和不平，却比男性更坚强，更有毅力和恒心，因而同样取得骄人的成就，只是在很多时候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被冷落和遗忘。在《女性小传》中蒙特罗以女性独有的视角、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历史体验及富有激情的语言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勾勒了这些女性人物成长的心路历程，对她们的人生和创作进行了客观定位和评价，为这些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女性留下了精彩而浓重的一笔。

由于《女性小传》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上本人学疏才浅，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肯定会有差错或疏漏，恳请同仁和专家学者指正。

献给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对我来说曾经和现在都很重要的女人：献给雷耶斯、马库和加比；献给卡门和另一个卡门、奥尔佳；献给马冷、安赫莱斯、索莱特和两位索莱；献给比希尼娅、英格丽德和希梅娜；献给伊莎贝尔和玛利亚·何塞；并献给另一些接触较少但我同样爱她们的女友，像安娜·克里斯蒂娜、努里娅或玛里塞。

献给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伙伴，现在我已见不到她们了：玛丽·特雷、奥菲丽娅、阿里西娅、玛利亚·何塞、贝戈尼亚、比丽、比拉尔、法蒂玛、玛利亚。

献给那些已经走了的我的女友：蒙特塞拉特、玛利亚·路易莎和卡米娜，以为纪念。

尤其是献给所有那些因为不在此名单之列而会生气的女友。

● 目录

前言 无形的生活	1
阿加莎·克里斯蒂 永远的逃亡者	15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热情的孤独	23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 致命的生活	29
西蒙娜·德·波伏瓦 生命的意志	37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奢华与伟大	45
阿尔玛·马勒 带着钢爪	53
玛丽亚·莱哈拉加 沉默	61
劳拉·赖丁 最邪恶的女人	69
乔治·桑 圆满	77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殉教的渴望	85
弗里达·卡罗 世界是一张床	91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 死神母亲	99
玛格丽特·米德 在风中筑巢	107
卡密尔·克洛岱尔 梦想与梦魇	113
勃朗特姐妹 勇敢而自由	119
结语	127

■ 前言 无形的生活

两个世纪以前，我们人类自身已开始讨论，为什么在等级和职能方面社会如此区分男人和女人。某些特别无畏的女性之前已经提出了这类问题，比如像法国人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她于1405年撰写了 *La Cité des Dames*（《女士之城》）；但是要等到实证主义和诸神最终之死的到来，西方世界的民众才会蔑视自然秩序的不可改变性，开始大规模地质疑事物的缘由，尽管许多男人和女人表示反对，这一知识好奇心仍不得不强制性地包括了与女性本质有关的诸多个为什么：女人的本质是不同的，疏远的，被征服的。

实际上对那些问题尚未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等级制度是如何建立的，何时发生的，是否历来如此。已经推出了一些理论，其中任何一种都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它们提到人类有一个最早的母系社会阶段。谈到万能的伟大女神，像罗伯特·格雷夫斯^①描写的地中海白色女神。或许那不是母系社会阶段，而仅仅是性别之间的社会平等，女性和男性各有特殊领地。女人生育，或许正是这种惊人的能力使女性非常强大。从至今所见的史前的丰产维纳斯（如维伦道尔夫的维纳斯^②：肥胖，大肚子，可爱）到后来众多的女性形象，那些新石器时代的强壮石头女神，都涉及了那种能力。

恩格斯认为，当人类停止游牧并定居在农耕者村落时，妇女的屈从与私有财产和家庭同时产生了；男人需要确保有一些自己的儿女，把自己的财产传给他们，因此要控制女人。我的想法是，也许是女性的繁殖能力使男性产

^①罗伯特·格雷夫斯（1895-1985）：英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观点文学学者。他最有争议的一部学术著作是《白色女神：诗的神话的历史语法》（1948）。他在书中争辩说，一个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并持续至公元的最重要的宗教的存在是建立在对一位女神的崇拜之上的——译注。

^②维伦道尔夫（Willendorf）：位于奥地利，人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雕像，高11厘米，刻在石灰石上——译注。

生恐惧，特别是当他们变成了农民。在此之前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中，两性的价值是明确区分的：女性生育，哺乳，抚养；男性狩猎，保护。这些基本职能在其价值上是可以交换的。但在之后的农业生活中，男性都做什么特殊的事呢？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照管土地，或许从魔法的角度看，她们甚至管得更好，因为多产是她们的王国，是她们的领地。他们大概看女性太强大了，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也许男性的控制欲就是源自这种恐惧（以及他们体力上更强壮的优势）。

那种对女性能力的疑惧已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神话中，在创造世界的故事中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们竭力限定女性的服从角色，但同时赋予女性一种远远超出我们从属地位的伤害性能力。夏娃因听凭蛇的诱惑而伤害了亚当和全人类；据希腊神话说，宙斯为惩罚人类而创造的第一个女人潘多拉，做了同样的事：上帝送给潘多拉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她受无法遏制的**女性**好奇心驱使打开了它，于是所有的灾难都被释放出来。这两个主要故事都把女性呈现为一种柔弱、轻率和缺乏理智的人。可另一方面，好奇心又是智慧的一个基本要素，在这些神话中，是女性有勇气问自己彼处尚有何物，是女性渴望发现被隐藏的事物。此外，夏娃和潘多拉带给世界的灾难是死亡，疾病，时间，这些构成人类自身实质的条件，因此实际上神话传说赋予了她们一种让人又喜欢又讨厌、但宏大的角色——作为人类的创造者。

夜妖的故事更加神奇。犹太传统认为夏娃不是亚当的第一个女人，夏娃之前存在过夜妖。这个夜妖想和男人平等：比如，当她被强迫在亚当身体之下与他做爱时，她极为气愤，她觉得这种姿势是侮辱性的，要求与男性享有同样的权利。亚当利用自己更大的体力试图强迫她服从，但夜妖因此抛弃了他。夜妖是宇宙第一位女权主义者，但她温和的要求对那个时代的父系上帝来说自然是无法接受的，他把夜妖变成了一个弑婴的魔女，判处她承受每天死去一百个她的孩子的痛苦，这个可怕的惩罚完全象征着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因为或许在夜妖这个神话中潜藏着从一个无性别歧视的古老世界（女人像男人那样强壮和独立）可能过渡到之后建立的男性新秩序那种被忘却的回忆。

总之，事实上，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北方还是南方，几千年里妇女一直被视为二等公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无论是罗马人还是中国人或者埃及人，按性别弑婴（与渴望得到的男孩相反，女婴被当做是一种负担而在出生后即被杀死）都曾是一种非常广泛和通常的做法，甚至在今天还在许多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公开上演。这反映出女性被赋予的卑微价值，女性是带着不被人想望的根本不幸来到这个世界。

由于今天的人类仍然是十八和十九世纪改良及进化思想的产物，人们倾向于认为今天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整体上比往昔的社会好，比明天的社会差，仿佛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抗拒地处理好。另一方面，这种虚假观点如此显然，不值得加以论证。于是在妇女这件事上人们已习惯于认为平等在逐步争取，直至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这并非完全是事实。因为今日西方妇女的处境虽然看来比任何时候都好，但其历程并不是直线型的：女性有过享有更大自由的时刻，但紧接着是反动时代，有些时候，镇压达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如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初对女巫的抓捕和惩治，那也许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沸腾的一个回应。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法国曾有过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因行巫术而被活活烧死的罪犯中百分之八十五是各年龄层次的妇女，包括女孩。在德国的一些村庄每年有六百人被处决。在图卢兹^①，仅一天之内有四百名妇女被送上篝火堆。有些作家说死亡人数达几百万。判处烧死那些女巫的罪名有时是胡乱的（她们与魔鬼有关系，喝孩子的血），但是也因为她们给其他妇女服避孕药、堕胎或施用毒品以减轻分娩痛苦等罪孽。这就是说，正因为她们显示了一种对自我生命的控制，掌握了禁忌的医学知识（妇女不能学习），拥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才遭致火刑之灾。

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和它的正义与博爱的理想，使少数男人和女人开始明白，平等或者是给予所有个体的，或者不赋予任何人：“要么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不拥有真正的权利，要么我们大家都具有同样的权利；投票反对别人权利的人，不论他的宗教、肤色或性别是什么，他都在以那种方式放弃自己的

^①图卢兹：法国南部工业城市，有法国最大的罗马式教堂，还有创建于1229年的图卢兹大学——译注。

权利。”这是孔多塞^①1790年在他《关于承认妇女享有城市权利》一文中所写的话，这位令人崇敬的法国哲学家参与起草了革命宪法。孔多塞是一位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他与其他少数敏锐的绅士开始揭露妇女的困境。当时不抱有性别歧视的男人所发出的那些最初宣言极为重要，只有具备文化修养才能承担一种批评态度，而那个时代的妇女几乎完全缺乏教育。

伴随大革命的热潮，法国各地（又迅速波及整个欧洲）开始出现妇女俱乐部和妇女协会，并产生了著名的女权主义革命家，像奥兰普·德·古热和泰鲁瓦涅·德·梅里古。但那种正义和自由的梦想十分短暂：恐怖统治时代的到来再次把妇女关进家里。1793年6月，泰鲁瓦涅受到一群女市民的攻击，脑部被石头击中；她没有死，但神经失常，在一个疯人院度过余生。奥兰普于1793年11月被斩首，妇女俱乐部被禁止。至于孔多塞，罗伯斯庇尔判处他死刑，同年9月，这位哲学家在他人狱的第一个晚上宁愿服毒自尽。性别歧视的偏见，再度回潮。

然而，几十年后的十九世纪中叶，“**妇女问题**”这一说法被制造出来，这就是说，妇女第一次被理解成一个社会问题。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结果，它结束了传统的家庭生活。从前家庭妇女隶属于男性，还承担着大量日常生活的重担。她们做罐头，腌鱼，缝制家人的衣服，照管菜园和家畜，制作肥皂、蜡烛、鞋子，认识药草，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在家庭范围内是活跃而重要的人物。但是工业革命逐渐消解了她们所有的职权：肥皂在商店里买，菜园和家畜因城市人口增多而越来越少，健康开始由医生掌管。总之，妇女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位置。

另外经历了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高潮。上帝奄奄一息，不变的自然秩序作为费解事物的一种绝对答案已不再被接受，整个宇宙必须被重新定义。女人是存在的又一个未知数，一个该用科学术语揭示的秘密。十九世纪末，人们相信通过智者的定义，通过博学之士的分类，人类能够梳理并看清现实的所有蒙昧。

妇女因此变成了男人研究的对象，把她们与“正常性”，即男性的价值

^①孔多塞（1743-1794）：法国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然神论，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领导人之一——译注。

和特质进行比较。达尔文认为，“通常承认女性身上的直觉、感觉以及或许模仿的能力比男性更为突出，但这些功能中的一部分至少是低等种族的特征，因而是一种过时的、较不发达的文明状态的特征。”从男性的角度，女性开始被视为一种异常性，一个受制于月经和疼痛的病人。不健康的和折磨人的女式时尚胸衣（女性被这种胸衣扭伤肋骨，引起子宫和肝的错位）加重了窒息及昏厥，社会地位和生命前景的缺乏加大了沮丧和苦痛。女人因此被看做病人，她的确病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一种“瘟疫”，这些得厌食症的女人，受奇怪的慢性病折磨的女患者，甚至成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歇斯底里女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善于在他的书中塑造他那个时代的妇女典型，聪明而富有激情，却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可能是亨利的妹妹爱莉丝·詹姆斯给了作家灵感，她是一位富于创造性和敏感的女人，喜欢写作（她的日记不久前已出版），但是不能上大学，也得不到必要的支持，她不能像亨利那样从事文学。爱莉丝是个慢性病患者：从十九岁起神秘的疾病使她变成了一个废人，四十三岁时她患上急性癌症，她很高兴自己死去。

对妇女来说，那个时代大概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岁月：下层妇女被工厂十六个小时的倒班弄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要生育子女，照顾家庭，而中上层妇女则被关在金牢笼里。十九世纪文学中的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庭长夫人》里的安娜·奥索雷斯）讲述了一些敏感、聪明而又能干的妇女的悲剧，她们过着无意义的生活，试图通过浪漫的爱情来逃脱空虚，她们因触犯了严苛的戒律而付出了昂贵代价。除了特例（比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一直是个令人愉快的女权主义者），那个时代的男性环境大多是敌对的，对女性的不理解极为严重，致使许多妇女开始**选择独身**，或与其他妇女建立终身的同居关系。在美国，女性同居关系当时被称为**波士顿式的婚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波士顿女人》讲述的正是那种女性世界），它不必一定具有女同性恋的意涵，而是在很多情况下，相对于那些积极、独立、思想不安分、不愿屈从社会禁锢的妇女的生活，它是一种情感和同道的结合。

尽管如此，最令人惊讶的是，证实了一直都有能够战胜最艰苦的环境，

富于创造力的女性存在，那些女战士，女冒险家，女政治家，女科学家，她们有能力有勇气摆脱像坟墓那样狭隘的命运。当然，与大批默默无闻、屈从于世界强加给她们限制的女性相比，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可是毫无疑问，这样的女人比我们今天知道的和记得的要多得多。因为正如意大利女作家达西娅·马拉伊妮所说，妇女死的时候，她们是永远地去了，服从肉体和记忆的双重结束。历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院士、官方文化和公众记忆的保管人一直都由男性充当，妇女的行动和作品很少进入年鉴。今天，这种性别歧视的健忘症终于得以改善：女性在学术和知识层面上的日渐出现开始使形势趋向正常化，一个完全新型的研究领域开辟出来，这些研究大部分由妇女进行，她们力图从历史的阴霾中挖掘出我们的女性前辈。

一些女前辈能够作出巨大的无名业绩，像在中国湖南省曾发明一种秘密语言，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只为妇女所用的文字，一种叫做“女书”^①的神秘书写方式，它包括两千个字和至少一千年的历史（有些专家甚至说有六千年），如今只有五六个耄耋老妇掌握此种语言。又有传说“女书”是一个中国皇帝的妃子发明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多有才华呀！能够发明整整一套书写体系），为的是能够向她的女伴们讲述自己的私密生活、自己的哀怨和情感，而又不必冒被发现和遭惩罚的危险。许多掌握这种文字的妇女不会写汉字，这种中国的官方语言，因为她们处于文盲状态，被小心翼翼地排除在知识文化之外。地下“女书”赋予了她们文字表达的能力，这是一种女性互助力量，她们以此来作出某些抵抗。“我们必须从年轻时代起建立姐妹关系，通过秘密文字互相交流”，几千年保存下来的文本之一说。另一个文本补充到：“男人敢于离家去面对外边的世界，但是当妇女创造了一种男性无法理解的语言时，她们具备同样的勇敢。”

是的，历史上千百万妇女就是这样，勇敢而无名。根据最新的学术理论，文学史上那些匿名文本或许大部分正是出自女性手笔。在其他场合，妇女创作作品，随后由她们的配偶（或她们家的男人：父亲、兄弟、儿子）发表，西班牙女子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1874—1974）就是如此。她是社

^①湖南江永县、道县一带瑶族妇女使用的一种文字符号，用以书写湘南汉族人的土语——译注。

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第二共和国的议员和重要的剧作家，虽然她的作品是以她丈夫格雷戈里奥的名字发表的。而且也提到妇女的作品总是遭遇迷失和遗忘，例如希腊人埃伦娜的史诗《特洛亚战争》失传了，荷马以她为灵感创作了《伊利亚特》。总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质疑的：莎士比亚那位爱幻想、有志向、充满才气的妹妹朱迪思·莎士比亚怎么了？

另一方面，我们对妇女及她们的行为所拥有的记忆常常受到性别歧视价值观的沾染。比如：我们没有忘记美萨利娜，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的妻子，是因为她以不忠和慕男狂的女性形象而载入史册。对叶卡捷琳娜大帝，著名的俄国女皇的记忆，是一位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和有过很多情人的女性。然而这位从1762年至1796年驾驭帝国的女人，是开明专制主义的伟大君主之一。她改革了俄国政府的行政制度，制订了第一个立法概要，与立陶宛人及土耳其人交战，取消了乌克兰自治；如果说这一切还不够的话，她保护文学和艺术，与伏尔泰保持频繁的书信往来，她创作剧本并创办了《任何蠢话报》，作为专制主义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她有过多位情人，是的，像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男性君主一样，但她又与那些国王和皇帝中的许多人不同，她懂得把自己的情人维持在纯粹的私密领地，不让他们在政治上影响她。

尽管如此，当一个人探身历史的后院时，他会遇到令人惊叹的妇女：与潜水员在一热带海洋的平静水面之下隐约发现海底的丰富资源（一片意外的鱼类和珊瑚景象）一样，她们在女性驯服的单调传统形象之下出现。比如那里有女战士，有举动极其怪诞的人物。像玛利亚·佩雷斯，一位十二世纪卡斯蒂利亚女英雄，她乔装成男人与穆斯林人及阿拉贡人作战。玛利亚与绰号为“斗士”的阿拉贡国王阿丰索一世决斗，国王被打败，并被收缴了武器。当人们发现玛利亚是一个女人后，便送给她一个称号——“像男人的女人”。这并不妨碍她随后与一位王子结了婚，为家庭而放弃了战争。还有神奇的玛丽·里德，十八世纪英国女冒险家，她也女扮男装，作为士兵加入了佛兰德斯步兵团。打了几年仗之后，她离开军队，结婚后在布雷达^①开了一个酒馆。她的丈夫死后，她重新穿上男装，加入荷兰步兵，登上一条开往美洲的船。

^①布雷达：荷兰西南部北布拉班特省城市——译注。

船被海盗俘获，那一刻不屈的玛丽·里德决定做海盗。她的海盗生活持续许多年，期间她爱上了一个海员，并与他结婚。1720年她落入英国人手里，被关进牙买加监狱，在狱中去世。

十七岁的胡安娜·德·阿尔科也披上闪闪发光的男性盔甲指挥作战，率领法国军队抗击英国人，重创英军。十九岁时被敌人俘虏，被活活烧死。十七世纪末另一位法国妇女路易丝·布鲁维尔，装扮成男人；她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另一名士兵，被开除出军队，之后参军当水兵，指挥一艘三桅战舰。在一次与荷兰的海战中，二十五岁的她因舰船相撞负伤致死。

穿男人服装并采纳男性性格的不光是那些女战士，其他许多妇女都曾被迫利用一种男性身份的庇护来避免外界对女性的厌恶。例如著名的加里西亚女社会学家和思想家康塞普西翁·阿雷纳尔（1820—1893），为了能上法律系的课不得不女扮男装，因为妇女被禁止上大学。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亨丽埃塔·费伯身上，十九世纪初她装扮成男人，几年间在哈瓦那当医生，直到1820年恋爱时她才披露自己是女人，想结婚；她因此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因为在古巴禁止妇女学医和行医。另一方面，使用男性笔名已是十九世纪女作家中相当普遍的做法，如乔治·爱略特、乔治·桑、维克多·卡塔拉^①或费尔南·卡瓦列罗。

另一种更平常并被社会所接受的易装癖是宗教性的，许多世纪里妇女求助于它：当修女。修道院常常是一种社会义务，一种自我封闭和惩罚，但对很多妇女来说，那里是一块可以不依附于男性监管的地方，可以读书，写作，承担责任，享有权利，总之，开展一项事业。那里曾产生过因知识水平或艺术才华而出类拔萃的修女，像圣女特蕾莎、索尔胡安娜·伊内丝·德·拉克鲁丝，或赫拉德·德·兰茨贝格，霍恩堡^②的女修道院长，她在十二世纪完成了历史上第一部由一位女性编写的大百科全书（能够计划一部如此雄心勃勃的作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了修道院为女性开辟的天地有多广阔），书名为 *Hortus Deliciarum*（《愉悦的花园》），插图极为精美，她用这部百科全书来培养她的那些修女们。

^①维克多·卡塔拉（1873—1966）：西班牙女小说家，用加泰罗尼亚语创作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小说——译注。

^②霍恩堡：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境内——译注。

另一些修女充满情欲，如索尔玛丽亚娜·阿尔科佛拉多，一位十七世纪葡萄牙修女，她不幸（或有幸）地爱上了一个法国伯爵，给他寄去了一些优美而狂热的情书，这名男子于1669年在巴黎厚颜无耻地发表了这些信件（当然多亏了那样它们才得以保存）。还有一些逃亡和好斗的修女，像少尉修女卡塔利娜·德·埃劳索，年仅十一岁就从修道院逃走，化装成男孩当上见习水手，又化名阿隆索·迪亚斯在美洲参了军。另外，还有一些要求独立的女性，她们不是选择做“好女人”，即当修女，而是选择做“坏女人”：当宫廷贵妇，从希腊文雅的宫女到蒙特斯庞侯爵夫人^①或蓬巴杜侯爵夫人^②，法国国王的情妇，这些女性对当时的公众生活一直拥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除了修道院和“安逸的生活”之外，对妇女来说只存在一条摆脱男性监护的大道，那就是守寡。尤其是在领导责任方面：二十世纪之前在几乎所有获得权力的妇女背后都有一位死去的丈夫。在特殊情况下死者是父亲，并通常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或弟弟，她们至少在一开始是这些人的代表或摄政者，直到能够巩固自己的权力。看到一些不仅没有受过知识教育和政治培养，而且要承受完全是阻碍性环境的女性，能够奋斗，承担并掌握权力，常常成为重量级的统治者，这令人惊讶。这些女性所面临的困难极好地体现在可怜而勇敢的奥地利女子玛格丽特身上，1599年她十四岁时嫁给了菲力普三世，进入西班牙王宫，除了德语她不会其他任何语言。列尔马公爵^③为了不失去自己对国王所拥有的权势，把新来的玛格丽特孤立起来：辞掉了她所有的德国侍从，用他的西班牙亲信包围着她。可以想像这位少女的痛苦，如此孤立地陷在一个敌对的宫廷和一种陌生的语言环境里，一个接一个地为王室生孩子。然而七年后，她掌握了足够的语言和政治能力来对抗列尔马公爵，并获准起诉他。在国王的忏悔牧师路易斯·德·阿利亚加神甫的支持下，她当时也试图起诉乌塞达公爵，但这次她输了。她在二十七岁时生下第八个孩子，分娩之后出现了并发症，乌塞达公爵好像阻止她得到医生的救治致使她死去。整个一女性的悲剧命运。

尽管处境不利，欧洲历史上还是充满了诸多的莱昂诺尔、玛利亚、伊萨

①蒙特斯庞侯爵夫人（1641-1707）：法国路易十四的情妇，前后达13年——译注。

②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法国路易十五的情妇，拥有权势，是当时文学和艺术的重要赞助人——译注。

③列尔马公爵（1553-1625）：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三世执政期间（1598-1621）的宫廷宠臣——译注。

贝尔、胡安娜、路易莎或玛格丽特，她们常常依靠智慧和谨慎在某一时刻支配自己的民族命运。当然，世上还有不那么谨慎的女性，像萨姆-拉玛特，公元前九世纪亚述帝国的王后，为了掌握权力让人暗杀了她的丈夫尼努斯国王，在她统治的四十二年间，建立了巴比伦城，征服了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另一位强硬的女人是埃及女王哈特谢普苏特（公元前十五世纪），她自行加冕为法老（女性不可能做法老），并在富有成效的二十多年里保持着权位。她一直以一个男人的形象出现，她的养子图特摩斯三世登基时把她从法老的名单中抹去。

也有报复心强的母亲，如托米里丝，公元前六世纪西徐亚王国^①的王后，她的一个儿子被波斯著名的暴君西罗杀害。为此，当托米里丝打败西罗后，她命人砍断他的脖子，把他的头颅塞进一桶血里，以满足她复仇的渴望。还有拉盖塔娜，一位征服时期的哥伦比亚部落女酋长；她儿子因反对征服者阿尼亚斯科提出的瓜分印第安人的主张而当着她的面被活活烧死。于是拉盖塔娜发动所有的印第安人反抗阿尼亚斯科，打败了他并将他慢慢折磨致死。

也曾有被激情弄昏头的女统治者，如“疯女”胡安娜，她曾带着丈夫“美男子”菲力普^②的尸体在全西班牙游荡了三年。或阿尔特米西娅二世，哈利卡纳苏斯的王后（公元前四世纪），当她的心上人摩索拉斯死去后，她下令修建一座纪念他的陵墓，这座陵墓成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至今仍使用摩索拉斯一词^③。这位伤心寡妇的一个前辈阿尔特米西娅一世，一个世纪以前的哈利卡纳苏斯王后，她在感情上可不那么温和：她爱上了达尔达诺，当被他拒绝时，就命人挖了他的眼睛，然后自杀。

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女性。像伟大的伊林娜，公元八世纪拜占廷女皇，她组织了镇压反对圣像崇拜者的尼西亚第七次普世教会会议。丈夫死后，伊林娜代替当时十岁的儿子君士坦丁摄政。十年后儿子不得不诉诸一次军事起义才把母亲从王位上赶下来。可不久后他犯了孝敬的弱点——他把母亲召回自己身边（他只有二十二岁）。伊林娜回来了，她当然回来了：首先她控告

①西徐亚王国为黑海北岸古国——译注。

②“美男子”菲力普（1268-1314）：法国和纳瓦拉王国（今西班牙一省）的国王（1285-1314），1284年与纳瓦拉王国的胡安娜联姻，由此扩大了他的势力范围——译注。

③它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为“陵墓”——译注。

儿子犯了重婚罪，然后废黜他，再后来把他监禁起来，最后命人弄瞎他的眼睛。当时她自封为女皇，但五年后被废黜，死在流亡中。最奇怪的是她的尸体几年后带着圣骨的荣誉被运回君士坦丁堡，她被东正教封为圣徒：因此这位命人挖出儿子眼睛的母亲今天对一大帮信徒来说是圣女伊林娜。

所有这些强硬和残暴的女君王的故事表明，妇女也可以是邪恶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宽慰，因为它在人类整体和全面的人性中重新肯定了女性：女性跟任何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的事。所有女人中最坏的是谁？很难竞比，但有一个与萨德侯爵的邪恶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经典恶女子，她就是伊丽萨白·巴托里，一个血腥的女伯爵（1560-1614），一个匈牙利寡妇，她以为沐浴在少女的鲜血中就能葆有青春。据说她为此残害了六百多个年轻农家女，将她们斩首放血。她的罪行被发现后，人们将巴托里女伯爵活活地砌在她城堡的墙里。

总之，有过各种各样的女人。有显要的女企业家，如十八世纪的玛丽·布里扎尔和十九世纪的妮科尔·克利科，另一位有名无实的寡妇；有卓越的女科学家，如玛利亚·阿涅西·皮诺蒂尼，一位意大利女数学家，她于1748年发表了当时为止已完成的最好的微分学专著；有火热的女冒险家，如女征服者门西亚·卡尔德隆，她在十六世纪指挥了一次对巴拉圭的探险。女性愿意从事奇怪的工作，甚至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还有过一位女刽子手：在她操此业数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她的性别，因此把她关了十个月的监狱。

在我们集体健忘的平淡无奇之后隐藏着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斓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名声狼藉。她们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赢得：背叛了社会寄予她们的期望，逃避了她们有限的女性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应该考虑到多数情况下，几千年间做女人就意味着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比如单独上街或单独旅行）。“妇女可能不得不克服巨大的障碍以获得适当的成就，这个事实并没有把她们与唐纳德·特朗普^①或纳尔逊·洛克菲勒^②相提并论”，*Telling women's lives*

①唐纳德·特朗普（1946- ）：美国房地产经营人，曾在纽约一带大量购置旅馆、娱乐场以及其他房地产业——译注。

②纳尔逊·洛克菲勒（1908-1979）：美国第41届副总统（1974-1977），纽约州州长（1959-1973），共和党温和派领袖——译注。

（《讲述女性的生平》）的作者琳达·瓦格那-马丁明智地说。但是在那个共同背景之下，每个生命都像所有生命那样是如此的丰富和不同。在深层本质上，男人和女人分享同一基本人性。

我尤其对文学界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传记、自传、书信集和日记一直怀有极大的爱好。从那古老的激情中诞生了这本书收录的系列文章：十五篇女性速写，在适当时候发表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上。由于摆脱了篇幅狭小的限制，几乎所有文章都是以扩写的版本出现在这里。

当然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按报刊文章最传统的意义说它也不是，因而丝毫无意覆盖领域，不论是地理的、时间的还是职业的：这就是说，我选择这些传记女性，既非为了让她们代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女性境遇，也不是为了适当分配她们所属的文化和国家，更不是因为这些女性是最为有名的。说实话，与其说是我选择了这些女主人公，不如说是她们选择了我：我将讲述那些在某一时刻对我说过话的那些妇女。其传记或日记因某种特殊之处震撼了我，使我进行反思、体验、感受。因此我所力图呈现的，与其说是一种新闻和学术特有的横向和有序的视野，不如说是一种纵向和无序的视线，那种极特殊的眼光所独有的视线，有时（我们睡觉之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开车回家时的一个傍晚）我们以为用这种眼光瞬间隐约窥见了生活的自我本质，混沌的内核。

为什么仅仅写妇女？这是因为前面提到过的那种穿透平静之水，从水下捞出一大堆令人惊奇的深海动物所带来的感觉。此外，阅读女性的传记和日记，你会发现不受怀疑的社会观点，仿佛真实的生活，每天的生活，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生活，它原来会沿着不同于官方生活的途径行进，后者带着所有的偏见被收集在年鉴中。例如，我们来选取一个年老妇女与一个青年男子的爱情话题；这种关系可以说长期被视为一种出格的丑事，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看来也还是一种出乎正常的例外，然而只要探究前辈妇女的生活就能发现大量这类令人惊讶的事实。

只举若干个例证，我们要记得阿加莎·克里斯蒂再婚嫁给了马克斯·马洛温，一位比她年轻十五岁的考古学家，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直到她去世。乔治·爱略特六十一岁时与小她二十岁的约翰·克罗斯结婚，乔治·

桑与比自己小十四岁的雕刻家亚历桑大·芒索经历了一场持续十五年的伟大爱情史，只是芒索死后才结束（几年后六十一岁的乔治·桑又与四十岁的画家查尔斯·马查尔保持了一段短暂但强烈的性爱激情）。奥托兰·莫雷尔夫人，“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保护者，爱上了一个她称之为“老虎”的二十岁园丁，在她五十多岁时享受到一生中最美好和最强烈的爱情。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年纪小她许多的记者克洛德·朗兹曼保持了七年之久的爱情关系（他不是她惟一更年轻的情人）。十分著名的居里夫人，两次诺贝尔奖得主，也与小她六岁且已婚的科学家朗之万^①有过不同寻常的爱情：这些加大了丑闻。甚至非常正派的埃莉诺·罗斯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妻子，也曾有过一个比她小十二岁的情人米勒，那是她生命中的伟大秘密经历：他们如此和睦以至于米勒在34年间每天给埃莉诺写一封信。

我想要表达的是，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在几千年间过的都是一种不被公开的（像许多时候那些秘密热恋的年轻情侣，或者像秘密语言“女书”那样）并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生活，但它总是比社会为她们设置的模式要丰富得多，它超越了偏见和陈规旧习。总之，我只是渴望通过这本书朝那些晦暗之处短短地瞥一眼。因为还有一个不在历史中的历史，只有侧耳倾听女性的窃窃私语，才能把那历史之外的历史挖掘出来。

参考书目

- 芭芭拉·埃伦赖希，黛特·英格莱虚：《巫婆，产婆和护士》，拉撒尔出版社；《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达乌卢斯出版社袖珍版。
- 西尔维娅·蒂贝：《没有影子的女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著名妇女字典》，埃斯帕萨出版社袖珍版。
- 邦妮·安德森，朱迪思·津泽：《妇女的历史》（第二、三卷），批评出版社。
-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阿利安萨出版社。
- 琳达·瓦格那-马丁：《讲述女性的生平》，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美国新

^①保尔·朗之万（1872-1946）：法国物理学家，193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译注。

泽西州)。

○克莱尔·巴克 (编辑):《女性文学布卢姆斯伯里指南》,布卢姆斯伯里出版有限公司 (伦敦)。

○玛丽·莫里斯 (编辑):《少女的旅行》,文帖杰出版社 (纽约)。

○菲莉斯·罗斯 (编辑):《妇女的生活》,W. W. 诺顿公司 (伦敦和纽约)。

■ 阿加莎·克里斯蒂 永远的逃亡者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她的照片中几乎从未张嘴笑过：她的牙齿不好，而她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说实话，她关心所有事物的外表：她需要世界是一个平静而确切、和睦而有序的地方。但现实是眼花缭乱的，趋于混乱，不管我们如何设法使它服从我们的要求；这样，从四十岁起阿加莎胖了许多，变成了一位丰胸肥臀的壮妇。她过去一直很苗条（她自己负责在所有的自传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一点，就像某人提及一件几乎奇迹般的事情，一件对他人来说不可置信的奇事，或许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因而这种突然和决定性的发福，自己将要被禁闭在一个巨大的躯体里度过后半辈子，这大概加剧了她内心的灾难意识。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生存变成一场长期的逃避黑暗，一场与混乱的秘密斗争。

她出生于 1890 年；因此她属于那代不得不超越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还要直面帝国最初衰败的不列颠人。维多利亚主义已经树立了像一只铅桶那么坚定和明确的世界观：一切事物各居其位，一切都有存在的理由，现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美丽与法则是可以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确的梦想在十九末摔得粉碎。达尔文解释说神的预言没有按照我们的模样来创造人和动物，而我们的进化打上了偶然和任意的跳跃烙印。人们发现了具有流动习惯的有害无形分子细菌，因而疾病不再是上帝的一种惩罚或检验，它变成了一个坏运气问题。更有甚者，在所有这些不安和如此多的变化当中，爱因斯坦于 1905 年抛出了他的相对论，声称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可靠。二十世纪带着它所有的恐惧、无序和战争慌忙来临。维多利亚主义静止的巨大架构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海上临终喘息倒塌了。

维多利亚时代的继承人急忙证实这场海难：“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作

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利顿·斯特雷奇^①等）接受生存的无序和破裂来建构他们的作品，于是从文学的角度进入了二十世纪。相反，阿加莎虽然属于同一代人（她比弗吉尼亚小八岁），但她一生都在同混乱作斗争。她想蔑视这种混乱，试图恢复先前那个有秩序有规则的世界，那个她童年时代完美无缺的世界。所以她的侦探作品（七十九部小说，十九部剧本）是完全可以解释的环形世界，是不只舒心而且健脑的数学游戏，那是可预见的世界，在那里，好与坏占据着预定的位置。

为何有那种堵住漏水洞的渴望？为何无法忍受深渊的稍微显露？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性格的遗传，早年的变故。阿加莎是一位花花公子的小女儿，他那么高兴地挥霍掉自己的年金，以至于死时没给家人留下一分钱，那时阿加莎年仅十一岁。于是，这个未来的女作家小小年纪就认识到孤儿的处境、破产和一个占有欲强、抑郁的母亲那种令人窒息的爱，从此她不得不照顾母亲。这一切都仿佛是黑暗中伸出魔爪的怪物。

阿加莎很了解那个内心的怪物，那个她一生逃避的迫害者。在她的自传中，阿加莎准确地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的可怕记忆：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在法国度假，夏天的一次散步中，一位十分和蔼的导游为了送给阿加莎一个礼物，捉到一只漂亮的蝴蝶，用一只别针穿过它。导游把那只蝴蝶别在女孩的草帽上。几个小时里，在童年那段静止和没有终结的时间里，这群人在田野散步，而蝴蝶绝望地振翼，在草帽沿上奄奄一息。阿加莎被恐惧吓呆了，她哭不出来，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因他人痛苦的疯狂而十分难过。那种无言，那种无法面对可怕之事，数年后在她一生中最出名、最具象征性的事件中——她的失踪——再次吞噬了她。

阿加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阿尔奇·克里斯蒂结婚，他是一个竞技航空飞行员，富有魅力，但不成熟，而且好像相当愚蠢。阿尔奇给了她克里斯蒂这一姓氏（过去阿加莎姓米勒），并且是她惟一的女儿罗莎琳德的父亲；他们曾有过几年青春火热的岁月，因为阿加莎富有冒险性格，总是乐意把小女儿留在外祖母的手里，与丈夫外出一年周游世界，他们曾在加拿大的亚硫

^①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英国传记作家，批评家，“布卢姆斯伯里团体”的领袖——译注。

海水中沐浴（她是个优秀的游泳选手），在夏威夷重重的木板上冲浪。她的第一部小说《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已有波洛这个人物，1920 年出版后获得很大成功。世界此时看似一个完美的地方。

但是那个迫害者就在附近。她与阿尔奇的关系开始恶化：他只对打高尔夫球感兴趣。阿加莎总是尽量做一个理想的妻子（和理想的女儿，理想的邻居。前面已经说过，对她而言，世界应该是一个舒适和按照惯例招人喜爱的地方），为了陪伴阿尔奇，她也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但内心却感到无聊，无法忍受。尽管如此，她是永远不会终止这种夫妻关系的：那个时代这事是不能做的，更不用说由她来做这事。她那么乐意在黑暗面前闭上眼睛，准备好以自己的想像来掩盖那些她不喜欢的东西，她那么习惯在自己面前佯装——把嘴闭上就看不见破牙：如果看不见它们，破牙就不存在。

灾难从阿加莎的母亲去世开始。克拉拉，占有欲强的克拉拉突然死去。极度抑郁的女作家回到母亲的庄园料理后事：在那里，她自然被混乱的魔爪逮住了。这是她童年的家，但现在却荒芜、破碎，房顶脱落，房间锁闭，客厅满是某个死者用过的尘土飞扬的破烂家什。自私的阿尔奇不喜欢任何问题，他搬到伦敦的俱乐部生活，几个月后露面，仅仅为了告知他爱上了一个名叫南希·尼尔、跟他打高尔夫球的小姐，他要与阿加莎分居。那是最终的打击。

1926 年 12 月 3 日夜里阿加莎失踪了。大约十一点钟她开着自己的车离开自家古老庄园；几个小时后车子在一条离家不远的路堤中央被找到，车门开着，车上还有阿加莎的大衣和箱子。但大地好像吞噬了她。那时阿加莎已是一位知名作家；她的失踪引起了各种猜测。有人说她死了（或被暗杀了），另一些人说她和一个男人私奔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广告炒作或作家本人的一个出格玩笑，她试图这样以实践的方式表明她的某个小说情节的可行性：不留痕迹的失踪方式。

十一天之后，12 月 14 号，在哈罗盖特^①的水疗饭店，一个很体面的温泉疗养地，人们找到了她。是在晚饭时间；当阿加莎从房间下来去餐厅时，

^①哈罗盖特：英格兰北约克郡区市，自十七世纪以来以矿泉疗养地著名——译注。

得到警察通知的阿尔奇走近她。女作家看着阿尔奇，仿佛某人还没认出门卫的脸，但她优雅地准许他陪自己到餐桌前。她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她逃跑了，逃离她自身）；她在那个饭店住了十天，洗浴，和其他客人玩牌，与他们评论失踪女作家的奇怪事件。她是用特雷莎·尼尔这个伤心的名字（她的高尔夫对手南希·尼尔的同一个姓）登记的，12月11号那天，当看到自己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时，她担心了，在《泰晤士报》上发了一个通告：“特雷莎·尼尔的朋友们和亲戚们，请与她联系。哈罗盖特水疗饭店”。自然，她没收到任何回复。

在她厚厚的自传中没有出现有关这个事件的任何叙述：可能把她给吓坏了。也没有任何提及南希·尼尔的地方。的确，她一辈子都没有公开谈过自己失去记忆的那件奇怪事。阿加莎接受了精神病学的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重构曾发生的事情：但看来她永远没有完全恢复那些日子的记忆。在克里斯蒂的书里从未留下一个有待澄清的线索，一个有待衔接的环节，一个有待吻合的部件；但不管她多么操心费神，不管她如何试图以文学咒语来保护自己免遭厄运，在实际生活中她的确制造了一次缺席，一个缺陷，一条裂缝。阿加莎一直不得不在内心拖曳着那些没有记忆的小时，那个巢居着她的恐惧和疯狂的黑洞，或人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或许它就是对无法生存的强烈恐惧，是对世界和自身的不解。

在阿加莎用笔名玛丽·韦斯特马科特写的六本严肃的作品中，暗示性地出现了现实是不连续的这种不安直觉。那是一些没有侦探情节的情感小说，风格朴实，拙于雕琢，但作家认为它们是她创作的最好作品。阿加莎偏爱的作品《在春天离去》，讲述的正是——一个因循守旧、表面幸福的资产阶级妇女的危机，她突然明白自己的生活不是她所认为的那样。或者说，她突然发现了世界的裂缝，那些阿加莎如此执意要缝补的现实破洞。

她执意要掩饰。阿加莎·克里斯蒂一辈子都在掩饰事物，隐瞒缺点，改变品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感人的虚构人物。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装腔作势者，一个极其精妙的说谎者。比如她装出一副对生活完全而又平静掌控的样子，甚至假装冷漠和无兴趣，而实际上她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恐惧的女人。她

假装对自己的文学毫不重视，把它视为一个十分节制的消遣，但阿加莎是一个有着强烈志向的作家，她凶猛地捍卫自己的作品。她装出不露齿的微笑，并且从六十三岁起试图回避别人再给自己拍照：她一看到自己的模样就不安，那易变和渐渐衰老的形象，而非在她的广告肖像上树立的贵妇人优雅和娴静的形象。大家都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正派和乐于助人的女士，但实际上她一生都在发明暗杀他人的方法：她的小说总是这样酝酿，首先想像一种新的杀人方式，一次完美的犯罪。

阿加莎如此精通且坚持训练不同的伪装手段，以至于把自己都给蒙骗了，当然也把她的传记作者给弄糊涂了。例如珍妮特·摩根写过一本关于克里斯蒂的佳作，说她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阿加莎八十岁时仍在阅读并尖锐地评论像马库泽^①、乔姆斯基、弗洛伊德、荣格、穆尔、维特根斯坦或邓恩^②这样的人），而是一个因循守旧的外省女士。用这两个形容词来定义一位热爱旅行并且游历甚多，能够在叙利亚沙漠的帐篷里生活数月，再婚嫁给一个比自己年轻十五岁的男人的女冒险家，看来是相当不合适的。阿加莎的这一切都发生在那个出格的举动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里：比如，鉴于她离婚和再婚的不正当处境，阿加莎不能把女儿引见到王宫里。少年罗莎琳德不得不由一些更体面的朋友带着出席她的第一次宫廷舞会，而克里斯蒂则待在家里，构思一部关于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少女舞会的小说，“她们的母亲在飞快的继任中逐渐死去”——她以此作为报复。

阿加莎没有任何作假的地方是她对生活的热爱、她的激情以及她令人愉快的制造幸福的能力。只要读读《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这本有趣的自传小书，就足以看清作家的基本人性，看到鲜血在阿加莎的血管里如何流动，日常生活如何成为一种真正的乐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斯蒂因继任丈夫不在身边而充满思念，于是写下《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在其书页中重温了她与丈夫马克斯·马洛温三十年代去叙利亚的考古探险。这本书实

①马库泽（1898-1979）：在德国出生的美国政治哲学家。他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哲学和对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所作的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在极左派大学生中相当盛行。主要著作有《爱欲和文明》、《单面的人》、《反革命和造反》、《批判哲学研究》等——译注。

②邓恩（1867-1936）：美国新闻记者和幽默作家。他塑造了一个朴实的哲学家杜利先生——译注。

际上是一个爱情的见证，是她对生活、对马克斯爱的证明，与马克斯结婚时她四十岁，而他二十五岁，四十五年后死神才把她和他分离。善于想像并且总是好情绪的阿加莎可能修饰了她与马克斯的共同生活，给它添加了并不存在的闪光点。但即使谨慎地降低这段经历的强度，仍可以说这个婚姻是她一生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一种充满幽默、同谋和冒险的关系。也许考古学家马洛温在衰老时表露了对她的爱，他的确衰老得很快，健康恶化得很厉害，没比他妻子多活几年（虽然在这期间他再婚了）。

出现在《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里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是我最喜欢的：古怪，贪吃，有趣，在考古挖掘中坐在她的拐杖——椅子上，她丰满的肉体塞在一件丝绸质地、带小花的体面衣服里，在沙漠当中显得不协调。同一个不受怀疑的阿加莎，为了买一个浴缸，穿着大衣戴着帽子，钻入商店橱窗里放着的浴缸中，因为那种东西得事先试用一下。或者像她快活和爱享受的父亲一样，因挥霍钱财而遭受麻烦的经济拮据。总之，是那位能够在早上八点钟坐在土耳其边境一个开着小黄花的山冈上，沉浸在对地平线蓝色山脉欣赏中的女人：“那是活着有乐趣的时刻之一”，十五年后她回忆那个场景时将写道。因为阿加莎属于那种知道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那样的瞬间的人。

1950年阿加莎·克里斯蒂六十岁时开始写作她漫长而有趣的自传，当时她正陪丈夫在尼姆鲁特（伊拉克）从事考古挖掘，十五年后在她位于沃灵福特的家中完成此书。在一篇动人的后记中她说，给自己的回忆录画上句号是“因为现在，活到七十五岁，看来是停笔的合适时候了。至于生活，这就是所有该说的东西”。曾很切身地忍受过祖母年老时乖戾性格的阿加莎，害怕一个相似的结局：“或许我会活到九十三岁，用我的耳聋让所有人发疯……我会与某个耐心的护士激烈争吵，控告她要毒死我……我会给我不幸的家庭造成无休止的麻烦”，她在后记中说。事实上她活到八十五岁，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她死前一年半发表，虽然出版商对作品进行了很多修改。在那最后几个月里她履行了自己的咒语，逐渐失去头脑。她说胡话，将曾经引以自豪现在却乱糟糟的头发一缕一缕地剪掉。她拒绝接受护士，致使年迈的马克斯不得不安坐在一把椅子上，长期守在她身边。

阿加莎为保持控制奋斗了这么久，一直逃避内心的恐惧和黑暗，最终还是被迫害者俘获。也许我们大家内心都怀有自己的迫害者；也许它终究总能抓住我们；也许知道这点，而不害怕，才是生活的秘密本身。

参考书目

-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个自传》，莫里诺出版社。
- 阿加莎·克里斯蒂·马洛温：《你来告诉我你怎么生活》，图斯盖慈出版社，“旅行集”系列。
- 珍妮特·摩根：《阿加莎·克里斯蒂》，海外出版社，“伟大的传记”系列。
- 吉莲·吉尔：《阿加莎·克里斯蒂》，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
- 格里哈尔沃出版社出版的玛丽·韦斯特麦科特的小说。
- 莫里诺出版社出版的侦探小说。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热情的孤独

在西班牙，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实际上是个陌生人；然而她又是现代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盎格鲁-撒克逊范围内，一个半世纪里，玛丽一直被贬低和嘲笑；今天，尽管新历史学恢复了对她的记忆，大家记得她，主要是把她作为《弗兰肯斯坦》^①的作者玛丽·雪莱的母亲。

如果注意到她的成就，以及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无知便令人惊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女性，她作为独立的职业作家能够在伦敦站住脚，在那个时代是极其少见的。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散文；其中《为女权辩护》（1792）一篇，奠定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基础，使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成为她那时代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大革命期间她只身前往巴黎，并在那里经历了恐怖统治的痛苦岁月（或更确切地说她幸存下来，因为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被砍头）。此外她与一位美国冒险家生了一个私生女，然后与英国作家威廉·葛德汶有了另一个女儿（成为玛丽·雪莱的那个女儿），并跟他最后结了婚。那时这种生活完全是与众不同的，她不得不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玛丽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人士，是辉煌和轰轰烈烈的十八世纪——她那个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儿。像她那样的改革家有很多：为普选、为个人权利、为自由而奋斗的男人，所有这些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基本的和无可争辩的，而当时则是革命性的。但当这些进步骑士为所有的人要求选举权时，那个**所有的人**只是指男人；当他们谈论个人权利时，只关注男性的权利；当他们提到自

^①这部全名为《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的哥特小说描写一个科学家用尸块拼成一个怪物并失去对它的控制能力。作品不再仅仅是充满黑暗想像的“鬼故事”，它向前呼应着“充当造物主的狂妄必受惩罚”的宗教母题，向后预见并质疑了科学主义泛滥可能带来的灾难，是部集哥特式鬼怪故事和科学幻想于一体的作品——译注。

由时，完全排除了妇女的自由。

从今天的角度很难想像那个如此专制，知性上如此不连贯的世界；但事实上生活就是这样，它残暴地向妇女施加奴役，极力使偏见的分量甚至在最明智的头脑里都造成理性的失去。例如哲学家洛克^①，人类天性自由的捍卫者，坚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妇女都不能分享这种自由，而是要从属于男性。卢梭说：“一个智慧的女人对她丈夫、子女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惩罚。”康德说：“勤奋的学习和艰苦的思考，即使一个女人在此方面取得了成就，也毁掉了女性性别的自身优点。”

如果那个时代最杰出、最创新的思想家都会说出这样的蠢话，可以想像对那些妇女来说，整体环境想必是令人窒息的，她们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样，具有敏锐的智慧、不顺从的精神和足够的勇气来警告所遭受的现行性别歧视带来的不公正。但无人，或几乎无人会重视和尊重她们的这种品质与才能。持这种想法的妇女很少（她们中有西班牙人何塞法·阿玛尔-波旁，她于1786年发表了《捍卫妇女才能的演说》）；男人也极少。在这场斗争中有过男人，严格而诚实的男人，他们知道把自己的革命性分析进行到底。如孔多塞，伟大的法国哲学家。

一位女性怎样变成先行者，脱离她那时代舒适的常规，坚持那种先进甚至带有危险的边缘性立场？我猜想，她不是通过一种早年明确的历史志向，而是以一种更加人性及平和的方式，沿着那条在知性上不能接受的、不同的道路缓缓地滑行。在生活中事实上只有两件事不可逆转：死亡和知识。知道的事不会不再知道，无知无需通过两次消除。玛丽慢慢了解了不公正的现实，她不得不因此而行动起来。

玛丽1759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个织工的女儿，父亲把一大笔财产挥霍在赛马和饮酒的嗜好上。证实有许多作家在他们童年时期都经历过某种社会和经济败落的遭遇，这令人惊讶。从小玛丽就得常常保护她母亲免受醉鬼父亲的毒打；但这不该是她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因为那种暴力在那个时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我推测她对知识的渴求和她的聪慧对她观念的影响更大：

^①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创始人，认为后天的经验是知识的源泉——译注。

由于是女孩，玛丽只短期去社区一所很差学校上过课，在那里几乎没学会读书和写字，而她的笨兄弟内德却在一所好学校里接受了全面教育。

作为社会不公正的一个证据，玛丽的心理应该充满了这种早期比较的伤害，因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文章里一次次地坚持女孩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妇女因缺乏适合她们的工作而遭受的无自卫能力。一个中产阶级的体面女子只能当保姆/家庭教师，宫廷侍女，或老师（但只是让她们做女生的初级教育老师）。这三种悲惨而艰辛的职业玛丽从十八岁到二十九岁都经历过（之后她以文为生），力图养活自己和她的姐妹，但经济依然近乎陷于绝境。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玛丽仍没有放弃求知的热望。为此她利用书本这一时代的新鲜事物之一，终于可以很容易地获取书籍而且很便宜。因而女性虽然被迫远离教育，但知识的大门已无法再向她们紧闭——整个世界通过印刷文字向她们敞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就是这样以一种自学的方式自我培养。

与此同时，十八世纪埋葬了一个等级制不可触及的、历来并永远源自上帝头脑的封建旧结构，使个人主义观念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样出现。在玛丽的英国，变化是急剧的。例如处决不再是公开的，在伦敦出现了第一批分桌的餐厅，而不是通常所有人都在那里扎堆吃饭的长条板。英国思想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博斯韦尔抱怨这类创新：“这种晚餐的方式，或更确切地说，被饲养的方式，被许多人认为是特别反社会的，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饭桌上吃饭，不用强迫自己与任何人说话。”因为中世纪社会是混乱和杂居的：公开就餐，与陌生人共用饭桌；在公开的惩戒性的处决中死去；公开睡觉，因为在客栈里每间房里住宿十个人。相反，在十八世纪开始了现代生活的极端孤独，但也出现了个人主义的好处：人权，民主的动力。

另外，社会等级迅速演化。现在已不再必须出身贵族，个人自身的成就便能为他带来辉煌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善和提高，这创造出一种乐观的氛围，或许从那里产生出改良的理论，即相信人类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在逐步完善自我。时代的热情改革家坚信这一点，并认为人类所有的弊端——饥饿，暴力，战争，甚至疾病和死亡——总有一天都会被战胜。世界的边界已经倒塌，人类好像垂手可得一切。沃斯通克拉夫特所做的就是要求妇女也有权利

分享那所有的荣耀。

玛丽的个人演变缓慢而痛苦。一开始她加入了“不同政见派”，一个民主的但非女权主义的团体；在写使她成名的《为女权辩护》之前，她出版了另一部政治性小册子，题目是《为人权辩护》，支持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反对英国反动分子，特别是埃德蒙·伯克^①的攻击。她纯粹是通过理性的运用而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自由要么是给所有人的，要么不给任何人，正如孔多塞所言。这里我没有篇幅来解释玛丽为她的生活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理解，争议，社会的指责。对她来说一切都很困难：受教育，自立，找到体面的谋生方式，恋爱，甚至写作。做独一无二的人会让人濒于疯狂，她是一个愤怒而忧伤的女性也就不奇怪了。

她的心像液体铅那样炽热，她的激情可以是毁灭性的；但由于她受教于那时代盛行的清教主义，所以很长时间里认为性是肮脏的东西，她把最初的爱变成纯粹柏拉图式的梦想。直到三十三岁只身前往爆发大革命的法国时，她可能还是处女，充满生活的渴望。

1792年12月底沃斯通克拉夫特到达巴黎。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砍头；9月开始恐怖统治。在大革命最初几年的陶醉中，一大群妇女以为《人权宣言》也包括了她们。她们到处创办妇女俱乐部，出版宣言，有过一些社会辩论。但罗伯斯庇尔的独裁统治结束了民主和人道主义兴起的这一切。

在克莱尔·托马林撰写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长篇传记中，很容易发现巴黎的那个时刻何以成为一种生活和一个时代的高潮，玛丽的生活与她那个世纪的沉浮密切相关。就这样，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法国摆脱了她的最后偏见，深陷情网，投入一个三十九岁的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雷的怀抱，他英俊，快乐，懂得生活，是那种通常在动荡的历史时刻涌现出的、易变而又轻浮的人物。和他在一起，玛丽发现了肉体的快乐，她很快就怀孕了。

为了躲避恐怖统治，玛丽来到讷伊^②避难，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的蜜月，享受完美的爱情。而在巴黎，妇女俱乐部被禁止，她的朋友们的头颅在滚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毕业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758年创办《年纪》杂志。1766年进入下院，成为辉格党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②讷伊：法国巴黎西北郊的殷实富户居民区——译注。

动。女权主义者奥兰普·德·古热和玛依·罗兰被砍头（后者登上断头台的时候说了这句著名的话：“自由，多少罪行以你的名义犯下”），被罗伯斯庇尔判处死刑的孔多塞，躲在一个简陋的公寓里继续写关于妇女权利的文章，直到被发现和逮捕。他宁愿在入狱的第一晚服毒自杀，也不愿死在断头台上的公开耻辱中。玛丽为这一切而难过，但伊姆雷的怀抱太甜蜜了：在鲜血和恐怖中，她仍然是幸福的。怀孕的玛丽在讷伊的乡间散步，孤独而幸福地游历凡尔赛被遗弃的宫殿（幽灵般灰尘飞扬的大厅），而世界在她周围溃散。

然而伊姆雷的爱是那样短暂和不真实，跟他的性格相符，因此当玛丽生产的时候他已经厌倦了：他出走英国，开始与一个女演员同居。于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怨恨的激情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她追他到伦敦，向他哭诉，向他提要求。她还两次试图自杀，一次服阿片酊，另一次跳入塔姆河。“你在折磨我”，伊姆雷甚至对她说出这样的话。玛丽对他的痴情确令人窒息。但应该考虑到当时玛丽迈出的一步意味着什么：现在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女性的命运是残酷和狭隘的。玛丽从瑞典来信谈到她新出世的女儿法妮：“一想到她的性别将受到压迫和依赖的处境我就苦恼。”二十二年后，法妮服阿片酊自杀，兑现了她母亲的担忧。

我们正接近突兀的结尾。随着时间的流逝，被伊姆雷抛弃所造成的痛苦和耻辱逐渐减轻，三十七岁时玛丽与她的朋友威廉·葛德汶开始了一场恋爱关系，他和她一样是作家和民主人士。很快她再次怀孕，两人随即结了婚，尽管结婚后他们仍然继续住在各自的公寓里。1797年8月底，未来的《弗兰肯斯坦》的女作者出生；10天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因产后感染而病逝。只活了三十八岁。

玛丽死后，葛德汶伤心得失去理智，他出版了玛丽所有的作品，包括写给伊姆雷的信。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悼念自己的妻子，但社会上已经刮起反动的风，保守派利用玛丽生活的**不规矩**（她的自杀企图，她**不道德**的性关系）来消除对她的纪念。他们把她魔鬼化，嘲笑她，贬低她作品的意义。一个半世纪间，他们得以把她埋葬在一个合适的白圆其说的粗浅印象中：她是一个疯子，一个可怜虫，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

都是不道德的，倒霉的，疯狂的。

玛丽死时正在创作她的第二部小说《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一名妇女的骇人经历，她丈夫为了摆脱她，把她关进一所疯人院（看来这是那个时代英国相当普通的一种情况：已婚妇女是丈夫的一项财产，她缺乏任何权利）。小说开头贬义地参照了那时十分流行的哥特小说：她说，那些充满幽灵的城堡的恐怖，与女主人公身处的“绝望邸宅”的恐怖相比，总之，与生活本身的可怕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仅二十年后她女儿玛丽·雪莱将创作一部让她那么恼火的哥特小说。但《弗兰肯斯坦》是一本非常优美的小说，在那个痛苦的怪物身上一些人看到被屈辱的妇女的象征。“当人类鄙视我时我还得尊重他吗？”那个怪物说。“不管我在哪里看到幸福，我都不可改变地被排除在幸福之外”。这是十九世纪受世俗和偏见束缚的妇女所经历的被排除在生活之外（不可能有一个完满的生活）的相同感觉。得过一百年后，欧洲人才允许妇女上大学，妇女投票权则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很久才取得（西班牙是在共和国期间，法国是在1945年）。玛丽·雪莱的动人怪物只要求一种平等的人的待遇，但没有人理解他，他最终死在北极巨大的孤独中，献身于自我的火祭坛。他像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在万分的不被理解和遭受冷漠中仍满怀理性和激情。

参考书目

- 克莱尔·托马林：《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蒙特西诺斯出版社。
-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权辩护》，伽特德拉出版社；《玛利亚或女人的不幸》，W. W. 诺顿出版社。
- 邦妮·安德森，朱迪思·津泽：《妇女的历史》（第二、三卷），批评出版社。
- E. 施密特：《法国大革命历史导言》，伽特德拉出版社。
- 埃德蒙·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里亚尔帕出版社。
-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拉艾荷特出版社和普拉萨&哈涅斯出版社。
- 詹姆斯·博斯韦尔：《塞缪尔·约翰逊的生平》，企鹅出版社（伦敦）。

■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 致命的生活

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称为爱情。例如对他人病态的需求，最残酷和毁灭性的寄生习性。毫无疑问，作家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奖得主，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和无法描述的方式需要他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很爱她（或甚至说**他爱她**，一个如此畸形地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物能够去爱某个人吗？）。然而，一些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多年来坚持建构出一个夫妻爱情的海市蜃楼，完美夫妇的彩虹般谎言。于是几十年里，他们撰写了大量关于“模范婚姻”和“他们保持得那么美好的关系”的东西。直到1991年，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编辑并出版了塞诺维亚日记的第一部分。令人奇怪的是，帕劳教授试图在她的序言中挽救那不可挽救的东西——爱情故事的玫瑰传奇。也许她没发现自己挖掘出的资料是一枚炸弹——一本令人伤心令人恐怖的书，一部关于人类病状详尽而无意识的研究——一对作为毁灭，作为邪恶陷阱的夫妻。

但我们需要从头说起。塞诺维亚1887年出生在哥斯达布拉瓦^①。她是一个富裕的波多黎各女人与一位加泰罗尼亚土木工程师的女儿。总之，她出身于一个生活优裕的家庭。英语是她的母语（她也懂法语），少年时期在美国待过几年，所以当她们最终于1909年返回西班牙时，人们都叫她**美国女孩**，因为她不像本地人。不像本地人是因为她文雅、活跃、自如、时尚。她以一种十分自由的方式相信上帝，赞同那个时代典型的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一种上流社会的开明慈善（我们要说得那时的社会不平等是巨大的），其最本质、最负责和清醒方面的成果是创办了“自由教育学会”。塞诺维亚回到西班牙

^①哥斯达布拉瓦：西班牙东北部地中海海岸，重要的海滨旅游景区——译注。

后也为农村孩子开办了一所学校，并与各种慈善团体合作。

塞诺维亚从母亲的遗产中获取小额年金，还有各种工作贴补。流亡期间，她先在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大学，然后在波多黎各大学当语言和文学老师。战前她在马德里有一个工艺品商店，为那些租给外国人的公寓精心布置家具。胡安·拉蒙收入微薄而且断断续续。他们夫妇在一起的四十年里，主要是靠塞诺维亚的年金和兼职生活。在她的日记里，塞诺维亚多次痛苦地抱怨丈夫明显没有能力挣钱：他们因此经历了多次经济拮据。但和他们夫妻关系的总体失败以及其他日常背叛相比，胡安·拉蒙应付实际生活的无能只是一个较小的，甚至令人同情的缺点。

众所周知，胡安·拉蒙是个病人。他第一次踏进心理治疗中心（那时叫疯人院）是在十九岁那年，他父亲在睡觉时突然去世，他自己从梦中被摇醒，并被告知这个可怕的消息之后。他无法克服这一切：“我父亲的突然死亡复制在我的灵魂和肉体上，就像复制在一面镜子上；或更确切地说，复制在一个摄影的玻璃感光片上。父亲的死照在我身上，就像一个现实照在一块玻璃感光片上。伴着刻录在我身上的死亡，每时每刻我都感觉自己在死去。”他是个疑病症患者，在他最坏的时刻以为自己已经奄奄一息：不吃饭，不洗漱，不为第二天做计划，因为他认为自己到时已经死了。他浑身都是怪癖，比如他积累大量的报纸和剪报，之后又无法扔掉它们，或因为不能忍受气流而把窗户关得严严的。

无疑，他很痛苦——所有研究他的学者都同情和礼拜式地附和这一点。但我的想法是，世上有**疯子**和**疯狂的人**；有可尊敬和感人的病人，他们只伤害自己；也有以毁灭他人为代价幸存下来的坏心眼病人。里尔克说我们都死于自己的死亡，我同样相信我们都因自己的疯狂而疯狂。胡安·拉蒙虽然有时候能作出伟大的高尚姿态，但他是——或据说是——不同寻常地自私；一个干巴巴的消沉厌世者，一个常常残忍和吝啬的人。他有许多敌人（贝尔加明，阿尔维蒂，纪廉，聂鲁达，萨利纳斯），因为他几乎说所有人的坏话。他好像只对动物和小孩表露柔情；而我怀疑，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看到自己的童年反映在这些生灵身上。这就是说，他很难欣赏不是他自身的其他

东西。路易斯·塞尔努达写道，在胡安·拉蒙身上体现了他所见过的最明显的双重人格，他是杰凯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他像海德先生一样，是“一个卑微小人”。

胡安·拉蒙的工作是抵抗他的疾病、死亡恒常的痛苦和非存在的阴险虚无：他一次次改变和重新梳理一种文学创作，痴迷于渴望获得某种不可能的东西，把他从昙花一现中拯救出来的“完整和完美的作品”。胡安·拉蒙在以他的行动与纷乱的生存做斗争：一种传统男性的答复。塞诺维亚则相反，她以毁灭自我来抗争，把自己的人格融化在她丈夫的人格里：一种传统女性的回应。

在许多相似的情形里，令塞诺维亚的取消自我更引人注目是这位女性在自残之前所具有的潜力。她聪明，慷慨，活跃，高雅，快乐。此外她还写作，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显示了明确的创作志向。少年时在一家美国儿童杂志上用英文发表短篇小说。我读过《玛尔格拉特》，她十五岁时用西班牙语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一篇了不起的文本，对她那个年纪来说好得令人惊讶。由格拉谢拉·帕劳发表的日记没有那种力量，也没有那种风格意向——显然那时的塞诺维亚已经打退堂鼓了。除了若干零星的句子非常优美，让人隐约看到她的文学才华（如当她解释胡安·拉蒙如何抛弃他诗歌的草稿时说：“他开心地把纸撕成小碎片，仿佛是一个工人在拆脚手架”），日记枯燥地、几乎公证式地记录了他们在古巴的两年（1937 - 1939）生活。此前，1936年8月内战爆发后不久，“为了不让胡安·拉蒙变疯”，塞诺维亚把他从西班牙救了出来。

这是一本伤感之书。塞诺维亚从她结婚纪念日那天写起：他们结婚二十一年，她快满五十岁，他五十六岁。总之，他们的关系准则已完好地建立，那是一种完全和彻底的服从准则。每当丈夫要求她做什么事，塞诺维亚就取消自己所有的计划和承诺。给他誊清诗歌，或只是陪着他。与一个如此充满死亡感的人，一个几乎不能享受任何东西的男人共同生活，想必是极其艰难的事，塞诺维亚还得时刻关注他多种神经质的怪癖。因为没钱，他们住在一间简陋的旅馆房子里，那间房子逐渐疯狂而令人窒息地塞满了胡安·拉蒙的

报纸，“结果服务员只能每三天进屋一次，我觉得自己仿佛住在一个猪圈里。因不得不随时看到那堆报纸，我感到很恶心。”此外，胡安·拉蒙写作时“不能忍受任何声音或走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塞诺维亚因此便整天躲在卫生间里，当他午睡时也是如此，“胡安·拉蒙午睡时，我关在卫生间里感到紧张，因为天气好极了。”

她不能出门，不能留下他一人在房间里。为此，胡安·拉蒙不允许塞诺维亚动她腹部长了一个脂肪肿瘤手术——那她就得住院，而他不能忍受她不在家（或许也不能忍受她的疾病，以及她的虚弱）：“我的第一个并且最强烈的愿望是立刻去最近的诊所，给我讨厌的腹部隆起物做手术。”她在日记中说，“如果在我身上没有那么多愚蠢的传统影响着，我会不由分说地离去，胡安·拉蒙会因我的离去而扭曲他的手。把这么折磨人的东西强加给另一个人是可笑的……但只要胡安·拉蒙在身边，我就永远不会有勇气和足够的决心摆脱我的问题。”的确，随着岁月的流逝，塞诺维亚继续养着她的肿瘤。

尽管如此，古巴日记里最残酷的是一直被推迟的美国之行。塞诺维亚的全家都生活在那个国家，她已二十一年没去美国了（除了流亡初期极短的一次逗留），她渴望接近并看望她的家人。从到达古巴起她就开始安排旅行；一次次确定出发的日期，去海运公司，询问价钱，预订船票；定好的日期一次又一次来临，而塞诺维亚仍在哈瓦那。胡安·拉蒙的阻碍策略总是同一个：首先同意和她一起去（她给他找个适合他怪癖的住处，为他安排在美国的一切），然后开始紧张，说最好塞诺维亚一人去（围绕他安排的一切都取消，预订她自己的船票，把旅行缩短到仅一个月），最后面对她不在家的想法，胡安·拉蒙使日子无法过下去，以至于塞诺维亚打了退堂鼓，不走了。这种慢性折磨持续了一年半，直到最后塞诺维亚才得以成行。

关于这个多次失败的旅行，塞诺维亚对胡安·拉蒙提出了她最严厉的批评：“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忍受待在这里，我的全家和朋友离我这么近……如果我不决定一个人去，我将发现跟胡安·拉蒙在一起会更加受罪，因为他从不愿意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而总要我做他喜欢的事。”又说，“和胡安·拉蒙去美国意味着一切都将如此复杂，我几乎宁可不去。每次我想干什么事都

会有一个障碍，我记得在纽约很少的几天我已希望它们结束。真可怕。”她还说，“我徒劳地为胡安·拉蒙的自私而牺牲自我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塞诺维亚在她的日记里采取了极大的克制，很多时候还是开门见山地谈论她的不幸和绝望。日记没说她何时哭过，但它的书页散发着眼泪的气味。当然，尽管在其他情况下有过美好的时刻，但因为很少而更加珍惜。

“如果我看见清楚的事物，而他看不见，”塞诺维亚写道，“允许他结束我的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恰当和确切的提问。受害者对充当牺牲品有罪过吗？我认识许多像塞诺维亚那样的妇女：坚强同时又软弱的女性。从属女性的病态心理存在于那种模棱两可里，而对她专制的男人又病态地依赖于她。在塞诺维亚与胡安·拉蒙的关系里有一个地狱，但魔鬼（如此可辨，如此人性化）处在他们两方面。胡安·拉蒙对她的绝对需要最终俘虏了塞诺维亚：“他可爱极了，虽然他让我发疯。”为了某人（尤其那人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家）而毁灭自我，可以变成一种邪恶和致命的乐趣：毕竟它解决了一个人在生存中该做什么（或该当什么）的痛苦问题：“我想成为社会上有用之人的雄心增大了。但我意识到，要从事其他工作，就得放弃胡安·拉蒙，他现在正需要很多关注。我茫然于走哪条路更好。”

最后她决定继续支持这个天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安于自己的角色（越来越陷入她的病态心理？），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在他们生命的尾声，胡安·拉蒙已严重精神失常，住在一家精神治疗中心，医生甚至对塞诺维亚说，她全面的保护性在场对她丈夫是有害的。看来塞诺维亚承认了这点，含糊地计划让胡安·拉蒙单独待段时间，但她从未那样去做——病态的相互依赖那时已经太顽固了。

1951年塞诺维亚发现自己患上子宫癌。她前往波士顿，很成功地做了手术，但1954年住在波多黎各时病又复发了。人们建议她回波士顿，但为了不丢下健康状况不佳的胡安·拉蒙，她决定不走，在波多黎各接受放射治疗。治疗是极其错误和野蛮的，塞诺维亚一个疗程接一个疗程地被慢慢烧伤，直到被完全烤伤。当1956年她终于不得不去波士顿时，医生们都吓坏了：烧伤如此巨大，已经不能给她动手术了，并通知塞诺维亚，她只有三个

月时间了。于是她回到波多黎各，料理胡安·拉蒙的生活和稿件。

在最后这几年，胡安·拉蒙开始给予塞诺维亚他过去克扣她的东西——确信她作为**天才的缪斯**的历史地位。这不过是对塞诺维亚日复一日投资的公平回报。于是当她1951年动手术时，胡安·拉蒙在寄往波士顿的信里向她详细描述因她和为她而写的诗歌，并证明：“你和我母亲，是我灵感的最好源泉。”而她为了赋予自己的牺牲一个宿命的意义，也开始虚假地讲述自己的过去，像人类在生命的尾声惯常所为（仁慈的回忆，允许我们用一种安慰性的回顾眼光）。于是塞诺维亚那时写道：“当我与一个从十四岁起就已找到他丰富的个人财富矿脉的人结婚时，我立刻发现我生命的真正动机应该是致力于为已成事实的东西提供方便。”

她的临终是缓慢的。在她临终之前不久，胡安·拉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塞诺维亚来说，这是官方地肯定了她的存在不是一种浪费。里卡德·古利翁说，当告诉她胡安·拉蒙得奖之事时，塞诺维亚已经不能说话了；她哼了一首摇篮曲，两天后去世（1956年10月28号）。塞诺维亚的离去使胡安·拉蒙痛苦得真的发疯；他不得不住院，此后再也没有创作，一年半后病逝。他死后，人们找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写着：“献给我的灵魂塞诺维亚，她的胡安·拉蒙最后的回忆，他把她当做世上最完美的女性来崇拜，而不能使她幸福。”

塞诺维亚与胡安·拉蒙相识于1912年。他从第一刻起就爱上了她，但她在两年里都躲避他固执的追求：她不想嫁给一个西班牙人（认为他们是大男子主义者），对自己的前途有很多计划，她觉得胡安·拉蒙是一个古怪和过分忧伤的人。这段时期，胡安·拉蒙的大量情书是感情计谋的一个目录：他试图唤醒塞诺维亚身上那种使人新生的志向——我来救这个人，所有女性都具有这个特点，甚至向她允诺会相信上帝，如果她爱他。

但使塞诺维亚最终妥协的是文学。塞诺维亚在《银灰儿和我》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作品之间找到相似之处，她翻译了这位孟加拉作家的一本书，把它拿给胡安·拉蒙看。他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胡安·拉蒙为她修改西班牙语译文，并署上两人名字将译作发表，还执意要两人合作更多的事

(他们最终翻译了二十部书)。总之，胡安·拉蒙向塞诺维亚提供了一个文学同好的创造性合作，为她展现了一个共同工作的前途：“我们翻译的美好东西的所有译作都将由你署名。然后你得做些独创性的事，是吧？我希望将来把我们俩结合在我们的书里。”胡安·拉蒙在他征服塞诺维亚的一封信中说。有着文学志向的塞诺维亚，终于放下了抵抗，与他结婚……此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任何自己的东西，除了她极为节制的日记。也许当她在古巴日记本上记录下这段感人的话时，她在思考所有这一切（破灭的幻想，没有经历过的生活）：“当我们回来时，云彩已经向东北散开，黄昏的夕阳……使得世界好像是新的……突然所有童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我们强烈希望所有这些不轻信的时光是一种挥霍快乐。”

参考书目

-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日记 1937-1939》，阿利安萨 III 出版社。
- 《塞诺维亚·坎普鲁维：与胡安·拉蒙生活》，福斯托出版社。
- 《人类》第 7 期，胡安·拉蒙专刊。
- 《人类》第 11 期副刊，胡安·拉蒙选集。
- 纳阿罗·卡尔德隆：《流亡与内地之间》（关于文学流亡），《人类》出版社。

■ 西蒙娜·德·波伏瓦 生命的意志

纳塔莉，西蒙娜的年轻情人之一，说西蒙娜像冰箱里的一块表。纳塔莉感到绝望，因为西蒙娜·德·波伏瓦没有给予她所要的全部的爱，但即使如此也可以说她用对了比喻。西蒙娜，这头“海狸”，这个以其力量和自立的明确榜样影响了几代妇女的巨人西蒙娜，看来在她的私生活里也是如此：勤奋，简洁，冷漠；在构筑她的生活及她与别人的关系上严厉无情。

西蒙娜 1908 年出生在巴黎一个带有贵族陈腐自负气息的上流资产阶级家庭。和其他很多作家一样，她童年也尝到了家庭破落的滋味。她的家庭败落曾轰动一时，很具文学性——当银行家的祖父宣布了一个欺诈性的破产，为此在监狱里关了十五个月，他以资产阶级的手段背弃了家庭。西蒙娜和父母搬到一个简陋的公寓，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在那里不得不辞去仆人。父亲是一个失意的右派，他给两个女儿灌输了一种可笑的优越感，是那种比老鼠还穷的贵族对人类可悲的蔑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蒙娜开始反抗她周围的资产阶级价值，但却一直保留着那种生命的精英感。

西蒙娜高傲，认为比几乎所有人都优越，当然，比不上萨特，她对她的崇拜可能远远超出他应得的赏识。当二十一岁的她与二十四岁的他参加哲学期末考试时，萨特得了第一名，西蒙娜第二名，但评委们确信，“真正的哲学家是她”。萨特一直更具创造性，而西蒙娜则更严谨。她或许该更多地从事散文而不是小说创作（她的小说很差），但在她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传统女性弱点之一中，她一直认为思想的伟大属于萨特，而她只占据一个次要地位。

一次，西蒙娜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她中年时的爱侣，正处在

炽热的恋爱高潮，却突然丢下他返回法国——萨特希望她帮自己修改他的一本哲学书稿。西蒙娜于是对惊愕的奥尔格伦说，“不管是你，还是我的生活，或者我自己的作品，什么都不在萨特作品之上。”她回到巴黎，在那儿遇到的是萨特已和他的轮流情人度假去了。在她的奉献里，在她接受所选择的男人作为主要角色（男人像太阳，女人像行星）中，西蒙娜继承了她的文化遗产——性别的古老规则。但她这个例子有其特别之处，使她变成女性的一个新象征，这就是她作为人构造自我的能力。陈旧的女性牺牲——像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萨特和他一样，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妻子塞诺维亚所完成的自我毁灭的仪式——结束了。西蒙娜指出，女性可以**依赖人**，也可以靠她自己而生存。

毫无疑问，多亏了她的伟大志向，她的自律和努力，波伏瓦实现了那一跨越（她的外号“海狸”——一种不停地工作和建设的勤劳小动物——就是由此而来），但也多亏了她那个时代的条件才能做到这点。西蒙娜的少年生活在二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场战争结束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人好像在发明人类的前途，世界是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地方，技术革命如一团风中之火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在那一切变化之中出现了一种新女性——**解放和自由**的女性，两个时髦的词语。女式紧身胸衣、长到脚踝的呢绒衬裙时代结束了；女孩们剪着**男孩式样**的头发，两腿露在外面，是强健和运动型的；她们打网球，开敞篷车，驾驶危险的小型飞机。那是狂热而神奇的二十年代，激烈而紧张的三十年代，革新的时代。社会思考自身，人们在寻找新的做人方式。必须终结传统的资产阶级道德，在那些年的热情中实践了所有的过激行为。后来在六十年代，人们再次演练了这些仿佛新的行为：自由恋爱，毒品，反文化。

在西蒙娜终身居住的巴黎蒙帕纳斯区，时代脉搏以其所有的强度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列宁、莫迪里阿尼^①经过那里；以毕加索为首的立体派画家和超现实主义者（勃勒东，阿拉贡）在那儿游荡，他们是一支野蛮和爱笑的部队，喝倒彩让戏剧首演告吹，在晚宴和公共活动中冲撞那些思想

^①莫迪里阿尼（1884 - 1920）：二十世纪上半叶巴黎画派重要画家——译注。

正统者——他们干的是一种都市恐怖主义。可卡因在酒吧里泛滥，还有试验幻觉（1935年萨特给自己注射仙人球毒碱，两年里他处于半疯状态——他说一条蝗虫在街上追踪他），服安非他明，酗酒。事实上，萨特陡然的早衰应该和他的放纵行为很有关系——从很年轻时起他就用好酒狂服冲饮安非他明和镇静剂。西蒙娜也过度服用兴奋丸，特别是过度酗酒，她七十八岁去世时患有肝硬化。

尽管如此，在这么多的动荡中，世界还是很天真的。比如，波伏瓦和萨特想出名（“我很有意识地当年轻的萨特，就跟一个人说年轻的柏辽兹或年轻的歌德一样”）和致力“通过文学拯救世界”的想法一直很明确。今天谁会在正常理智下相信文学有助于拯救世界，或者说世界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获得拯救？这种努力的幼稚只能与它所意味的自大狂程度相提并论。因为在这方面萨特和西蒙娜的确是孪生灵魂：自恋，以自我为中心，精英，自大得让人受不了。在她的小说《女宾》中，西蒙娜说她的两个主人公“共同位居世界的中心，他们必须探索和揭示那个世界，这是他们生命的首要任务”，这对人物是对她和萨特的精确临摹（波伏瓦出奇地缺乏任何想像力，甚至在她的小说里也总是谈论自己的生活）。

那个使命通过言语来实现。我很少见过像西蒙娜和萨特那么依赖语言、那么由它并为它而建构的人。从很年轻时起他们就不停地在书写和述说源源而来、永不完结的音节。在蒙帕纳斯的酒吧里，或在两人开设的学院课上，或在与无数情人度过的使人筋疲力尽的晚会上说出的话，那些男孩和女孩渴望倾听他们说话，也同样渴望和他们做爱。写在无穷无尽的书籍、散文、文章及没完没了的古怪通信里的话。伟大而神奇的话语，以此来构建世界（波伏瓦的最好作品是她的多卷回忆录，关于死亡和衰老的书籍，当然还有那篇女权主义的主要文章《第二性》），以及卑鄙、平庸、撒谎的言语；两人死后随着他们信件和私密日记的出版而公之于众的残酷和不体面的话语。

因为有两个西蒙娜，两个萨特——这是关于那对不寻常伴侣的两种解释。第一个版本符合公众的眼光，符合他们尤其是她想呈献的形象，因为西蒙娜是个着魔的以写书信为业的人，她一直在写作和思考自我内心经历这个

单一话题，是她试图建构自己的身份（另外还有萨特的身份），作为一种文学和历史的成就。她讲述自我，或翻译自我。

根据这个更正统的版本，西蒙娜和萨特是那类我们都认识的伟大知识分子，反对崇拜偶像，介入社会（常常是棘手地介入：他们在相当令人羞愧的晚期是亲苏分子），作为敏锐的思想家，他们能够综合概括他们那一时代的基本思想：波伏瓦的女权主义，或萨特与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并以此来宣扬一种新的无神论道德——人类在构建自己前途中的绝对自由和责任。他们不寻常的关系更加吸引人：他们俩之间以“您”相称，从未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在旅馆相邻的房间或同一街区的公寓里，两人都有过各种**偶然**的情人，也就是说，虽然是重要和充满激情的，但是却处于第二位的情人。从外表看，这对不寻常的伴侣好像美妙而不可摧毁（保持了五十一年），是其他可能的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个榜样。就他们自身而言，这种关系仅仅是谈论他们作为存在主义者和情人的图腾话语，**诚实和透明**。

但之后的第二个版本是私下的西蒙娜和萨特。随着他们死后私密文件被发表，两人像一团脏泡沫似的逐渐浮现。我们因此得知萨特是一个强制的和可悲的唐璜，他需要完全征服所有的女性，并为此给她们写大量笨拙的装腔作势的情书，“我绝对的爱，我的小激情，我永远伟大的爱”，重复性的句子同一天在不同信中为同时存在的不同秘密情人写下。因为诚实和透明只存在于西蒙娜和萨特彼此之间使用，被用来互相无耻地评述他们的风流韵事中最放荡的细节。

看来无论西蒙娜还是萨特都需要一群五体投地的崇拜者随从。奇怪的是他们同年龄的朋友很少（情人也极少）：他们更愿意像幸福的菩萨那样统治他们所谓的“家庭”，即一群用爱和崇拜浸润他们的青年学生和弟子，他们为这些人支付房租或看病的费用，在生活上负担他们，从不松开脐带，以此保持这些人的软弱和对他们荣耀的依赖。双性恋的西蒙娜与萨特建立了几个三角关系：例如分享他们的女生奥尔佳和路易丝，当她们爱上也很年轻的波伏瓦时还不到十八岁（这些姑娘的年纪最终成了问题：纳塔莉的母亲 1943 年控告西蒙娜侵犯未成年人，波伏瓦被开除出教育界）。总之，萨特和西蒙

娜陷入的情感圈套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剧那样愚蠢、复杂和可笑。

比如在战争期间，西蒙娜同时与博斯特，萨特的一个学生，与纳塔莉、路易丝和奥尔佳保持秘密关系，只有萨特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存在；如果不是因为波伏瓦和萨特在他们的信中使用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优越、残忍和轻浮的语调，这事不必受到指责，甚至不让人感到奇怪（谁没有在他一生的某个时刻经历过疯狂的时代？）。谈及一个他承诺了永恒的炽热爱情的情人时，萨特对波伏瓦说，“宛达长着一个蚊子的脑袋”；评论另一个情人，“她是个十分结实的女人，她用一个电动吸尘器的马来吸嚼我的舌头”。在向他们共享的可怜的路易丝发出冲动的激情誓言（“我想让你知道我热烈并永远地爱着你”）之后，便全然冷酷地指责她，并计划着将对她说的谎言，“以便她幸福而又不太烦人”。波伏瓦最卑鄙的评论之一便是关于这位路易丝的：她抱怨女孩有难闻的体臭，让性交很“痛苦”（虽然西蒙娜并未因此停止与她同床）。

阅读两人的信笺和私密日记最终勾画出一幅有点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像：在最坏的事例中他们像是军营里的战友，分享着获胜的肮脏荣誉；在最好的情形中，他们是冷漠和残暴的昆虫学家，能够把所有的生命当做纯粹的文学素材加以解剖。“我确信我是一头猪”，萨特时常说；波伏瓦则急于使他信服相反的事：自我吞噬的纯粹空洞话语。“当我看到所有那些失败和所有像路易丝或奥尔佳等这些亲切又软弱的孩子时，就想到我们，您和我，是多么坚强，这令我高兴”，陶醉在自我满足中的西蒙娜对萨特说。那好像就是波伏瓦在别人身上寻找的东西：她自身伟大的镜子。因此她说纳塔莉：“她爱我至少像路易丝爱过我那样”，一句无疑揭示她与别人交往方式的话。面对一个新的爱情，一个人会习惯于突出自我的情感（**我爱她胜过爱任何人**），而不是对你所接受的爱情数量做商品性的比较计算。

那种对他人情感进行冷漠无情和昆虫学式的利用付出了它的代价。在三角恋爱持续的两年里，奥尔佳精神失常，以至后来把香烟熄灭在手上。在她年老时看到萨特的私人信件，是萨特死后由西蒙娜发表的；当看到他们在信件中是如何提及她时，奥尔佳厌恶至极，遂与西蒙娜决裂，并于几个月后去

世，至死没有与西蒙娜和解。至于美国作家纳尔逊·奥尔格伦，当他七十二岁时在一个记者面前回忆西蒙娜滥用他们的关系，当时因愤怒使心脏病发作而死——西蒙娜在小说《名流》和她的回忆录中都谈到了自己和奥尔格伦的关系，并将他们的关系“厚颜无耻地”公开发表，包括奥尔格伦写给西蒙娜的信件段落，这是他不能原谅她的地方。

或许萨特无法真正爱任何人；相反，西蒙娜可以：她忠实地爱着萨特，或至少深爱着她为他虚构的爱情。我的意思是，在波伏瓦塑造自我的坚强努力内部，也为一个完美爱情设计了一个位置。因此她能忍受萨特的怪癖和怠慢；是西蒙娜在维持着这段穿越时间的历史，甚至当她与其他人（如与比她小十七岁的记者克洛德·朗兹曼的交往，他是惟一与她共同生活过的男人）保持密切关系时。

但生活经常是残酷的，不管人类意志多么强大，都无法与命运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蒙娜和萨特逐渐互相疏远。两人的晚年都是各自与比他们小三十多岁的女人度过的：在萨特那里是阿莱特，在波伏瓦那里是西尔维。两人都将她们作为自己的女儿合法领养了；每个人都慢慢地建立了一个不平常的关系世界。萨特的最后七年是最悲惨的：这位哲学家失明了，可能大脑也受了影响。他开始发表一些西蒙娜不理解也不赞同的很没水平的见解。这是最后的背叛——他们不再是只有一个脑袋的两具躯体。西蒙娜向她的传记作家弗朗西丝和贡捷叙述了萨特的临终时刻：他躺在医院的床上，闭着眼睛说：“我非常爱您，我心爱的‘海狸’”，并向她献上嘴唇，她亲吻了他的嘴唇；然后他睡着并死去。感人的场面，一个完美爱情生活的文学性高潮，弗朗西丝和贡捷在他们精彩的书里发表了这段叙述，以为那是真的。但真实的情况是：萨特死时是阿莱特跟他在一起。西蒙娜是后来赶到的，并试图钻进病床与尸体躺在一起。

西蒙娜这个悲哀的谎言只是证明了她接下来行动的可悲。因为阿莱特过去是，现在还是萨特的合法继承人，是他所有作品的遗嘱执行人（萨特这么做对西蒙娜是极其无法忍受的残酷）；所以为了把历史重新引到按西蒙娜的意愿设计的框架内，她创作了《告别仪式》——她的关于萨特最后几年的惊

世之作；当阿莱特出版这位哲学家的遗稿时，她便发表了萨特寄给自己的信：每句话语，都是一条纽带，把萨特的形象与她的形象连接在一起。

波伏瓦只比她的神话伴侣多活了六年，她死于 1986 年。1990 年她的养女西尔维出版了波伏瓦那些如此不清白甚至卑鄙的私人信件全集。西尔维为什么决定出版？出于纪念西蒙娜的爱心？为了钱？为了报复？关于西尔维和波伏瓦的关系人们一无所知，这种关系在女作家生命的最后二十三年里延续，西蒙娜有时甚至把它和她与萨特的关系相比。可以肯定的是，发表波伏瓦的私人文件玷污了这位女性的神话。波伏瓦如此肆无忌惮地传播别人的私生活，很快自己就变成了下流闲话的对象——或许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公正事例。但不管怎样，现在她的形象更加复杂却也更加人性了——因为在我们的私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要掩盖的耻辱和不相称的事。最终，在如此多的荣耀和如此多的不幸之间，留下的是她的自由和对自我命运负责的壮丽功绩。是好是坏，波伏瓦都成就了她自己。

参考书目

- C. 弗朗西丝，F. 贡捷：《西蒙娜·德·波伏瓦》，普拉萨 & 哈涅斯出版社。
- 西蒙娜·德·波伏瓦：《一位正派姑娘的回忆录》，《生活的完满》，《事物的力量》，《解说的尾声》，《再见的仪式》，《战争日记》，《致萨特的信》（I, II），艾达萨出版社；《第二性》，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由艾达萨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和短篇小说。
- 由阿吉拉尔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全集。
- 让-保尔·萨特：《致“海狸”的信》，《战争笔记》，艾达萨出版社。
- M. 克罗斯兰德：《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及她的作品》，海涅曼出版社（伦敦）。

■ 奥托兰·莫雷尔夫人 奢华与伟大

许多年前我就知道奥托兰·莫雷尔夫人的存在，如同一个人得知大西岛神话的存在——她是一个在不同的语境中一次次重复的传奇引述。奥托兰带着她一米八五的身高，她的马脸和火红的头发出现在一支不列颠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军团的信件或日记里：那些在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一时间度过他们成熟期的人。那是埋葬了维多利亚社会并坚持要让它纤弱僵硬的道德活跃起来的一代人；所以他们要求情感的东西，整天细致详尽地分析他们烦恼的内心生活。由于他们来自一个肉体和感情都不曾存在的权力及秩序的世界，谈论头天夜里与之同床的情人便是一种革命行为。

也许因此，因为他们对自己用尽心思，那代人的组成者是一些着魔的以写书信为业的人，当他们不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点什么时，他们就给另一些人写大量的信件。以所有那些资料为依据，已经出版了无数的书籍（传记，自传，书信集），其中很多都很吸引人；它们都把一个万花筒式的、庞大而古怪的奥托兰·莫雷尔作为背景人物加以呈现。就是那位奥托兰，几十年里举办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和知识沙龙，具有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风格：出入那里的人，只列举几位，不仅有所谓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全体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利顿·斯特雷奇、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等），还有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亨利·詹姆斯、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奥尔德斯·赫胥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尼金斯基、W. B. 济慈、伯特兰·罗素、罗伯特·格雷夫斯、萧伯纳、格雷厄姆·格林和查尔斯·卓别林。

奥托兰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导师和保护人，她是大家的保护人，是若干人

的情妇。比如，她是画家奥古斯塔斯·约翰^①和伯特兰·罗素的情人，她与后者保持了一段长期且非常重要的关系，对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生活和创作很关键。“奥托兰深深打动了男人们的想像，那或许是一个女人所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戴维·赫伯特·劳伦斯以男性的无拘无束说道。的确，她那时代最重要的画家都为她画过肖像，一大帮作家把她变成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黄铭》，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她是作品中的赫来欧妮）和格雷厄姆·格林的《这是一个战场》。

但所有这些肖像大部分是粗野和嘲弄的。在那些信件和小说里，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成员，把恶意变成一门艺术的著名搬弄是非者）对奥托兰肆意践踏，勾画出一一种粗俗的丑角面目。他们表露出如此的残忍——如果你知道她很欣赏他们，照顾和养活他们几十年，你会对这个人物越发感到迷惑：你会问自己，奥托兰为何选择了这么糟糕的朋友。

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封信中写道，“奥托兰在伦敦不无庄严地炫耀，仿佛是一艘已经被老鼠吃掉船帆的船，桅杆生锈了，绿色的海蛇在甲板上滑行。”“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形象都永远不能传递那种她独有的显赫与卑微及虚伪的结合。她一边把香粉撒在地板上，一边问：‘弗吉尼亚，女人为什么化妆？’”这是奥托兰式讽刺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么多恶意，又描写得这么好。尽管弗吉尼亚除了不忠的舌头，还有一副好心肠，因此在她生命的其他时刻能够承认并钦佩奥托兰的价值。

总之，她的绝大多数形象一直是一个可怜的怪女人，一个衣冠不整、面貌极丑的没落贵族形象，头发糟糕地染成红色，过分化妆的脸庞像一件旧家具。但如果你留意字里行间的阅读并寻找其他资料（尤其是西摩撰写的奥托兰的精彩传记），那浮现出来的奥托兰的肖像则是十分不同的。

首先，她根本不丑。直到四十多岁，她还被认为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拥有一头闪亮的铜色秀发，一双有神的绿眼睛，一副雕塑般的身躯。一个女人，曾是她那时代最著名的美人之一，到老时却变成了可悲的丑陋之

^①奥古斯塔斯·约翰（1878-1961）：威尔士油画家、壁画家和肖像画家——译注。

象征本身，这令人不安。但奥托兰的美，就像她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濒临过度。她很高，她的五官太大，她的模样过于别致。照片证实了那种不牢固、不寻常的平衡：在有些照片里她美极了，在另一些中则很可怕。她向来不是普普通通的，她永远不会被忘却。

她的独特，她潇洒的生活，大概招致了人们对她的诽谤——“布卢姆斯伯里团体”总是恶意攻击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如果他们的牺牲品在攻击面前好像并不痛苦，甚至表现得若无其事和高傲，那他们的批评就会更猛烈。奥托兰受教于不列颠贵族和维多利亚主义双重的自我节制，总是力图保持一副平静的外表。她出生于1873年，属于不列颠的最高贵族。六岁时她的异母兄弟继承了波特兰公爵的称号，她开始被所有的人谦恭地待为夫人；她的社会环境如此古老和高贵，以致不期待她独自穿衣或梳头。自然，这样的一个贵妇人不应该学习和从事任何工作，除了找一个合适的丈夫并扮演她自己。

但奥托兰充满抱负——她有对艺术、知识、精神和博爱的渴望。当然她不可能计划任何一种专业——像她那样的妇女是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于是她把她的创造能力用在为自己设计美妙的服饰，以东方的想像装饰相继成为她聚会中心的三个家：伦敦贝德福德广场的家；牛津附近的乡间加辛顿庄园；重回伦敦，位于高尔大街的家。她的博爱精神集中在帮助他人——艺术家、青年知识分子，她善于以准确的直觉发现他们的品质。

她开始在自己的沙龙接待客人时已三十四岁，结了婚。她喜欢创造一种童话般魔幻而浪漫的氛围。她的家散发着香气，充斥着精致和富有异国情调的小物件。她的仿若神话般的聚会是在加辛顿乡间庄园，1915年她搬到那里。加辛顿庄园里总是挤满了客人，酣战中她丰盛而神奇地款待他们；中央建筑像一个精致的糖果盒，摆满了柏树、雕塑和孔雀的花园，是“第一花园”，是天堂。因为奥托兰不仅喜欢当一个传统意义上她朋友的保护人（支持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介绍给有影响的人物，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他们的生活），而且试图把他们笼罩在一个神奇的环境里，把她作为女主人的生活变成一个艺术品。于是她组织字谜，假面舞会，花园里精致的野餐，月光下的舞蹈，音乐会。她渴望绝对的美，这使她在客人中引起很大的嘲笑。他们比

她年轻许多，他们已属于二十世纪。这就是说，属于一个发现不存在绝对之物的犬儒主义时代。

而奥托兰是一个完全不合时代潮流的人。她的时间是不真实的——她像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那样行动、穿着和说话。但也是一个虚构的、从浪漫主义角度用许多金属粉和纸板重塑或想像的文艺复兴。“在加辛顿至少太阳光会是正常的吧？”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给一位女友的信中自问，“不，我认为甚至天空都用一块淡黄色的丝绸给遮住了，自然那些圆白菜也喷了香水。”奥托兰那种无微不至的精致喜好让她那些居心不良的朋友感到开心——他们都是活跃的艺术家的朋友，不能理解奥托兰在自己所拥有的惟一环境里，在家庭生活的琐碎事务里，创造美的感人需求。

可能奥托兰有时在创造幸福的渴望方面有点荒唐，在她想把那个幸福赐给别人的方式上有点喜欢发号施令。但加辛顿庄园应该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一座奥林匹斯山，青年知识分子在那里占据着神的位置（有一天，当时任首相的阿斯奎斯^①和梅纳德·凯恩斯^②来访，他们被通报为“凯恩斯先生和另一位绅士”）；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客人像苍蝇似的蜂拥而至——不管之后他们如何嘲弄奥托兰，显然，他们喜欢去那里；加辛顿也是一个文化迪斯尼乐园，谁都不公开承认自己在那种艺术纯真，同时又美丽、幼稚的环境里尽兴。“我在这种场合感到可怕的孤独，”利顿·斯特雷奇在一次造访之后写信给一位朋友，“一种十八世纪式的忧郁快乐压倒了你，很难把人与哈巴狗区分开来。”可是他也致信奥托兰，说他在加辛顿庄园的逗留是多么愉快，并急切地自我邀请下次再去。

奥托兰不仅是一个完美的艺术沙龙的女主人和一位积极的文学及艺术保护者（她与罗杰·弗赖^③一起坚定地推动后印象主义进入大不列颠），而且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绥靖政策中扮演了一个突出的政治角色。如果伯特兰·罗素是这场运动的英雄（他因自己的批评文章而最终身陷囹圄），

①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自由党内阁首相（1908-1916），第一次世界大战头两年的英国领导人——译注。

②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财政家和报刊撰稿人，因针对长期失业提出革命性经济学说（凯恩斯经济学）而知名——译注。

③罗杰·弗赖（1866-1934）：英国美术批评家和画家，为后印象派画家正名的先锋——译注。

她就是旗舰。她鼓动丈夫，工党国会议员菲力普·爱德华·莫雷尔，在国会宣读了一份绥靖主义演讲，菲力普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勇敢地做了此事，并因此永远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他的仕途直到那时也并不很辉煌）。之后奥托兰把加辛顿变成一个不同政见者的援助中心，雇佣他们来耕地——种植农田被政府视为一项首要工作。

这样，在战争年代，奥托兰夫妇供养了五六个不同政见者，他们绝大多数是懒惰的艺术家，根本不会干农活。他们只是利用奥托兰，以为她富不可及。但她并不十分富有（她母亲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她慷慨的女主人生活带来的巨大开支开始消耗她的财产。事实上，她最终面临那么多的经济困难，以致被迫卖掉贝德福德广场的家和加辛顿庄园，搬到高尔大街一所阴暗而简朴的小房子。但所有这些困窘，连同她的许多其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她的朋友们从来都一无所知。

奥托兰的丈夫菲力普是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人。他很有吸引力（奥托兰的所有情人，除了罗素，都很英俊），在有些场合表现出罕见的高尚，如发生在国会的绥靖主义演讲。又如他去一个德国旅馆与奥托兰相会，前几个星期她曾在此接待了罗素的造访，旅馆的清教徒店主告诉菲力普一位先生每天进出他妻子的房间，甚至连卧室的沙发都被他的香烟烧坏了。菲力普听后笑了笑，赔付给店主沙发的损失，并说他很高兴妻子没有缺少陪伴。但另一方面，菲力普看起来软弱和优柔寡断；奥托兰试图给他创造一个政治前途，一生都宠爱他，保护他。从他们一结婚，菲力普就向她表明，她在性方面不能吸引他；但女仆倒是吸引他，他有两个私生子，一个是与一位女仆生的，另一个是与他的女秘书生的。此外他的心理很脆弱，中年时期他就遭受到一次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有一个道义令人不安，我们经常会遇到因被他人的需要缠身而使自身困于弱者请求中的妇女。这点也发生在奥托兰身上（“我是一个吸引自私者的磁石”），她已经受过一个残废且占有欲极强的母亲的欺压。从那时起，她所有的情感史都一样——她总是付出得更多。或许她已不再有激情（罗素曾为她而疯狂，但奥托兰拒绝抛弃菲力普），但的确给予他更多的照顾，更多的

关心，更多的宠爱和亲热，直至她中年时美丽的**老虎**莱昂内尔来临。

当奥托兰爱上**老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加辛顿庄园的园丁时，她已满五十岁。**老虎**是个好人，慷慨大方，并且被她迷住。奥托兰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伴侣，“我爱的时候总是付出，现在终于允许我得到了。这是一个奇迹。”奥托兰与**老虎**的热恋关系持续了两年，直到有一天小伙子突然死于脑溢血——一个加入奥托兰传奇的奇怪死亡。既然人们乐于虚构浪漫的荒唐行为，为什么不能设想是由那时精神已经失常的丈夫下的毒？这些是床第间的秘密，是所有人都要保留的不可思议的隐私。

奥托兰以巨大的勇气承受痛苦地失去**老虎**，像她忍受从前的一切那样。从小她就忍受十分脆弱的健康，她患上极痛苦的偏头痛以及其他大概是糖尿病征兆的不明疾病。总之，她是一个慢性病患者，这是十九世纪上层社会妇女中间相当平常的事；她跟厌食的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厌食是那个时代女士间的一种常见病），年轻时拒绝进食。五十五岁时她发现得了一种颌癌——粗暴的手术使她面目变形。那时她的朋友才发现奥托兰能够无怨无声地承受痛苦。

她那时的生活是在穿越沙漠。她那么不因循守旧（她常说“因袭常规和自我满足就是死亡”——一个有活力的思想），不得不付出高昂的社会代价。她受自己同阶层的人排斥，从未被她所帮助过的知识分子接受，奥托兰是一个孤立和孤独的人物。她破产了，丈夫变得半疯，她至爱的人死了，她忍受着折磨人的肉体病痛，脸变形了，逐渐失聪，使用一个滑稽的助听器，她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加辛顿庄园。最糟糕的是，她的朋友一次次地背叛她。开始是出现一些包括对她进行残酷写照的小说（最痛苦的描写是劳伦斯和赫胥黎的，因为这些作者曾是奥托兰的密友），之后通过朋友的朋友，她渐渐得知所有人都在背后嘲笑她：“把我视为一个爱搞阴谋和危险的、不道德和肮脏的女人……谁也不喜欢我……我为此所经历的那一切都被推翻了。我以为是在给予别人的东西其实只存在于我的头脑里——别人不喜欢。如果能扔下菲力普，毫无疑问，我会远远地离开这里，在另一个地方开始我的生活。但我不能这样做。”她在日记中写道。

尽管如此，她仍尽量在外面不让任何人知道她的屈辱和痛苦。于是她继续在高尔大街那个简朴的家里接待客人（虽然现在只能请人喝茶），穿着便宜的金黄色破衣服，胡乱地染白头发，加倍化妆以减少疾病和时间所造成的损害。一言以蔽之，不论什么情况，她都试图忠实于自我，准备继续把生活变成一个美丽和适于居住的地方。面对奥托兰如此的沉着，弗吉尼亚·伍尔芙感到震惊，她为此最终敬佩奥托兰，并深深地爱戴她。事实上她们成为密友；当奥托兰因长期患有神秘的疾病于六十四岁去世时，弗吉尼亚和艾略特一起写了这个墓志铭：“忠诚而勇敢/最慷慨，最优雅/在她娇弱的身体里/却保持着/一种无畏和不屈的精神。”奥托兰巨大和不同寻常的高尚在于她以绝对的尊严（她是这么热爱绝对的事物）逐渐变成一个衰落和可悲的人物。

参考书目

- 贝特朗·罗素：《自传》，艾达萨出版社。
- 昆廷·贝尔：《弗吉尼亚·伍尔芙》，卢门出版社。
- 弗吉尼亚·伍尔芙：《纸镖》，奥丁出版社。
- 克莱尔·托马林：《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马丁出版社（纽约）。
- 迈克尔·霍尔罗伊德：《利顿·斯特雷奇》，企鹅出版社（伦敦）。
- 米兰达·西摩：《奥托兰·莫雷尔，高级别的生活》，法勒·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纽约）。

■ 阿尔玛·马勒 带着钢爪

阿尔玛·马勒（出生时叫阿尔玛·申德勒，是著名画家申德勒的女儿）是一位艺术家。她九岁开始作曲，二十岁时已创作了一百首浪漫曲和器乐及歌剧片段。她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在维也纳，人们对她很有前途的才华赞不绝口。当然谈论得更多的还是她的美貌，因为那时妇女身上的才能不过是一种装饰或一种怪诞的表现。阿尔玛是那个时代的大美女之一：颀长，丰满，碧蓝的眼睛，完美的五官。从今天来看，她的五官或许过于端正和甜美，体形过于丰润，但在那个时候，她集中了时尚的所有特征。不管怎样，她神话般的吸引力大概来自她自身的性格，而不仅仅在于外表。她迷人，聪明，文雅，耀眼，独特。她周围的男人简直为她疯狂。

魔法师，善良女巫，大地母亲——男人们拿这些话来形容她。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重要词语，把阿尔玛定义为女性的一个典范。她是“女人”，一个出自男性头脑、梦想和恐惧的典范。阿尔玛适合他人设想的那种幻象，因为她的伟大成就（以及她的彻底失败）在于能够满足男性要求。这样，阿尔玛作为一个缪斯女神生活在男人的视线里，是他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她的第一任丈夫、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奥斯卡·考考斯卡，热恋她三年的情人；建筑师瓦特·格罗皮厄斯，她的第二任丈夫，包豪斯学校的创办者；弗朗兹·魏菲尔，她的第三任丈夫，一位今天已被人遗忘，但在那个时代却十分有名和受赏识的小说家。许多绅士曾拜倒在她的脚下，虽然阿尔玛与他们的关系只是柏拉图式的，如古斯塔夫·克里木特，知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或剧作家及诺贝尔奖得主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尔玛具有识别创作才华的出色嗅觉，那正是她令人爱慕之处。

阿尔玛对她的所有男人都非常好。她是母亲和情人，无微不至地料理家事，以令人敬佩的方式管理经济，精心组织家庭生活，有效地参与自己爱人的工作（比如抄写马勒的音乐，并为之配器）。最为重要的是，她能使伴侣复苏，把他作为艺术家最好的东西挖掘出来，并给予他力量——“你恢复了那些废物的生活”，考考斯卡对她说。甚至生物学家保罗·卡默勒也评论说：“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积累了创作所需要的能量”，尽管阿尔玛从未回应过他的爱慕。阿尔玛是一种生存能源，她能够点燃五彩世界。

那种内在电源，那种生命潜力，在爱情里一次又一次重新充电。但不是在在一个简单的日常爱情里，而是在最冲动的激情里。在那种浪漫和毁灭性的感情里，它是想像的产物，因为它而寻找与他者、与孪生灵魂的绝对融合。一个不可能的苛刻目标，总是会导致无穷尽地重复寻找爱情。阿尔玛十三岁时失去了她所崇拜的父亲，她把男人和艺术家都神化了。当她恋爱时，便在对方身上虚构完美；当她的伴侣看到自己像一个神似的反射在她的眼里，便更加看重自己——如果一个如此美丽、聪明和出色的女人把我视为神圣，那是因为我就是神圣的。但随后，笨拙的现实逐步削弱她的那些白马王子的泥脚，阿尔玛渐渐失恋，痛苦，消沉。她需要重新唤起激情，重新爱另一个人，这样她才能感到自己活着。冲突从此开始。

所有这些内心的骚动都发生在一个同样动荡的环境里。阿尔玛 1879 年生于维也纳，也就是说，出生在动荡的中欧，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中心。这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像通常发生在所有巨大衰落中那样，奥匈帝国的垂死也伴随着一次知识和艺术的沸腾。一个世纪以前的维也纳正在欢快地耗尽它末日的荣耀——在文学沙龙和拥挤的咖啡馆里讨论着神性和人性，调情，谋反，创造。那时在那里出现了知名的“维也纳学派”这一重要的哲学流派；洛斯发明了现代建筑，勋伯格发明了十二音体系音乐；罗伯特·冯·穆齐尔，尤其是卡夫卡，革新了文学，弗洛伊德发现了（或更确切地说命名了）无意识，永远改变了我们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生活在紧张的维也纳燃烧。

这是一种疯狂、沸腾和享乐主义的生活，妇女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特殊角

色。在当时的欧洲，维也纳女人被视为男性神话里女人－妻子的化身：尖酸，耽于声色，秘密，对男人来说充满危险性，悲哀同时快乐，易动情欲，无法理解。梅尔塞·罗多雷达在她的小说《破碎的镜子》里描写了十九世纪末典型的维也纳女人：一个年轻的女小提琴家为主人公献身，然后自杀——女性之谜的完美例子。阿尔玛·马勒是所有维也纳女人中最“维也纳化”的，是那些泡沫女人的王后。这些维也纳女子置身于轻盈的花边旋涡里，紧贴男人的胸口跳着华尔兹舞，生命在脉搏里跳动，被巨大的枝形吊灯闪花了眼。

但我们还是回到开头：阿尔玛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很严肃地自视为一位作曲家。与此同时，她长大了，开始讨人喜欢；她拥有年少的狂热，美女的轻率。她恋爱了一两次，到处散发自己的照片，享受调情。尽管如此，她的音乐依然是首要的，直到二十一岁时她认识了古斯塔夫·马勒。他的年纪比她大一倍，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我可以想像阿尔玛在剧院观看他指挥乐队：他站在那中间，很有气势，是所有关注和荣耀的中心。他是“伟大的男人”，她可以在他身上创造一个“伟大的激情”。他们立刻结婚了，这不奇怪。

但在婚礼之前举行了一个把他俩引向毁灭的极其古老和传统的仪式：阿尔玛作为人被取消了——一封马勒写给阿尔玛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信，概括了那个时代所有的陈词滥调、偏见和不公平。首先，马勒站在他年纪和成功的高度嘲讽阿尔玛的知识才能（她博览群书，很有文化），称她是“傲慢的人”，因为她在一些特定的思想方面敢于说出反对他的观点。信中写道：“阿尔玛，我的女儿，我们将结合在我们的爱情和心灵中……但这种结合也在我们的思想中吗？我的阿尔玛，你的想法是什么？或许是叔本华关于妇女的那一章？”在用这类论据打击年轻的阿尔玛对自己和自我标准的信任后，马勒进入正题，“关于你要求继续做你自己的想法，我还在琢磨那个已固定在我这么热爱的小脑袋瓜里的痴迷念头。你写道：**你和我的音乐**。请原谅，但我还是得讨论这个说法！你怎么能够想像两个都是作曲家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生活？你知道对我们俩来说，像那种这么竞争的关系有多荒唐，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件多丢脸的事吗？既然如你所写，你想让我免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可是如果正当你的灵感来临时，你却被迫照料家务或出现的任何一件事，该怎么办？如果你不得不完全放弃**你的**音乐，作为交换，你拥有我并且你也是我的，那就意味着你的生活毁了？……你只该有惟的一个职业：让我幸福的职业。你得放弃所有那些表面的东西（所有与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得无条件地献身于我，你得让你未来的生活在所有细节上都服从我的愿望和需要，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别的什么”。

收到这封信，在一整夜的失眠和哭泣之后，阿尔玛如马勒信中要求的那样做了，或发誓那样做了。毕竟**她的**音乐还很幼稚，在咿呀学语。她需要学习的东西这么多，所以看来世界不会因她的放弃而失去一个超级艺术天才，而很显然，马勒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家。此外，周围的一切都在劝阻妇女的职业努力，相反却起到巩固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作用。就这样，阿尔玛牺牲了她的事业，于1901年结婚。“我惟一的愿望是使他幸福，他值得这样！”她动情地说到她光彩夺目的丈夫，而此人看来根本配不上她的牺牲。这就埋下了祸根，男人和女人之间发生如此多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男人把婚姻视作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女人把婚姻视为一个甜蜜的童话故事。

阿尔玛与古斯塔夫生活的十年并不成功。在她有趣的自传中，阿尔玛抱怨丈夫以自我为中心，很少注意她。根据所有资料，马勒埋头于自己的作品里，他严厉，乏味，而且好像还是性无能。阿尔玛哭泣，痛苦，生病，患忧郁症，她怀念自己的音乐，不甘心生活的空虚。当她在温泉疗养地从一次痛苦中恢复后，认识了比她小四岁的瓦特·格罗皮厄斯。他们相爱并经历了一场热烈的地下恋情；一个月后，在一次原本会造成弗洛伊德式笑话的差错中，格罗皮厄斯把一封写给阿尔玛的情书误寄给古斯塔夫。马勒看到这封信，目瞪口呆。阿尔玛于是向他解释一切：与格罗皮厄斯的经历，以及她在婚姻中的不幸和失望。马勒被剥夺了阿尔玛的目光赋予他的神圣，陷入完全的绝望。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她，待她又是多么不好。现在他第一次倾听（过去他从来不屑于此）妻子的一些歌曲：“可是我都干了什么！”他

悔恨地叫喊。“歌曲美极了。你应该继续作曲。”他开始向她倾注爱的关怀，在圣诞节送她礼物。但为时已晚。阿尔玛心软了，对他说，她会留在他身边，放弃格罗皮厄斯；但她继续秘密约会情人，因为她虽然很喜欢马勒，却已不爱他了。她需要爱才能生活。最后，不安、受惊和感人的马勒得了扁桃腺炎；不久他被告知得了败血症，半年后马勒逝世。如果他们把婚姻关系定位在一些更加脱离偏见，更为平等的条件下，他们大概会比较幸福。

阿尔玛守寡时三十一岁，“到了这个地步我已不能重新学走路”，她评论自己当作曲家的工作。她永远地放弃了音乐，也永远不再允许一个男人像马勒那样监管她。不论是比她小六岁，与之度过她最富激情经历的考考斯卡（因她的抛弃，考考斯卡疯了，他叫人在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上复制她的五官，与它共同生活了一年，之后在一次聚会上砍了它的头）；还是格罗皮厄斯，她所有男人里最恭敬有礼和最慷慨的一个，或许正因为这点她对他最差（“我只想让这个男人幸福”，阿尔玛与他结婚时又说了这句话；但这回她补充道，“愿上帝为我保留爱情！”她已经知道永恒的激情很快就会结束）；或者她的第三任丈夫弗朗兹·魏菲尔，他比阿尔玛小十岁，和蔼而不成熟。

与此同时，生活逐渐向她索取高昂的代价。阿尔玛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是带着极大的痛苦死去的：马勒的一个女儿五岁时在无麻醉的情况下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死于白喉；另一个婴儿，魏菲尔的儿子，得脑炎只存活了十个月；第三个是玛依·格罗皮厄斯，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整整一年处于病危，当时她已十六岁。她的死，对阿尔玛来说是最残酷的丧失。阿尔玛的世界，她成长的世界，也染上了死亡。轮到她经历十分艰难的岁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把一些粗暴的和平条件强加给战败国的凡尔赛和约；之后是纳粹主义的地狱。

希特勒的纵火（我们要记得他是1933年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是在一片满是屈辱、贫困和绝望的大地上点燃的。在德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为了使工资能买得起晚餐，需要按天发放薪水。积蓄消失了：银行通知你关闭账户的信件邮票都比你三十年里存在那个账户上的储蓄更值钱（亚瑟·索姆森在他的迷人小说《一位公主在柏林》中对这一切做了很好的解释）。在这

么多苦难和不安定中，革命点燃了街道：一场刚刚在沙俄帝国颠覆了秩序的真正革命，一场对资产阶级来说可怕的革命。所以资产阶级支持反布尔什维克者的新兴纳粹。甚至犹太富人起初也帮助纳粹分子：在奥地利，极右派依靠一份犹太产权的报纸，从一个犹太企业家那里获取他们的武器。

阿尔玛是亲纳粹分子，或更确切地说，她是亲法西斯分子：她相信墨索里尼计划的善意，排斥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奇怪的是，阿尔玛的日记充满了反犹太主义的愚蠢评论，然而她却与两个犹太人结过婚（马勒和魏菲尔）；当希特勒的恐怖在欧洲蔓延，她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与魏菲尔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不得不在最可怕的条件 下穿过整个法国，步行翻越比利牛斯山以逃生（她那时已六十多岁）。那是希特勒看似当然的胜利者的年月，阿尔玛无疑可以采取另一个姿态：事实上她全家在维也纳都变成亲纳粹分子。另一方面，魏菲尔是亲共分子（“弗朗兹为列宁的逝世写了一首诗！”阿尔玛在她 1928 年的日记里惊惧地写下这句话），两人之间激烈的政治争论使婚姻处于危机边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间带来的揭示，两人都克制了许多。“我和魏菲尔收获了失败”，几年后阿尔玛写道，“他在青年时代相信通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的世界革命，他无法预见那将变成什么。我相信通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来拯救世界，我也无法预见经由希特勒的行动那将变成什么。”

除了她变幻无常的亲法西斯主义和自相矛盾的反犹太主义偏见，阿尔玛还有其他阴暗面，比如她的嫉妒和占有欲到了无耻的地步，她与其他女人如此残酷地争抢在男人面前的优越，使她从来没有女友（我认识那种需要独一无二的女人：她们很让人讨厌）。我同情她可怜的妹妹格雷蒂，想必阿尔玛给了她一个恐怖的童年。阿尔玛从未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她，尽管格雷蒂遭受了可怕的命运：她压抑，在几次自杀企图之后，被关进一个精神病院。希特勒入侵奥地利后（1938 年），纳粹宣布消灭所有的疯子，她在那里被处决。

可是即便阿尔玛不是一个圣女（谁是圣女呢？），我仍无法理解人们通常对待她的反感和吝嗷。例如，她被视为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轻浮的女人，草率的女人；然而，她一生只与四个男人（或许五个，还有一个神甫，似乎可疑）同过床，其中三个是她的丈夫，她与马勒生活了十年，与魏菲尔生活

了三十年，直到两人去世。这不像是一位毫无廉耻的女性征服者的履历。法国前文化部长弗朗索瓦丝·吉鲁写过一部关于阿尔玛·马勒的独特而有趣的传记，在她评判的任意性上到了不体面的程度。但这是因为这位前任女部长是个右派女士，对打破常规的妇女来说，最坏的敌人就是保守派妇女。比如吉鲁谈到马勒在他生命的最后发现正在失去妻子的时刻，“日后她将是这个疯子臣民的残酷女王”。但实际上阿尔玛不是什么冷酷女王：她以绝对的奉献和爱在持续六个月中，致力于照顾病危的马勒，就像后来在魏菲尔两年垂危期间的所为。

阿尔玛从很年轻时起，在她与马勒失败的婚姻期间就开始酗酒，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她每天喝一瓶本尼狄克丁开胃酒。尽管如此，她还是活得很长久：八十五岁时死于纽约，她在那里有一个小公寓。如果她生活在我们的时代，我确信她不会放弃音乐。作为作曲家，她会拓展一个公众职业，不管好坏。在她的时代，她本人不能也不知道应该这么做，虽然她一直意识到自己的矛盾，“婚姻常常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女人身上取代她的自我”，她在日记中写道。接下来，她对自己在男性面前的次要地位补充了一种自我鄙视的苦涩嘲讽：“我用钢爪逐步建造我偷来的窝……对我来说各种才华都不过是我所需要的稻草……对我的窝来说是一点战利品。”然而她用那同一副钢爪抓住生命；她生活，高强度地生活，不顾众多的苦难和所有的局限。“我有过一个美好的生活，”阿尔玛在她自传的结尾说，“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但他也得准备应付一切。”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表现出这样的无畏。那大概就是她不被原谅的地方。

参考书目

- 阿尔玛·马勒－魏菲尔：《我的一生》，图斯盖慈出版社。
- 苏姗娜·基根：《阿尔玛·马勒》，帕易多丝出版社，“见证”系列。
- 伊莎贝尔·玛格丽特：《阿尔玛·马勒》，行星出版社。
- 弗朗索瓦丝·吉鲁：《阿尔玛·马勒》，诺盖尔出版社。
- 亚瑟·索姆森：《一位公主在柏林》，图斯盖慈出版社。

■ 玛丽亚·莱哈拉加 沉默

我要讲的故事令人惊奇。这不仅是因为女主人公迷人的人生曲折，而且因为我们对她一无所知。我说的是玛丽亚·莱哈拉加，二十世纪初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的妻子：如今被加尔西搬上银幕的《摇篮曲》就是他的作品。或更确切地说，是由他署名的作品，因为实际上那是玛丽亚创作的，像她丈夫的其他所有作品：格雷戈里奥很少创作，也许根本没有创作，这是一个被证实的事实（帕特里西娅·奥康纳、阿尔达·布兰科和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的研究无可辩驳）。

因此她才是众多成功戏剧的真正作者（她的作品在国外上演，在好莱坞被改编成电影），她也是作曲家华金·图里纳^①的《旅行相册》和曼努埃尔·德·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的灵感启发者。此外她还创作了法雅的《爱情魔法师》和《三角帽》的歌剧剧本以及大量的西班牙说唱剧（如乌桑迪萨加^②非常有名的《燕子》）。除了这些成就，她还是散文家、女权主义者、共和国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议员（最早的女议员之一）。战后过着流亡生活，在报纸和电台工作。满百岁前几个月她清醒而活跃，最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那是1974年：也即昨日。可是我们连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当左派开始恢复他们的圣徒，把他们塞进神龛时，她被遗忘了。

玛丽亚1874年出生在圣米连·德·拉科戈亚（拉里奥哈省），长在卡拉班切尔镇（今马德里的一个区），靠近一个孤儿院，父亲在院里当医生，因而她从小就看到贫穷的可怕和苦难。那时候西班牙是一个因循守旧的落后国

^①华金·图里纳（1882-1949）：西班牙作曲家，对促进二十世纪西班牙音乐民族特色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译注。

^②乌桑迪萨加（1887-1915）：西班牙作曲家，以他的西班牙说唱剧著名——译注。

家，顽固地拒绝历史的变化。西方世界的事物在变动，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性开始为妇女要求投票权和发言权，但西班牙继续固守着一个由教皇极权主义的基督教统治阶层强加的主张倒退的女性和家庭观念。比如，迟至1920年，一个类似于第八届“国际妇女参政联合会”（IWSA）这样正常和无害的会议试图在西班牙召开，它是妇女参政的主要国际协会；但最后因政府和天主教协会的正面反对而中止，会议被移到日内瓦。

1870年费尔南多·德·卡斯特罗创办“妇女教育学会”，1876年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①创建“自由教育学会”：这是西班牙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柱。进步人士都知道，没有文化，没有一场把国民从他们的知识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基础革命，就不会有进步：二十世纪初，百分之七十的西班牙人是文盲。对现代化及未来前途的拼命渴望在被称为“1914年一代”的伟大而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身上实现：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阿萨尼亚、克拉拉·坎波阿莫、阿美里科·卡斯特罗、维多利亚·肯特、拉米罗·马埃斯图和玛丽亚·马埃斯图……还有我们的玛丽亚·莱哈拉加，而且她还是教师。所有这些人和其他若干人使这个国家在短暂、耀眼和灾难性的第二共和国时期迈出了几个世纪的跳跃。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社会环境差不多仍是令人窒息的，尤其对妇女来说。1908年耶稣会教徒阿拉尔孔在一本书中说，妇女解放是愚蠢的，“应该立刻把那些复仇女神关进教养所或疯人院”。1927年宗教杂志《和平的彩虹》攻击“里塞乌姆”的会员（其中有莱哈拉加），那是玛丽亚·马埃斯图成立的一个极其庄重的妇女俱乐部，在那里惟一所做的事是参加文化讲座，品茶和学点东西：“如果把她们作为疯子和罪犯禁闭起来，社会就做得很好。将那些古怪和失常的妇女送进医院或关禁闭，街上和家里的道德环境就会有很大改善。”当想到两个神父是基于经验才说出这样的胡言乱语，此话在今天引起的哄堂大笑就变得令人悲戚了：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把不听话的妇女关进疯人院是全世界的一种共同做法。

^①弗朗西斯科·希内尔·德·洛斯里奥斯（1839-1915）：西班牙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教育家。他是克劳泽主义最有影响的倡导者，他所创办的“自由教育学会”是不受政府和教会影响的一个教育机构——译注。

玛丽亚·莱哈拉加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生活和创作。当代人说她是崇拜丑的人；我们现有的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外表可爱的褐色女孩。可能她自己“觉得丑”，特别是与众不同：她有文化，写作，热爱戏剧，说几种语言，受过高等教育（师范），工作。二十三岁时她结交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朋友：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一位邻居的儿子，一个患佝偻病和肺结核的十七岁的矮小男孩（他的五个兄弟都死于杆菌）。他倒确实是个极丑的小伙子：大脑袋，没胡子，一对招风耳朵，一副老鼠的模样。但他喜欢戏剧和创作诗歌、文学。

三年后的1900年，他们结婚了。婚礼之后回到他们的公寓时，两人互相拥抱并高呼：“谁也不能命令我们了！”此时她二十六岁，从事老师工作已五年；但由于是女人，她只能通过婚姻获得独立。至于他，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孩子，也许他从未长大：一个被宠坏又极其孱弱的男孩。翻阅知名女强人的传记，会惊讶地看到她们中有多少人与极软弱的男人结为伴侣！在那些对女性来说艰难的时期，或许这些孱弱的男人是惟一允许妇女发挥她们某一才能的人。

结婚前他们就开始发表作品。莱哈拉加出了一本为儿童写的《短篇故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出版了四部由她创作却署名格雷戈里奥的作品，虽然他可能也参与了最早的某一本书——年轻时他就有诗人的傲慢。婚礼之后一切照旧。他们靠玛丽亚当老师挣的微薄薪水生活，她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备课，收拾屋子。八点去学校，十二点回来，给两人做午饭，下午继续上课；晚上回家后，开始写小说和剧本，之后署上他的名字。她累得只剩下一身骨头。医生给她开处方，要她吃带血的肉，但玛丽亚一口都无法尝试。她的密友胡安·拉蒙·希梅内斯在药店买来空的胶囊，把剁碎的肉塞在里面，然后强迫她将胶囊当药似的吞下。

与此同时，格雷戈里奥却在床上磨蹭到很晚，虽然为公平起见应该说他也并不是完全不干事。看来他一直具有当集体企业的组织者的很大本事；他能够以一种惊人的方式自我推销，甚至能从石头底下挖出钱来。于是凭着这种本事和显著的胆量，他陆续创办了各种文化杂志，最后成立了颇有影响的文

艺复兴出版社。作为经营者，他是西班牙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是玛丽亚在为杂志撰稿，修改清样，掌管财务。

几年后，格雷戈里奥把他做生意的才能用来为自己牟利：他创办了一个演出他自己剧本的剧团，让玛丽亚像炸油条似的一部接一部地创作那些商业性劣作，他如此压榨可怜的玛丽亚，以至于这位年轻时作为优秀的现代主义者、曾是“荣誉和美”的领军人物，后来却被视为一个卖身名利的“文化小商贩”。

这一切都是从《摇篮曲》的轰动性成功（1911年）开始的。但之前已发生了灾难。1906年，格雷戈里奥与漂亮的卡塔利娜·巴尔塞娜——著名青年演员——有染。这段历史如此陈旧，格雷戈里奥显得如此乏味和丑陋，有人倾向于认为他对戏剧的爱好来自于成为企业家的隐秘梦想，以便能与第一号女演员调情（这正是他的所为）。问题是格雷戈里奥征服了卡塔利娜，但出于显然的理由他不敢抛弃玛丽亚。不可思议的是玛丽亚忍受着。她非常痛苦，1909年曾试图自杀（她在巴塞罗那跳海，被一名男子救上来），但是她忍着。玛丽亚默默地为格雷戈里奥创作，默默地与卡塔利娜分享他，默默地忍受女演员粗野而卑鄙的残酷行为——卡塔利娜对那位比自己老，比自己丑，从不说什么，却不可能摆脱的情敌怒气冲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自己理解她），因为**玛丽亚是她情人的一部分**，而且是对他最有吸引力的那部分——对应于才华、金钱和成功的那部分。玛丽亚构思创作的剧本是为使巴尔塞娜在舞台上出彩，可以猜想，卡塔利娜对这样的成功大概有点反感。所有这一切都带有某种病态的东西。

这种不可能的状况持续了多年，直到1922年，卡塔利娜与格雷戈里奥有了一个女儿。那时玛丽亚才终于与格雷戈里奥分居，前往法国生活；但继续为她丈夫创作，继续保持沉默，直到最后。格雷戈里奥写给妻子的信是可悲的：向她索要稿子和更多的稿子，仿佛她是一部机器。他不仅要剧本，而且要报刊文章（他二十篇二十篇地向她约稿），讲座，甚至讣告（如一篇致卢卡·德·特纳逝世的讣闻）^①。他剧团的提词员多年后声明，“我们剧团所

^①卢卡·德·特纳（1861-1929）：西班牙ABC报、《白与黑》杂志及西班牙新闻出版社的创办者，是保守的保皇派，1893年当选议员——译注。

有人都知道写剧本的是堂娜玛丽亚，堂格雷戈里奥连给家人的信都不写”，那正是格雷戈里奥留给人的印象。

此外他还给人留下傻瓜的印象，如当他吹嘘：“我思考了很多，与许多人谈过话。我到处留下一个如此伟大和牢固的个人威望，只要凭这些我们就足以拥有可靠的成功。”或者如1931年西班牙刚宣布成立共和国，当高尚的玛丽亚充满社会热情和责任时，他已变成一个文化商贩，从好莱坞来信请求她赶紧寄给他“你能想到的所有情节，你不用担心原创性或细节变化：因为影片是给全世界看的，所以制片厂恰好偏爱基本的主题”。

1930年在他旅行之前，为了让玛丽亚能领取版税，格雷戈里奥签署了一份私人文件（并秘密保存），在上面声明“我的所有作品是与我妻子合写的”。当然，合作之事纯粹是一种委婉措辞：几个月前，在玛丽亚有点生病期间，格雷戈里奥在一封信中对她说：“我正在为写作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直到你好起来。我相信我迟早会成功。我逐步失去对话的羞涩，因为我想我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读它。”

在西班牙内战和其后的流亡悲剧中，格雷戈里奥和情人去了阿根廷，彻底抛弃了玛丽亚，不给她寄作品的稿费。玛丽亚在法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躲避纳粹（德国人迫害西班牙共和派人士），饥饿，贫穷，因两眼患白内障而几乎失明。1945年，一些朋友设法找到了她，把她带到美国；也找到了格雷戈里奥，强迫他履行自己的义务。格雷戈里奥寄给玛丽亚很少一点钱，还有若干封充满自怜和自辩的信。1947年他回到西班牙，两个星期后去世；玛丽亚所著作品的百分之五十版权归属于巴尔塞娜的女儿。

在她七十八岁流亡期间出版的自传《我与格雷戈里奥》里^①，玛丽亚列出了她放弃作者身份的三条理由。她说家人如此冷漠地对待自己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以至于她发誓不再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东西（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但谈到了一个想让自己的生活有点不同的女性所面对的缺乏鼓励）。她补充说，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可疑的名气玷污我名字的清白，在那个时代，它像一个几乎不光彩的悔罪衣落在所有文学女性的身上。”最后

^①1952年墨西哥甘德萨出版社出版，一本今天找不到的书，某个出版商应该再现它——作者原注。

玛丽亚提到了“或许是最强有力的理由”，那就是爱情（或不如说一种极似疾病的爱情观）：“我结婚了，年轻又幸福，那种谦卑的骄傲向我袭来，它支配着所有女人，当她真正爱一个男人时。”她的结论是，既然他们是一对合法夫妻，就给自己的作品署上“父亲的名字”。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玛丽亚没有孩子。我想像她感到自己年纪大了，又不能生育，自然觉得对她的小丈夫有过错（那种常常束缚妇女的深深负罪源自何处？）。然而到她写自传时，她已经历了许多苦难的生活。因此她谈到“谦卑的骄傲”：因为清醒的玛丽亚（她的散文是多么有活力，多么充满智慧）知道，那种态度，是几千年偏见的产物，对妇女是不利的。

有待讲述的是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最夸张和最迷人的部分：从1917年起，玛丽亚开始写散文、女权主义书籍和讲座。所有这些作品署的都是她丈夫的名。玛丽亚遭受格雷戈里奥的背叛，受巴尔塞娜的虐待，从病态的沉默封闭出发她忍受这一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矛盾，并让她丈夫，像一个表演口技的木偶，在作品中公开宣扬和维护她的分析：如果一个男人支持这些分析的话，这些分析会更为有效。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一个狡猾悖论，一个做女权主义讲座并公开揭露那些胡话的格雷戈里奥，事实上他自己正活在这种谰妄中：“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比如其中的一篇散文这么说。

这种清算也在剧本里进行。正如阿尔达·布兰科教授尖锐地指出，一部写于1939年的作品《她母亲的美德对她没用》里的人物，好像在替作者说话。一位岳母指责她的赘夫女婿：“她是你的伴侣，却不是与你同等地位的人……她与你一起思考，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只有你成功了！谁在成功的时刻退去，把所有的虚荣都留给你？谁在她周围制造沉默，以便只听见你的声音？她是那种从世俗梦中觉醒，感到她的权利犹如罪孽的女人；她是那种意识到自己的智慧，却想把它当做一个罪行似的请求原谅的女人。”这些苦涩的话语或许玛丽亚从未在私下说过，却让一个虚构的格雷戈里奥在公共

场合发出。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别歧视就是这样），无论玛丽亚还是格雷戈里奥，他们实际上都是半个人，是被截肢的不完整的人。

玛丽亚是在共和国期间恢复了话语权：她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做女权主义讲座，成为社会主义者，参加 1933 年大选。在她优美的自传《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中讲述了竞选运动：在一个饥饿和破碎的西班牙，它是史诗般的，重大而又激动人心。玛丽亚带着她刚恢复的发言权行走在那些贫穷的村庄，正是用这个声音来告诉妇女（她们是文盲，外表肮脏，衣裙边拖着成串的孩子）应该走出几个世纪的沉默：正是在那次竞选中妇女的选举权被合法化。那是清晰的话语，公平的话语，响亮的话语。但是这一切都被内战、失败和流亡所平息。

玛丽亚在五十年代初出版了前面所说的两本自传。在《我与格雷戈里奥》中她承认自己对那些作品拥有作者身份，尽管她把作者身份仅仅局限在合作上：“现在我年老寡居，为了能够领取我的版权，我被迫宣布自己的作者身份。”虽然在这本书中她对丈夫的回忆是很尊重的，但全世界那些愤怒的骑士还是攻击玛丽亚的**文学企望**，正如安东尼娜·罗德里格在她关于莱哈拉加的那本不可或缺的传记中幽默地说，这些东西是陈旧的男性互助。谁知道，或许那种充满偏见的愤怒有助于再次让玛丽亚保持沉默。让遗忘及糟糕的女性沉默之水重新在她身上合拢。

参考书目

- 玛丽亚·马丁内斯·谢拉：《一个走在西班牙之路的女人》，卡斯达里亚出版社。
- 安东尼娜·罗德里格：《玛丽亚·莱哈拉加》，波萨出版社。
- 比拉尔·涅瓦：《假象，1918-1936 年间的西班牙女剧作家》，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
- 卡门·马丁·盖特为《塞莉亚，她所说的》写的序，阿利安萨出版社。
- 大卫·吉斯：《十九世纪西班牙戏剧》，剑桥出版社。

■ 劳拉·赖丁 最邪恶的女人

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终结”，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逃亡者”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

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那时格雷夫斯已经三十岁，与南希·尼科尔森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作为画家和画家之女的南希，是左派和女权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姓给了两个女儿，把格雷夫斯的姓给了两个男孩），与她丈夫一样，准备嘲笑这个世界。寻找一个新的道德观首先从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开始；整个欧洲的进步青年（我们已经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做着类似的事）决定摆脱资产阶级偏见，**诚实地**享受他们的爱情。于是三角恋，不忠，感情的疑惑和双重性，总之，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源自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琐碎，开始突然变成纯哲学，变成一个先验的空话连篇的沼泽（六十年代末重新出现同样的事）。因此直到那时，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三人家庭**的东西，在劳拉的影响下，变成了宗教的“三位一体”或“圣圈”。

赖丁这样夸张地命名她与罗伯特和南希的关系，即基本上是她与格雷夫斯在楼上一同睡觉和写作，南希和孩子们幸福地居住在楼下，虽然之后的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幸福。这种三角关系和问题在去埃及的旅行中就已经开始：劳拉说他们在开罗住的房子中了魔法，于是大家都开始感觉很糟糕，结果半疯的格雷夫斯撕毁合同，返回英国。是劳拉制造了那种透不过气来的胶着氛围，这是一条她将多次重复的行为准则。

重新回到不列颠，南希曾试图勇敢地适应她在“三位一体”里所分到的那部分（劳拉与格雷夫斯同床，但她的脖子上挂着南希的一张照片），当她无法再忍受下去时，便与孩子们搬到泰晤士河的一艘旧驳船上生活。尽管这样，大

家还是在一起。“现在土耳其人已经放弃了一夫多妻制，而罗伯特决定采纳它，看来这是个不幸。”南希的父亲这样评论说。与此同时，劳拉有时与罗伯特合作，有时单干，不停地创作越来越晦涩、越来越出言不逊的诗歌、散文。罗伯特向他的出版商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推出劳拉以获得他本人的作品，劳拉的这些日见难懂的书才得以问世。劳拉·赖丁的作品只卖出二十五本，最多不过一百本，但在少数不列颠和美国知识分子中间奇怪地保持着一种威望。劳拉是典型的坏作家，那种正因为无人能懂而受人崇拜的艺术家，这样一来她便觉得自己优越，自视为一个了解秘事的团体中的优雅成员。

劳拉主宰着一切。她吸罗伯特的血并降伏南希，把那两人与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熟人隔离开来。她开始组建自己的随从，那些怀着崇拜她的谦恭渴望接近“圣圈”的新朋友。她是一个女神，格雷夫斯是她的神甫。他们这样生活了四年；之后发生了1929年的灾难。由格雷夫斯的侄子里查德撰写的格雷夫斯传记（我所读过的最吸引人的书籍之一）幽默而严谨地讲述了那场惊人的危机。

一切始于劳拉邀请爱尔兰诗人杰弗里·菲普斯来伦敦。她不认识那个诗人：就像格雷夫斯当年的那种情况，占有从通信开始。菲普斯携他的画家妻子诺拉同行，受到“三位一体”全体的接待。他们把诺拉安置在一个旅馆里，给她一瓶白兰地，对她说：“你把这酒喝了，忘掉你的眼泪。”他们把菲普斯安排在家里，在烧掉他所有的物品之后（劳拉说他的东西被他妻子污染了），赖丁把他变成自己的情人。罗伯特心碎欲绝，但还是顺从地接受了这种状况。至于菲普斯，他已经为劳拉像邪教教义那样有磁性的强大谵妄所吸引：“我已从一种无意识和无幸福的状态进入一种有意识的幸福状态。”在“圣圈”的头几个星期菲普斯如是说。与任何宗教导师一样，劳拉承诺在取消自我中获得个人的拯救：那是一个吞吸一切的可怕又迷人的黑洞。

尽管如此，三个月后，菲普斯的一部分，最健康的那部分，让他跑出来并逃离伦敦。劳拉疯了（更加疯了），她命令罗伯特和南希去找他。他们最后在法国找到了他：他与诺拉在鲁安^①的一个旅馆里。一天早上，他们三人

^①法国塞纳河流域重要的港口城市——译注。

出现在那里，劳拉提了一个建议：他们没有把诺拉包括在“圣圈”里是错误的，现在也准许她加入，不再是一种四人生活，而是一种美妙的五人生活。但是诺拉拒绝了，劳拉便跺脚躺到地上。

诺拉和菲普斯逃往爱尔兰。劳拉通过邮局给他寄用过的公共汽车票，扭曲的金属丝，还有巫术。最后派罗伯特把菲普斯硬拖到伦敦。在那里，整整一夜，在他们四人之间进行了一场折磨人的辩论：他怎么可能愿意出走；怎么可能拒绝劳拉；怎么可能不想继续与她正在合写的作品（赖丁与她所有的男人合作从事妄自尊大的文学创作）。天亮时劳拉发觉自己对菲普斯已失效，认为那是魔鬼的胜利（她是善，不爱她就是献身于恶），她优雅地坐在窗台上，看着他们三人说，“再见，朋友们”，就从四楼纵身投向空中。罗伯特从楼梯上跑下来，跑到三楼时他也从窗户跳下去了。菲普斯也跑着离开，但没有停顿：他穿过临街大门，消失在远处。至于南希，她是惟一能保持一定镇静并通知警察的人。

罗伯特只是磕伤，但劳拉的四节脊椎粉碎了，脊髓撞到了体外。令人惊讶的是，与所有预后相反，她不仅没有死，甚至没有瘫痪。这使得她神圣的狂妄加大了：她是神奇的，神圣的，为了他人的罪孽死而复活了。与此同时，菲普斯和南希相爱了（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菲普斯成为“维多利亚式花园”这种理智得无聊的事情上的一个权威）。格雷夫斯试图向一个朋友解释这种状况，他的话无疑来自劳拉，让人隐约窥见她论据的纠缠不清：“那个疯子杰弗里死了，同样那个太理智的杰弗里也死了。于是诞生了半个杰弗里，即杰弗里－与－南希。劳拉可以很喜欢这个新的杰弗里－与－南希，但现在她是作为劳拉，而不是劳拉－与－杰弗里来创作。至于他，他生活在驳船上，而不是公寓里。他作为杰弗里，而非杰弗里－与－劳拉来写作。”

这次事故或曰新生之后（取决于如何看待此事），罗伯特和劳拉搬到西班牙帕尔玛·德·马略卡岛上的德亚城一所小宅生活。住在德亚的那几年（1930－1936）是劳拉帝国的鼎盛时期。赖丁以她费解又富于启发的话语，以她鼓舞人的不连贯歌声，像美人鱼把可怜的水手吸引到礁石上那样，把一

群理想主义青年男女、脆弱的艺术家吸引到她那里，在知识和情感上折磨他们，要求他们对她无限的崇拜。这个时期照片上的她令人恐怖，她用古代马略卡人的服饰装扮自己，珠光宝气，戴着一个用希腊文拼写着她名字的金冠（“她犹如一位赫梯女王”——她的牺牲品之一、作家、后来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汤姆·马修斯这么定义她），一个永恒的、天使般善良的微笑弯曲了她女巫的细薄嘴唇。与此同时，格雷夫斯每天把早餐送到她床前，给她卷香烟，给她传口信，送她大量的礼物。她已经不再跟他同床（事实上她已把性当做肮脏之物公开放弃了），待他如一条狗。

劳拉 1901 年生于纽约，是一个贫穷的波兰犹太移民的女儿：三个可怕的时代污点，永远给她打下了一种社会自卑感的烙印。她父亲是一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想把女儿变成一个罗莎·卢森堡^①式的活动家，劳拉从他那里继承了拯救世界的渴望（以及为此必要的信念）。从她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个更加引发混乱的遗传：一个赖丁多次提及的**可怕秘密**，好像是对疯狂的恐惧，同时可能又是一种诗歌和先知的天赋。劳拉惟一的兄弟在一个精神病院里度过了半辈子，母亲则是一个古怪的人：她以为自己视力有毛病，在家时用一只白色的、出门时用黑色的长筒袜绑在眼睛上。

有关劳拉·赖丁的资料很少，黛博拉·贝克 1993 年出版的传记很重要。这是一项扎实和出色的创作，它惟一的缺点是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劳拉的作品，试图连贯地解释她语言丛莽的胡言乱语，而不是从她疯狂得势不可挡的发展以及那种疯癫对这么多人具有悲剧性吸引力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反映了存在于所有人内心的混乱，因为我们所谓的疯狂不是我们身外的某种东西，而是人类一贯有的成分（不同的也许只是比例，平衡）。

赖丁的诗歌很奇怪，有时令人不安而又有启示性，尤其是那些青年时期的作品。劳拉觉得自己与世界不同，她想让世界变成她那样，为此她使用语言。另一位和她一样的现代主义者詹姆斯·乔伊斯，也是有点精神失常的很恶毒的人，他于 1922 年出版了一部看不懂的小说《尤利西斯》，而它却变成

^①罗莎·卢森堡（1871-1919）：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和鼓动家，在建立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斯同盟中发挥主要作用——译注。

了受崇拜的作品，这部小说把它的作者从一个可能边缘化和痴癫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但赖丁没有那个运气：世界不愿倾听她不同的声音。所以她不得不躲避在个人小空间的建造中（如德亚王国），并在她的与世隔绝中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她首先计划做《卜尔加塔》^①，一部大百科全书，用它来重新定义所有现存的观念；几年后她决定潜心于她的**宏伟工程**——编一部字典，因为重新创造词语就是重新创造世界。当汤姆·马修斯说读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听一个热烈渴望被人听见的人，但他发音的缺点太大，以至于无法让人听懂”时，他以感人的敏锐概括了赖丁的悲惨命运。与此同时，劳拉还实施另一项计划——起草《第一条议定书》，一篇完全痴癫的宣言，在文中说历史已经结束，预言通过妇女来拯救世界。最难以置信的是英美两国几十名知识分子居然在《第一条议定书》上签了名——因为他们正经历着世界末日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随时有爆发的危险，历史确实好像已经永远结束了。劳拉的追随者以为她能够制止战争，这点概括出赖丁的那些虚幻话语的力量和签名者的需求程度。

其中一位签名者是斯凯勒·杰克逊，美国诗人、《时代》杂志的文学评论家。斯凯勒，一位头脑倾向盲信的人（他在八年间追随一个亚美尼亚的**宗教导师**），是一个与劳拉相似的人物。他的朋友们把他视为天才，但他处于社会的边缘，靠当农场主与他的妻子基蒂和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互不相识的斯凯勒和劳拉开始了一种通信关系，老步骤重新展开。1939年劳拉决定与格雷夫斯及两个朋友搬到美国。他们去斯凯勒的农场生活，劳拉与他在一间房子里关了两天。出来时她宣布：“斯凯勒和我做爱了。”贞洁阶段宣告结束。

汤姆·马修斯叙述，环境逐步又染上噩梦的骇人沉重。气氛渐渐变得白热化。一天下午，斯凯勒的妻子基蒂发作了。她把头靠在桌布上，哭了起来；然后带着孩子们来到田间，企图掐死十二岁的大女儿。她被穿上拘束衣带走。劳拉宣布她是个巫婆，强迫所有人在一个净化仪式上把基蒂的个人物品烧毁。孩子们也被告知他们的母亲中邪了，她在举行黑魔法的可怕仪式。

^①《卜尔加塔》（*Vulgate*）在西班牙语里的原意是拉丁文《圣经》，为天主教所承认的惟一文本，译于公元四世纪——译注。

劳拉的恶毒达到最为恐怖的水平正是在这一时刻——她毁了可怜的基蒂（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长期经受电休克疗法）。她折磨基蒂的那些孩子。格雷夫斯的孩子过去也受到她残忍的忽视和虐待。

那是终结的开始。赖丁在斯凯勒身上找到了她的鞋楦，一个像她那样盛气凌人和精神失常的人。斯凯勒强迫劳拉与她所有的朋友断绝关系，包括格雷夫斯。格雷夫斯之后与一位理智的姑娘结婚，回到理性人的世界。赖丁和斯凯勒也结婚了；三十年间他们离群索居，生活悲惨（他死于1968年，她死于1991年），两个人埋头编撰的那部永无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著名字典，自然永远也没完成。劳拉为斯凯勒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首诗：他毁了她（她也毁了他）。

与赖丁分手七年后，格雷夫斯出版了《白色女神》，一篇以劳拉为灵感的内容丰富和优美的神话散文。1960年他仍深受自己回忆的影响，于是给作品增加了一个后记：“任何诗人都是通过他与一个女神附身到一定程度的女人的经历来获取灵感。”这位伟大作家把她定义为一个女神的化身，无疑对劳拉来说是一个胜利，但对我来说，劳拉代表的不是神性，而是深刻的人性。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

参考书目

- 里查德·格雷夫斯：《罗伯特·格雷夫斯》，艾达萨出版社。
- 罗伯特·格雷夫斯：《白色女神》（第一、二卷），阿利安萨出版社。
- 黛博拉·贝克：《极端主义的劳拉·赖丁生平》，格罗夫出版社（纽约）。

■ 乔治·桑 圆满

巴尔扎克称乔治·桑为“贝里的母狮”，当然乔治·桑符合那种大猫的模式：她是一种畜力，一个强大和不驯服的生灵。年轻时她被视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尤其是因为她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样乌黑，那双大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肖邦说“她炽热的目光把我的心放飞”）；但她最大的魅力在于另一种美：她的正直，她的智慧，她慷慨的激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品质变得愈发明显，因而乔治·桑/奥洛尔·迪潘越老，她的吸引力越大，也赢得了越来越深厚的友谊，像古斯塔夫·福楼拜和小仲马的友谊。桑的确甚至千方百计保持肉体的诱惑力，例如她在六十岁时，与一位比她小二十二岁的画家、英俊的乔治·马查尔，分享了一段强烈的性关系。她一直是个极其自由的女人。

那种内心完全的自由无疑来自她的勇气和智慧，但**能够**做到这点也幸亏她正好生活在一个适合变化和进步决裂的历史时刻（像一百年后波伏瓦**可以**是波伏瓦，而仅仅半个世纪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则**不可以**）：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艺术、工业、贸易和意识的自由。这是时代的标记”，维克多·雨果的话定义了这场运动的精神。雪莱 1814 年出版了关于生活的散文，要求爱情的自由。虽然几年后世俗常规重新获胜，但那时与旧准则斗争，或更确切地说，与一切准则进行斗争，因为当浪漫主义者就是处于永恒的进化、永恒的追寻、永恒的学习中，因此旅行和旅行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乔治·桑生于 1804 年，她如此现代和大胆的生活自然引起丑闻和排斥。但面对社会主体的谴责，她总是拥有她同伴的支持：艺术家，知识分子和进步读者。她并不孤单，她能在他人的目光里得到承认，这一点划定了边缘化和一

体化之间、镇定与疯狂之间的分界线。于是，乔治·桑得以在她的同仁中称王，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却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被人理解的怪物。

桑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奇特，包括她的出身。从父系来说她出身于一支高贵的私生子族系后裔：她的曾祖父是一个公爵，波兰国王弗雷德里克·奥古斯托的私生子，但被承认了身份。但是桑的母亲来自民间：她在士兵营里当过妓女。正是操此业时她认识了乔治的中尉父亲。他们相爱了，在桑出生前二十天他们结了婚。她三十一岁，他二十六岁。青年军人的贵族家庭对这桩婚礼感到气愤。

五年后，父亲从一匹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脖子。迪潘祖母想留下奥洛尔（这是桑的原名），她答应如果儿媳离开，把女孩留给她，就付给媳妇一笔赡养费。奥洛尔哀求母亲不要卖了她，但那女人接受了协议，去了巴黎。乔治留在诺昂，留在祖母在法国贝里地区拥有的一座漂亮的祖居，梦想着母亲有一天会回来把她带走。可母亲从未这么做。

奥洛尔在诺昂未加驯服地成长，阅读图书馆里的所有书籍，穿男孩的服装以便能在附近长时间骑马，从少年时起就创作情感小故事。十七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庄园；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想自由，但那时母亲却坚持要照管她，可能因为现在她是一个相对富有的女儿。在桑的一生中，尽管她很不愿意，但还是常常被卷入肮脏的经济官司中。也许正因如此，产生了反作用，她一直很不看重金钱：她自己是一个十分俭朴的女人，靠一点点钱就能生活，但对他人却无限慷慨——支付她的孩子、她的情人、她过去情人的费用；资助她的朋友、她的政治斗争的伙伴（她是共和国、无产阶级和法国十九世纪各种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及所有向她求助的人。尽管如此，或正因此，她的经济相当脆弱。诺昂的开销比收入多，可怜的乔治·桑曾经历过真正艰难的时期，不得不毕生都在匆匆写作（她的全部作品共有一百零五卷）。

为了能够摆脱母亲的监管，奥洛尔十八岁时与卡西米尔·杜德望、一个一文不名的青年男爵结婚，并很快与他生了一个儿子——她心爱的莫里斯。卡西米尔不是一个坏人，但是冷漠、乏味透顶。他整天打猎，酗酒，根本不理解他的妻子，甚至有一天当众扇了她耳光：虽然那是轻微地，但受到侮辱

的痛苦是一样的。奥洛尔苦恼，晕厥，觉得自己要死了，她想自杀。她那被动的、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没有意义和实质。“如果不是为了儿子，”她写道，她“已经自杀了”。很多年里，忧郁症的危机缠绕着乔治·桑，那是一种时髦病——强烈忧伤的袭击，自杀的冲动。

在乔治·桑奄奄一息的抽搐中出现了奥雷利安，一个年轻法官。他们很快相爱了，但奥洛尔不想背叛自己的丈夫，她把关系维持在柏拉图的领域里：许多热烈的话语，许多绝望的牵手，大量浪漫的眼泪。一天卡西米尔突然走进客厅，撞见奥雷利安跪着哭泣。乔治发誓自己是清白的：“既然您相信您眼睛看到的東西，而不相信我对您所说的，我完全明白您不爱我了。”她怀着被伤害的尊严对丈夫说。她这样说有双重理由：因为事实上她的确没有与奥雷利安同床，还有，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爱情就是在欺骗面前装糊涂，不看对方实际上是什么人，而是看他说自己是什么人，看他扮演我们的欲望判定给他的角色（跟一位女演员，一位男演员一样）。

对所有这一切，对像一个伟大真理那样痛苦的爱情悖论和激情谎言，乔治·桑懂得很多。她拥有一种热烈和慷慨的恋爱能力（“我不能，也不愿无爱地活着”），并大量运用它。在这一点上，如同在所有事情上，她希望作为人，能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变得更加幸福，更加懂得恰当的爱。但她成年生活的头几年却是混乱而紧张，冲动的激情起伏波动。

在她生下女儿索朗热（据说父亲是一个叫斯特法尼的人，她的第一个情人）之后，奥洛尔立刻与卡西米尔分手，去了巴黎。那时她二十六岁，身无分文，因为丈夫得到了诺昂庄园、孩子及她所有的一切。她刚到巴黎就说，“我驶入文学的风暴海洋，应该生活。”她开始在报纸上撰稿。为了省钱，她着男装（灰色的大礼服，呢子坎肩，领带，帽子），并见识了1830年大革命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她身边围着青年艺术家和活动家，他们去剧场，在政治和文学沙龙里讨论，在咖啡馆里抽烟，凌晨两点在喧哗的小酒店里进晚餐，吃雏鸽，喝红葡萄酒。她爱上了一个十九岁的文学青年，朱尔·桑多，与他合写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罗莎和布兰科》，署名朱尔·桑，获得很大成功。

到第二部小说《安蒂亚娜》时奥洛尔已经与朱尔分手，独自创作。她开始署名乔治·桑，从那时起她就永远是乔治了：连她的孩子和情人都这么称呼她。

采用一个男性别名是十九世纪女作家中的惯常手段。她们以此来寻求保护女作家的身份和社会声望（**博学的妇女**是不被人看好的），同时还可以从公众那里得到一种没有偏见的阅读（**小姐们**写的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一种次要文学）。另一方面，那时的世界充满性别歧视，通常的社会和文化语言妇女是享用不到的。当乔治·桑在《马略卡的一个冬天》里以第一人称叙述她的回忆时，她把自己看做一个青年男子，这是因为她可以这样描写自己，比如像“受无法驯服和任性的自立怪癖的驱使”：若从那时代狭隘的女性人格出发，这是会显得突兀和不可能说出来的一句话。结果，虽然她所有的读者都知道她是个女人，但为了使她的文学不怪声怪调，她得继续以男性的口吻写作。

总之，桑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甚至在她的私生活里也用乔治一名。不是因为她想变成一个男人，而是因为她没有被包括在模式里的一类女人。她是另类：骑马，爬山，在步行去乡间郊游时，穿着男装在露天一个人睡觉。桑知道鉴于性别的社会陈规是荒唐和局限的，所以她一心炸毁它们。例如在《一个旅行家的信札》一书中，跟她其余的作品一样，也是以一个男性的口吻来写，这位叙述者甚至说：“我是一个诗人，即实际上是一个女人”，对暧昧和出格自圆其说：是假装男子的女士坦白自己为女性。

桑的所有作品都是从那种强烈的个人自由的观念出发创作的。出版后立刻获得成功的《安蒂亚娜》，写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的故事，她与头一个情人试试运气，不合适，最后在一个皮条客身上找到幸福。这个故事显示了时代决裂氛围的一个大胆主题。桑立马成了一个名人，一个奇人，对浪漫主义者而言是一个女英雄，对保守派来说是一种耻辱，一个丑闻。

她继续寻找自己的路，蔑视辱骂和恭维，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总是愿意冒险、尝试和犯错。她什么都干：不停地写作，为收回诺昂庄园和她孩子的监护权与丈夫打官司（与所有预测相反她打赢了官司），拥有很多情人。

她好色，有活力，精彩：“今晚我也希望他来，”她指的是桑多，她在日记里写道，“我被一口一口地、断断续续地弄得筋疲力尽。我站立不住。我感到疯狂的幸福。”总之，她懂得珍惜肉体的享乐。

她与神经质且恶毒的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经历了一场痛苦和著名的激情。与律师、革命家路易·米歇尔一起重申了她的激进意识，学会谈论无产阶级。此间她有过相当多的男人，她的风流韵事是整个巴黎的闲话。人们诽谤她，她依旧无畏，只关注生命的跳动和自己的作品：“写作这个职业是一种强烈的激情，几乎不可摧毁。”她的风格强大，明晰，响亮。一个世纪前她的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夏洛特·勃朗特、乔治·爱略特和屠格涅夫崇拜她，亨利·詹姆斯称她为“伟大的魔术师”，普鲁斯特赞美她语句的优美流畅。今天桑的小说过时了，但她思考性的作品和散文（《马略卡的一个冬天》，《一个旅行家的信札》，《我一生的历史》）仍然保持着一股独特的魅力，充满生命。

三十四岁时桑对自己及对爱情的强制性需要感到厌烦，这种需求使她一个接一个地虚构激情：“总在追逐影子：我烦了。”她渴望一种稳定和平静的爱情，有时她担心自己是否懂得爱。那一刻肖邦出现了，他二十八岁，性格孤僻，患肺结核，对性感到恶心。乔治使他战胜了这种恶心，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乔治·桑对肖邦竭尽全力：照顾他，宠爱他，保护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她来说肖邦变成了她的另一个孩子（“我照管着三个孩子”，她说）。桑与这位音乐家生活了十一年，最后七年她“像处女似的与他和其他人生活”。然而不是她中断了这个关系。据让·沙隆在他撼人的传记中叙述，乔治的女儿索朗热，与一个没有良心的雕刻家结了婚，满身债务的他企图耗尽女作家的财产。当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时，索朗热和她丈夫便竭力诽谤桑，而柏拉图式地爱着索朗热的肖邦，站到了她那边。这样乔治一下子同时失去了女儿和伴侣。对这种结局她感到高兴：“咳，何等的休息，何等的解放啊！一直忍受那个狭隘和专制的灵魂，一直被同情和怕他痛苦死的担心所束缚！”

此外，那时的桑很忙碌，她在巴黎积极参加 1848 年的革命：“我将站在受害者那边，反对刽子手，直到我的最终时刻。”她参与了那么多，以致革

命失败后，她害怕被逮捕，躲在诺昂——那是自我流放的灰暗数月，连在冰冷的夜晚点燃她房间炉火的钱都没有。但正是在那时她认识了亚历桑大·芒索，一位三十二岁的版画家（她四十五岁），她儿子毛里西奥的朋友。芒索是她的生命之爱；《邦比阿尼作家词典》谈到了诺昂男爵夫人宁静的成熟，“虽然坏心眼的人指责她身边有一个年轻高傲的秘书”。那个年轻人就是芒索；他不高傲，而是和蔼和感性。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五年，直到他死于肺结核。

“现在我知道爱老年妇女甚于爱年轻姑娘”，桑在与芒索的初始阶段得意地写道。她有理由感到满足：她很久没想到自杀了，**忧郁症**已从她的作品中消失，她越来越宁静和深沉地爱和生活。这种通向圆满的演变是乔治·桑的最大成就。虽然生存艰难，死神夺走了她所爱的人；虽然身体恶化，革命失败，经济拮据，但桑在理性和智慧中，在一种东方式的深刻平静中逐渐建构自我。“我们又老又丑，”她五十五岁时写道，“芒索发福，毛里西奥秃头，我有一百岁了。如果我们相爱到足以让我们互相觉得漂亮，有什么要紧的？”

虽然失去芒索和她的孙女尼妮让她心碎，但是桑总能够重新创作，重新梦想，重新恋爱：“怯懦不是忘我：那种屈从的人有他好受的。”她自然从不屈从：“我觉得我正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六十三岁时她写道，那时她与年轻的马查尔正保持着一个充满激情的性关系，“对我来说生活总是此时。”她七十岁时还在诺昂冰冷的水流里沐浴，写作，制作李子果酱，定期与福楼拜、左拉、勒南^①及龚古尔兄弟一起出席著名的“半月晚餐”聚谈会，并受到她朋友们的崇拜。“老了真好。这是最好的年纪，是理解力看得最清楚的时期。”

七十二岁时的一天，她得了肠梗阻。两星期里她没有感觉不适，但估计死亡已经接近了。终于疼痛开始了：痛得十分厉害。乔治喊叫着乞求死神，它耽搁了九天才到。总而言之，她的死是一种完美的临终，像她生命的其余部分一样强烈。

但如果她事先知道这个痛苦，勇敢的桑可能会把它作为某种连贯的东西

^①勒南（1823—1892）：法国历史学家，东方语言学家。1883年起任法兰西学院院长——译注。

加以接受。我突然有个想法，她原本会乐意用九天的受苦来报答一种不导致她受损和老迈的晚年，一种直到最后都充实的生活。在病痛开始前三个小时，她在给一个侄子的信里写下最后几行话：“你别担心。我已看到了别人，而且我活了很久，任何意外都不会让我伤心。我相信一切都很好，生与死就是越来越好地死与生。爱你的姑妈，乔治·桑。”

参考书目

- 乔治·桑：《马略卡的一个冬天》，艾达夫出版社袖珍版；《我一生的历史》，帕尔西法出版社；《一个旅行家的信札》，企鹅出版社经典系列（伦敦）。
- 吉恩·查龙：《乔治·桑》，艾达萨出版社。
- 《邦比阿尼作家词典》，奥拉出版社。

■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殉教的渴望

1904年10月21日，一场洪水毁掉了阿尔及利亚艾因·塞弗拉镇子的一半。当洪水退去时，法国驻军的士兵在一个简陋的棚屋废墟中发现了插在烂泥里的女人的两条腿。它们是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尸体的腿，她也叫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还叫马赫默德·萨阿蒂，一位装扮成穆斯林小伙子的二十七岁的瑞士女作家：她精通阿拉伯语，能说会写，皈依了伊斯兰教，属于一个苏菲派教团。

虽然伊莎贝尔·马赫默德死时很年轻，但已足够在她身后积累起一种神秘而奇特的生活。她着男装游历马格里布^①；与贝督因人睡在沙漠里，在沙丘间骑马，白天与 marabouts（宗教领袖）谈论神秘主义，晚上逛遍北非的所有妓院。她的生活古怪，具有双重性，充满痛苦和矛盾。比如，她帮法国帝国主义行政机构征税，但也参加维护独立的示威游行。殖民政府以为她是一个政治煽动者，把她驱逐出阿尔及利亚，但几年后她为法国利奥塞将军^②充当类似间谍的角色。

尽管如此，这位奇女子（她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独特的女人”）首先令我着迷的是她发表在 *Maiden voyages*（《少女的旅行》）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的结束语：“正如我所见，没有比狂热更大的精神之美，那种狂热如此真诚，只能在殉教中结束。”可怕的、使人失去自制的话语，它涉及人类意识的那个黑洞，在那里燃烧着暗杀者的狂热。从第一刻起我就想理解（同样，一个人渴望理解恶的本质）像伊莎贝尔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说出如此的话——以

^①马格里布：公元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向西征服了直至大西洋的北非地区，并渡海占领了西班牙大部，阿拉伯作家把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称为马格里布，一度也包括安达卢西亚。后专指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三国——译注。

^②利奥塞（1854-1934）：法国政治家、元帅，是关于殖民主义具有传播文明的论调的忠实信奉者——译注。

教义为保护并栖身地狱的那种需求，人类如此共同和首要的需求，源自何处？

伊莎贝尔的母亲娜塔莉属于俄国贵族，嫁给了沙皇的一个顾问莫艾德将军，比她大四十岁。1871年娜塔莉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与托洛非莫维斯基，一位中年无政府主义者，永远离开了俄国。托洛非莫维斯基是她孩子的监护人，也是她的情人；他们共同度过了余生（二十多年），但一直秘密保持这个关系。当娜塔莉离开俄国九个月后生下儿子奥古斯丁时，仍然给他取了莫艾德的姓。五年后，1877年，伊莎贝尔降生，她在出生登记上的身份是私生女。因此在五个兄弟里只有她一人遭受异名的耻辱。但更糟糕的是托洛非莫维斯基从未承认她是自己的女儿。伊莎贝尔大概从同母异父兄弟那得知自己是监护人的女儿，但不论她父亲还是母亲都从未告诉她真相。她的出身笼罩在一种居心不良的沉默中，笼罩在一片迷雾里。在她的信件和文章中，伊莎贝尔经常虚构不同的父母，以及关于其出生的不同解释。

母亲娜塔莉患有几乎病态的性格软弱。至于托洛非莫维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流亡中他与巴库宁密切合作，是无政府主义书刊的创办人之一，但之后日渐与世隔绝。他很有文化，出身于亚美尼亚和伊斯兰血统，是个了不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伊莎贝尔继承了这个天赋，她会说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和一点英语），他神秘并患妄想狂。他在日内瓦郊外买了一幢带有一个大花园的乱糟糟的房子（“新城市”），与娜塔莉和五个孩子隐居在那里。“新城市”破旧的花园像一片被杂草侵蚀的丛林，大宅的内部更是幽灵般的空荡，每间屋里只有一两件家具，仿佛前任主人们搬家时遗忘的一些旧破烂似的。这个没有家的家是一个监狱，从未有谁从那里出来：连上学都不去，因为托洛非莫维斯基本人负责教育。大孩子们恨他，一次次地试图逃跑（托洛非莫维斯基命令警察去追他们），直到最后莫艾德家的两个大孩子得以逃离：长子去了俄国，在那要求继承他父亲的遗产，二女儿结了婚，致力于追捕托洛非莫维斯基，控告他性骚扰和遥控指挥毒害莫艾德将军（他死于1873年）。

惊恐、患有妄想狂且陷入穷困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继续盘踞在“新城市”，

与他在一起的有莫艾德家的老三弗拉迪米尔，性格温和而精神失常；老四奥古斯丁，也很不稳定，酗酒并染上鸦片；小伊莎贝尔，托洛非莫维斯基剪掉她的头发，把她当做一个男孩来打扮和对待。此外，这个监护人还从事对仙人掌的照管，他以一种无法向人表达的爱心非常恰当地崇拜这个植物；或许他只对软弱的弗拉迪米尔，他最爱的人，表示过爱心，并与之分享他对仙人掌的爱。许多年后，当可怜的弗拉迪米尔自杀时，不善表达的托洛非莫维斯基用一份电报宣布此消息：“我的仙人掌朋友死了。”他不知道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痛苦。

伊莎贝尔在这种险恶和令人窒息、充满迷雾和莠草、充满沉默和威胁的环境里成长。从很小时候起她就从事写作：短篇小说，有始无终的小说，日记。正像她十九岁时对一位阿拉伯朋友所说，“我（在文学界）成名和获取地位的雄心是次要的。我写作是因为热爱，因为这可能就是我的命运。我惟一的安慰。”她使用不同笔名来署名她的文章，在她的信里假装男人并很快在法国杂志上开始发表。她也很早就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产生了热情。那时宣扬伊斯兰复兴，反对现代西方世界生存空虚的“纳哈达”穆斯林运动正处于上升期：对埃伯哈特来说那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选择，她就是在缺乏准则和虚无主义的环境中长大。少年伊莎贝尔好像在绝望地寻找一些自己的根基，一种身份。沙漠，这么干净，这么清晰，这么缺少隐藏之处，在那里，所有东西必定显而易见，它是“新城市”阴暗混乱的花园、那个被不明之物压垮的童年空间的对立面。

伊莎贝尔十分不幸。不幸构成了她人格的基本部分，是她作为她的一个定义（或许惟一的定义）。十九岁时她在日内瓦的一个照相馆里拍了两张肖像，一张穿得像一个阿拉伯小伙子，另一张是水手像，戴着一顶带有那条假想之船的名字“复仇”字样的帽子。那时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想变成某个人，以那种方式实现我生活的神圣目的：复仇。”伊莎贝尔感到自己生来就被打上了烙印：“我发现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该死，注定要受苦，注定要孤独和绝望。”她想要弥补的就是那点，那种巨大的生存痛苦。

二十岁时伊莎贝尔与母亲进行了第一次北非之旅。她剃光头，穿男装，

自称马赫默德。她以为可以在性别问题上欺骗所有人，但看看那时期她的照片，很难相信会有人把她当做一个男人：她漂亮，厚嘴唇，小巧。或许那时的阿尔及利亚人对外国人的古怪行为太习以为常了，所以假装把她看成她所希望的那种人。在任何情况下，她融入穆斯林圈子无疑都是值得注意的；在一个去沙漠腹地旅行极端危险的时期，伊莎贝尔游历了半个马格里布，没出什么大事故。当然她说阿拉伯语，很了解当地的风俗和宗教，尤其是她渴望与他们融合。她被吸收进最重要的苏菲派卡迪里教团：对一个外国人，尤其是女性来说，这真是个壮举。

她母亲，脆弱的娜塔莉，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不久突然去世。伊莎贝尔痛苦得发疯；她返回日内瓦，正赶上哥哥弗拉迪米尔自杀和托洛非莫维斯基可怕的临终，他患上了喉癌（据说伊莎贝尔出于同情用大剂量的氯醛杀了他）。伊莎贝尔独自回到北非，身无分文。遗产已经花光，在她的余生埃伯哈特逐渐沿着贫困的下坡路下滑，直到落入极端穷困的地步：没有吃的，也没有钱在寒冷的夜晚买柴火；靠她的苏菲教友施舍度日，把钱都花在麻醉品和妓院里。

伊莎贝尔的性征一直引起人们一种病态的好奇。看来她只有穿男装的时候才兴奋，虽然好像也只有男人才吸引她：她喜欢与其他男子一起去逛妓院，但她只是观赏。伊莎贝尔很含混，在她生命的尾声染上梅毒和疟疾。她也非常精神化，过着一种双重人格的分裂生活：早上纯真禁欲，一直追求神秘主义的真理和文学之美；晚上则阴暗，扭曲。她经常在日记里提到自己的**堕落**：“尚无人通过我得以看到我的真实人格，它敏感而纯洁，远高于我择身混迹的堕落的下贱，部分是出于对世俗常规的厌恶，部分是出于一种奇怪的受苦愿望。”不管怎样，她最稳定的关系，如她嫁给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军曹斯里美内（或名叫谢里姆），与之经历四年的爱情生活，显得出奇纯洁和世俗。

据她的传记作者安妮特·科巴克认为，伊莎贝尔是厌食症患者。很可能是这样：那种纯洁的要求，那种绝望，那种与身份和肉体的斗争，是这种疾病的通常特点。对生存的无意义、生活的空虚、实体与非实体的纷乱这些人类常见的痛苦，特别是在我们缺乏令人欣慰的答案的二十世纪，伊莎贝尔怀

有敏锐的体察。但在她身上，那种不安达到了无法让人承受的程度。

在她的激怒和狂热中，在她着迷地坚持填充人生的空虚（那是无法填满的）中，伊莎贝尔让我想起了另一位迷人而又可怕的女人——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①，1943年，在她三十四岁时，她让自己饿死（她也是厌食症患者）。她们俩，各自以其方式，都是才智过人又接近边缘的人。巴塔耶^②说西蒙娜·薇依“散发着某种魅力，既因为她的清醒，也因为她的幻觉思想”，那同一句话也可以用在伊莎贝尔身上，有时她具有显著的知识精确性，有时却迷失在一种不太可能和令人不安的逻辑性里。伊莎贝尔和薇依共有一种有时会在某类女性身上出现的色情受虐狂的忧虑和殉道的渴望：如果形势对她们有利，社会便视她们为圣女（像对胡安娜·德·阿尔科，另一位厌食症患者；现在开始要求封西蒙娜·薇依为圣徒）；可是如果没有运气的话，她们就会被认为仅仅是些神经错乱的人。薇依在论证和风格上更加纯净，而埃伯哈特的文章没有太高的文学质量：过于枯燥，没有实质内容，过度描述，缺乏严谨。她的文章太容易让人想到一篇少年日记；她确实死得很年轻，否则或许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加改进。

伊莎贝尔确信自己是特别的，被困在一个独一无二、也许可怕、也许崇高的命运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天使还是魔鬼。“我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或者我命运的意义是什么，它是从未有过的最奇特命运之一。”最令人奇怪的是，她的生活好像应验了那种放肆的观念：她整个一生充满了神秘和怪异的事件。如她被当做煽动性间谍一事（这使她受到法国当局可恶的迫害，暂时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又如1901年她在卡迪里教团的一位领导人家里遭受的神秘行刺：一个年轻人进来，没说话，砍了伊莎贝尔三刀，一刀在头上，另两刀在一条胳膊上。一条晾衣绳奇迹般地缓冲了头上的那击致命的刀砍，但伤势严重（刀刃砍断了她胳膊肘的肌肉和骨头，她的胳膊永远僵硬了），伊莎贝尔不得不带着巨大伤痛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①西蒙娜·薇依（1909-1943）：法国女神秘主义者，社会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死后发表的作品对英法两国的社会思想影响深远——译注。

②巴塔耶（1897-1962）：法国图书管理学家和作家。其论著、小说和诗歌表现了他对色情、神秘以及反常心态行为的极大兴趣——译注。

一段时间之后，行凶者受到了审判，判决那是一次宗教谋害，因为袭击者属于和卡迪里教团对立的一个伊斯兰教派；可是伊莎贝尔一直怀疑——或许她有理由——有过一个法国同谋的政治阴谋想干掉她。毫无疑问，她对规则的不断冒犯（身为西方人却易装为东方人，一个女人却扮装成男人）影响了她的边缘化和一直伴随她的问题；但即便如此，重温埃伯哈特的传记时，一个人仍会惊讶于她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会问自己，就像她自问：为什么这么迫害她，为什么视她为她不是的那种人，她真的**什么也没干**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她作为行刺对象？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沉思的、边缘的、不活跃的人。但可以说她身份的缺乏，她那种变成任何东西的可塑性（变成男人和女人，西方人和东方人，神秘主义者和造孽者），对其他人来说也起了作用：伊莎贝尔是一个别人用自己的设想将其填满的空白。

在她整个一生，伊莎贝尔·埃伯哈特试图填满那个空白，建立一个可以依靠的教义与盲目信念的脊梁。可奇怪的是，她越是努力**做人**，越是毁灭自我，甚至在肉体上——她在最后的照片里模样可怕。个人的崩溃，不管怎样，或许是一种选择——对她来说惟一可能的选择。她的孪生姐妹西蒙娜·薇依已经说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拥有（因为命运可以剥夺我们的一切），除了说‘我’的权利。那是应该交给上帝，即毁灭的东西。根本没有其他任何允许我们的自由行动，除了毁灭自我的行动。”一句软弱和绝望的话，概括了伊莎贝尔·埃伯哈特，或尼古拉斯·波多林斯基，或马赫默德·萨阿蒂的一生。邻居们说，她小的时候，整天在她童年地狱般的花园里，那天堂花园的对立面——“新城市”花园腐烂和杂草丛生的小路上独自跳舞。

参考书目

- 伊莎贝尔·埃伯哈特：《信件和日记》，埃格拉尔·埃雷拉（编辑），西尔塞出版社。
- 西蒙娜·薇依：《引力与恩典》，卡洛斯·奥尔特加（编辑），特罗塔出版社。
- 安妮特·科巴克：《伊莎贝尔·埃伯哈特生平》，查托&温达斯出版社（伦敦）。
- 玛丽·莫里斯（编辑）：《少女的旅行》，文帖杰出版社（纽约）。

■ 弗里达·卡洛 世界是一张床

对于床在我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不习惯予以它应有的重视。我们生在一张床上，死在另一张床上，我们生命的一半是在床上度过的。床庇护我们的疾病，是我们梦想的穴巢，爱情的战场。是我们最私秘的空间，是我们体内那个动物的首要藏身之处。对弗里达·卡洛——墨西哥女画家、壁画家迭戈·里维拉^①的妻子——来说，床代表了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避难所，刑讯台，圣坛。但弗里达自然是一个受伤的动物。那个永恒的伤口，那个伤得可怕的肉体（常常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变成了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人公。

1954年7月13日，在满四十七岁后的一个星期，弗里达逝世。几个月后迭戈·里维拉把他妻子的家变成了一个博物馆，至今仍可参观。弗里达去世的那张床就在那里（她可能就出生在那张床上，科约阿坎那座漂亮的蓝色房子是她童年的家），是一张带有四根柱子和华盖的大床。有那张床的照片，弗里达最后几年就栖息在那床上。那时床头摆满了她所爱之人的照片，床顶装饰着一块光荣榜，上面有她的伟大英雄：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他们占据着宗教版画的位置。对她来说，他们终于成为一种神。

此外天棚上悬挂着一个纸板骷髅，是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死神的讽刺性备忘录；在华盖的光滑表面曾有过，现仍有一面镜子，弗里达在那镜子里观察自我以创作她著名的和使人不安的自画像。弗里达·卡洛是一位作品不多的艺术家，一生不到两百幅画，并且大部分是再现她自己的形象：有许多目光

^①迭戈·里维拉（1886-1957）：墨西哥画家，其大胆和巨幅的壁画促进了拉丁美洲和美国壁画艺术的复兴。1909年定居巴黎，成为毕加索、布拉克和其他现代画倡导者的朋友——译注。

逼人的半身像和全身出现的主题油画，肢体撕裂，躺在一堆血泊里，脊背敞开：“我画自己，因为我常常孑然一身，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主题。”

为了赋予绝对混乱的生存一种秩序的表象，人类怀有加工自身传记的感人渴望。出于这种愿望，弗里达一直认为她十八岁时因为无聊而开始绘画，之前一场可怕的车祸碾碎了她的腿，压断了她的脊背，她的腹部穿孔。在极其漫长的恢复过程中，她母亲把一面镜子放在床头，她可能就这样开始把自己当做模特。但这不是真的：有一幅弗里达出车祸前一两年的自画像，一幅年轻、粗糙但可辨认的画像，具有同样的姿势，同样的目光。所以她在身体受伤之前就绘画（和自画）了。

这不是弗里达操纵的惟一传记细节：她用心把自己塑造成拥有丰富想像力和极大意志力的人物。结果，她一辈子都说自己出生于1910年，那年正好爆发了萨帕塔^①和潘乔·比利亚领导的著名墨西哥大革命，一场动摇了这个国家旧的寡头政治并采纳了印第安主义的浪漫而悲惨的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弗里达自认为是大革命的女儿，但实际上她出生于1907年。她父亲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犹太摄影师，母亲有一半印第安血统。

尽管如此，卡洛的生活仍富有神秘的巧合，好像她奇怪的命中注定如此。例如她六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很早就遇到身体的伤害：“我记得右腿疼得受不了。”那时她就在床上躺了九个月（通向残废的分娩），躺在那张将成为她生活中心的无所不在的床上。作为生存和苦难的遇险者，她将在那条孤寂和痛苦的小船（那些床单——船帆被发烧汗湿，被鲜血和眼泪沾湿）上航行，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场小儿麻痹症给她留下了更细的右腿和轻微的瘸拐，她像一只瘸腿的小鸟。

十八岁时她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她想学医），这时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他们。那是一次严重的车祸，死了好几个人；据在场的目击者说，那是一次奇怪、缓慢、几乎无声的车祸，有轨电车无法停止，一点一点地，以噩梦的可塑性压碎了公共汽车的侧部。弗里达裸体出现在铁柱中——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某人携带的一瓶涂料洒在她身

^①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1910-1917）南方农民起义的领袖——译注。

上，她全身涂满了金粉，好似一座由肉体、鲜血和金子制作的痛苦的塑像。总之，甚至她的车祸都像一场恶梦，灾难仿佛传染了床上的梦呓世界，那个使她的画作也充满了奇怪而强大的象征物的梦呓世界。

撞车使她的脊梁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骨盖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小儿麻痹症的那只坏脚）。当她母亲得知女儿的状况时，惊异得连话都说不出，一个月里无法去看女儿；患癫痫的父亲病了，二十天后才出现在弗里达的医院。弗里达孤身一人，一具被毁的肉体面对无法忍受的痛苦。车祸发生在1925年9月17日；可以说，弗里达·卡洛那时就已开始死亡，一个二十九年后才在科约阿坎告终的漫长垂死。我们体内都带有自己的死亡，一切生命都是逐渐死亡。弗里达在将近三十年不断和可怕的恶化后，正是死于那次撞车所受的伤。

然而，在此期间她做了很多事。她具有如此的意志力，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生存意愿，以至于两年后，在经历了一身的手术、做牵引、加挂件、穿紧身胸衣后，她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尽管她常常感到疲惫，背部和腿部感到疼痛。“我不得不忍着，因为绝望更糟糕，”她在从医院写来的信里反复说，已经显示了那种使她在别人会死去的地方幸存下来的英雄气概，“我正开始习惯苦难。”

当弗里达回到世上，她开始频繁出没一个左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圈子。在共产党人女摄影师蒂娜·莫多蒂的家里正式把她介绍给迭戈·里维拉，那天晚上他开了枪并打碎了一个留声机。弗里达从第一刻起就喜欢上他，尽管“他吓着我了”。或许喜欢上他是因为他吓着她了。他们随即结婚，在婚礼聚会上画家又开了火，伤到一个客人；弗里达哭着回到父亲家，在那待了几天，直到她的新丈夫去找她。她二十二岁，他四十二岁。

迭戈·里维拉那时已是墨西哥最有名的画家，创作了一些革命题材的巨幅壁画，今天虽然它们仍保持着色彩和笔触的活力，但在它们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风格里已显出有点僵硬；我本人对卡洛的作品更感兴趣。他是一个大腹便便、模样吓人的魁梧男子，长着鼓胀的眼睛和青蛙的脸庞（“你的青蛙—蛤蟆”，他在给弗里达的信里这样署名），可是他在与女性交往时享有一

种无法理解的威望。迭戈有过两任妻子，与所有能弄到手的女人有染。与卡洛结合后继续干这事，让她非常绝望。据说迭戈的知名情人中有演员波莱特·戈达尔和玛利亚·费利克斯。另外他还跟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同床，那次不可原谅的伤害导致他们离婚，但两年后两人又复婚。

此外迭戈是一个无法加以分类的人物。从很多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令人作呕：由于他的空泛，他当主角的渴望，他的残酷。他的政治历程是一种令人厌烦的不连贯；首先属于共产党，随后是托洛茨基派，多亏了他托洛茨基才在墨西哥得到避难权，之后又尽一切可能让共产党再次接纳他（这是在斯大林主义最盛行的那些年），他甚至吹嘘把托洛茨基带到墨西哥的惟一目的是暗杀他：一种不因撒谎而让人不那么反感的吹牛。

但迭戈大概也是一个富有想像力的人，愿意的时候也很风趣，他独一无二，感情丰富。弗里达像是描写一个神、一个原始生灵似的描写他：“他巨大的肚子，光滑和柔软得像一个球体，栖息在他强壮、如柱子般漂亮的腿上……他是一个大洪水之前的生灵，一个亲密的怪物。”对她来说迭戈是一个神话，是童年时那个又好又坏的妖怪，是生活的原则本身。虽然迭戈确实在心理上折磨她，在特别需要他的时刻抛弃她，但在其他时候，他对弗里达是个非常大的帮助，并且从未完全抛弃她，这也是事实。迭戈是卡洛艺术最热烈的捍卫者（“她是比我好的画家”）和最支持她工作的人。说实话，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关系交替充满了甜蜜和残酷。

一开始卡洛对迭戈而言是一个女儿，但在第二次婚姻期间（她给新婚礼施加的条件是他俩之间不再有性关系）角色颠倒了，衰老的弗里达变成了他的母亲。比如，她常常用海绵给里维拉洗澡，白白的、大腹便便的巨人在浴缸里踩水，玩弗里达给他买的漂浮小玩具；最后，在卡洛临终病危期间，当已患有前列腺癌（这是对大男子的一种圣经式惩罚）的迭戈出走几天后回到家时，她在床上叫他：“我心爱的孩子，你来到这里，你想吃一个小水果吗？”六十岁的他用小孩的声音和表情回答“是”。

弗里达很美。或者说不止是美——她很可怕。她长着一双凶狠而美妙的眼睛，一张完美的嘴，粗硬的眉心，一撇看得见的胡子。有一次她剃掉胡

子，迭戈便发火了：从某种形式上说，他俩在次要性别特征上是混淆的，因为他有一对令弗里达喜欢的女人大乳房。弗里达为自己的强势外表增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表演：她一直穿特万纳印第安女人的服装，长裙漂亮极了，衬裙和花边沙沙作响。她用绸缎带子、鲜花和天鹅绒来编头发；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或殖民时期的沉甸甸珠宝来装饰自己。穿衣对她来说是另一种艺术表达；在对镜修饰和画一幅她的自画像之间想必没有很大差别。她在这两种活动中**建构**自我，这是她与衰老的竞赛中绝对需要的东西。因为她的肉体被撞成碎片；在最后可怕的几年间弗里达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我是瓦解。”

弗里达也很看重性并有过众多情人，特别是迭戈和她妹妹欺骗了她之后。弗里达是双性恋（谣传在她的女性恋情中有画家乔治娅·奥基夫^①），但她最大的激情是与男人度过的：雕刻家野口勇^②，摄影师尼古拉斯·默里——她为此人真的失去了理智，还有一位名字不详的西班牙共和派画家，他是继迭戈之后她最重要的经历：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海登·埃雷拉讲述了此事：她的卡洛传记是所有传记中最好的）。此外当老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不久，她也曾与他有过一段短暂关系。之后弗里达回到斯大林主义的怀抱，她的老朋友也将遭她咒骂。当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用一把凿冰的凿子将托洛茨基杀害，弗里达作为嫌疑犯被逮捕（迭戈当时在美国）。有些人认为里维拉夫妇参与了暗杀，但这个指控看来缺乏根据。三个月前他俩的朋友、艺术家西盖罗斯^③倒确实参与了对托洛茨基夫妇卧室的机枪扫射：莱昂和他妻子钻到床下才奇迹般逃生。黑暗的岁月，阴险的态度。

弗里达创作的画很小（而她丈夫制作巨幅壁画），并且一直对自己的作品表现得极端谦卑。许多年里她从未展示自己的画作，如果她变成了一位知名画家，那是多亏了里维拉的推动，他实际上强迫弗里达于1938年在纽约举办展览。那时她认识了超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安德烈·勃勒东，他被那位超现实主义的女画家给迷住了，“但她不知道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1939年

①乔治娅·奥基夫（1887-1986）：美国女画家，以描绘大自然的半抽象绘画著名——译注。

②野口勇（1904-1988）：美国雕刻家 and 设计家，在二十世纪的美国雕刻中最强烈地鼓吹有机抽象形式表现力的雕刻家。早年在日本度过——译注。

③西盖罗斯（1896-1974）：墨西哥壁画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被誉为墨西哥壁画三杰之一——译注。

她在巴黎开画展，差不多被包括在那个美学运动之内。几年后，在斯大林主义的狂热高潮中，弗里达抛弃超现实主义，因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的一种颓废表现”。

弗里达后期成为一个狂热的亲苏分子，何以到此地步？应该讲讲她的经历中最苦涩、最可怕的那部分。无法言喻的折磨，噩梦。弗里达的身体是如何逐渐崩溃的？她的脚溃烂了，她的背弯了，她渴望有孩子，但却不能（她经受了四五次流产，在她卧室里保存着一个装在甲醛瓶子里的无名人类胚胎）。她被挂在器械上，腿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最后几年每天喝两瓶）。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吗啡。她的右腿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简单和冷静地列举她所受的折磨足以令人窒息，好像在亲眼目睹她生活中的恐怖。总之，她的最后几年很可怕。毒品和酒精使她失去理智；她画的少量作品展示出笨拙和错乱的笔触。就是在那时，她更加坚持共产主义信条——弗里达不信上帝，她需要找到某种安慰，给她如此多的苦难、如此多的恐惧赋予某种意义：“我只是复杂的革命机构里的一个细胞”，她写道。她在自己的紧身胸衣上画斯大林的肖像，镰刀和锤子，还有一幅题为《马克思主义将赋予病人以健康》的感人作品——在这幅画里，一位来自上苍的神奇的马克思把兴高采烈地扔掉自己拐杖的弗里达握在手里（那时她的腿已被截肢）。但她最后一幅画是一张西瓜静物画，她在鲜红饱满的西瓜瓢上写道：“生命万岁”。

1953年4月，弗里达的第一次大型画展在墨西哥开幕；她身体状况那么糟糕，主办者以为她将无法出席，但迭戈想出一个主意，把床（那张带华盖的笨重大床）运去，把它安放在展厅中央，然后用救护车把弗里达送去。卡洛就这样出席了她的开幕式典礼，她服用了毒品，脸色青灰，但浓妆艳抹，精心打扮（她坚持**重塑自我**），躺在床上。她所有的朋友都一个接一个地去

问候她：那是一种宗教仪式，就像信徒们为前去亲吻圣女的披风边角而排的一条长队。她躺在自己永恒的床——床上，躺在她苦难的帆船上，用失色的微笑和珠光宝气的手，与所有人告别。

参考书目

- 安德雷娅·凯特曼：《卡洛》，袖珍版。
- 勒克莱齐奥：《迭戈和弗里达》，今日主题出版社。
- 劳达·哈米斯：《弗里达·卡洛》，西尔塞出版社。
- 埃利·巴特拉：《卡洛，妇女，意识形态和艺术》，伊卡利亚出版社。
- 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加：《伟大的蒂娜》，埃拉出版社。
- 海登·埃雷拉：《弗里达，一部传记》，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伦敦）。

■ 奥罗拉·罗德里格斯和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 死神母亲

复制的希尔德加德·罗德里格斯的照片总是显示出一个恬静和胖乎乎的姑娘，一副愚痴女孩不可救药的外表。她是胖，这点毋庸置疑，但她一点也不呆傻，而是相反：她是一个具有超凡智慧的天才少女。至于恬静，我怀疑在她一生中曾否有过真正平静的一瞬间。表象感人，在这个如此隐密和肮脏的故事里更是这样。

1933年6月9日，在希尔德加德的母亲杀害她之前，认识她的人都形容她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快乐的女孩。与她母亲堂娜奥罗拉，一个冷漠和令人反感的女人，完全相反，她在那位出众的女儿身旁根本微不足道。她们倒是总在一起，但如果考虑到女孩幼小的年纪和那个时代的习俗，那根本谈不上令人奇怪。——可怕的事情隐藏到最后。

我猜想事情从堂娜奥罗拉出生时开始，她于1880年前后生于费罗尔镇，是一个有怪人名声的律师之女（她的全家都被认为有点古怪）。奥罗拉没上过学，但从她父亲专门研究乌托邦社会主义著作的图书馆里学到许多东西：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和他的农业合作社，或叫“法郎吉”，所有那些马克思之前的改革家，在十九世纪初试图创造新的社会模式，对一个突然被工业化摧毁的世界的痛苦和垂死给予一个答复。那些阅读使奥罗拉心里冒出一种革命的渴望；从她的疯狂中冒出把自己视为人类拯救者的救世主冲动。

她的一个姐姐单身生下一个男孩，把孩子留给家人，自己去了巴黎。十四岁的奥罗拉对那个孩子付出了全部。从他是个婴儿起就对他说话，给他唱歌，为他弹钢琴。一天男孩突然把手放在键盘上，开始胡乱弹奏像似音乐的

东西。那个孩子就是佩比托·阿里奥拉，当时作为钢琴家获得了国际声誉的著名神童。当最初的成功开始时，他母亲从巴黎回来，把孩子带走，这是让奥罗拉无法原谅的事情：她确信是自己那种痴迷的教育手段造就了佩比托的早熟。这可能是真的；远离了她，佩比托作为钢琴家开始消沉，直至一事无成。——历史上充斥着大量相似的例子，那些从小受特殊方式的培养，以便最大限度地施展他们天赋的男孩和女孩（像波尔加姐妹，出类拔萃的象棋选手）。但奥罗拉解释此过程的方式已经自大得令人忧虑：“我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如何附到这个孩子身上以及他的灵魂如何成型。”这不是描写一种教育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种魔鬼的占有。

奥罗拉已经有了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镇创办一个“法郎吉”的企图，但在与她外甥的经历之后，她设想了一个对她一生来说更加宏伟的计划：她将不满足于改革社会，而是要创造一类新的个人（“我是即将诞生的新人类的曙光”^①）。她将生一个女孩，对她进行特殊教育，使她成为人类的拯救者；因此奥罗拉不再是圣母玛利亚，上帝顺服和被动的工具，而是新救世主的真正创造者。总之，奥罗拉想当上帝。

父母的去世为她提供了一笔足以富裕生活的年金和必要的自由以实施她的计划。她完全冷静地为那未来的女儿寻找合适的父亲，那人好像是一个名叫阿尔韦托·帕利亚斯的冒险家、神甫、海员和作家。奥罗拉与他“毫无快感地”同房了三次，一旦确定自己已怀孕，她便前往马德里。那是1914年，欧洲刚爆发大战。于是当世界陷落时，在那种动荡和末日的氛围中，一个旨在做光明前途之先驱的女孩诞生了。母亲给她取了希尔德加德这个炫耀的名字，意思是“智慧的花园”。

奥罗拉爱自己的父亲，以病态的激情诅咒自己的母亲。她通常仇视妇女，对男性也感到厌恶，虽然在其荒唐言行中还是赋予男性一个优越的地位：在这点上她一直是极端地世俗。如果她希望自己的救世主是女性，那是因为“没人比女人更迫切地需要被拯救了。不管承认这点有多痛苦，这是人类最坏的一点”。她也说过这样的话：“女性通常缺乏灵魂。有些动物拥有比

^①在西班牙语中“奥罗拉”的意思是“曙光”，“晨曦”——译注。

女性更高雅的灵魂。”说真的，在她之前，博学的骑士、高尚的哲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也说过此话，但谁也没有把他们视为疯子。

我想说的是，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妄想狂符合她那时代的偏见和形势。因为是女性而缺乏正规教育的她，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剥夺了女性所有生存空间的一个阶级和一个世纪的典型女儿。当承担自身的女性就意味着**放弃做人**时该如何处之？因为具有文化志向、聪明、独立或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甚至对事物具有自己的观点，这些都不属于女性；但如果你不愿适应那种残缺的女性模式，那你就是一个妓女，一个病人，一个怪物。奥罗拉把这种残忍的冲突解释为幻觉领域：她认为自己所拥有的胳膊和前臂，脖子，锁骨，腿和大脑是“男性的”，她的心脏，乳房，臀部和胯部是“女性的”。混合及变异的她将创造“第一个自由女性”。

奥罗拉以一种狂热的方式投身此事；比如，怀孕时为了不让胎儿受罪，她在床上每小时改变一下姿势；她从希尔德加德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训练她，像训练一个动物似的。所以她坚持跟婴儿对话，让她挑选带彩色字母的桶。不满三岁的希尔德加德就能正确地说话和写字；八岁时掌握了四门语言（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精通哲学和性教育问题（一门她母亲让她从很小时候起就学习的课程，因为她说“女人因为性而堕落”）。十四岁时她投身公众生活，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劳动者联合总会”（UGT），开始在《社会主义报》上撰文；该报的主编安德烈斯·萨沃里特不知道希尔德的年纪就发表了这位女作者的第一篇文章，当他认识她时惊呆了，并断言她会成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三个月后，她被一致推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副书记。那时她已经成名。

在接下来几年中，她的名气逐渐增大，一边不断开展活动；她写文章，在全国召开大会和讲座。当然那是狂热的年代：1931年宣布成立了梦想的共和国，像其他许多西班牙进步人士一样，希尔德也积极参与。但形势越来越艰难。1932年共和国政府开枪镇压了工人的游行，杀害妇女和儿童，把一百名发生冲突的劳动者流放到撒哈拉沙漠。希尔德那时十七岁，刚读完法律专业（虽然仍在上大学，但现在她学医），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怀有越来

越多的疑问。她出版了一本题为《马克思错了?》的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尖锐和博学的批评,因此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青年团”。她又加入“联邦党”,在《大地》上撰写一系列引起强烈争议的批评社会主义者和政府的文章。她甚至收到威胁性的匿名信。奥罗拉后来说就是在那个时候她买了日后结束希尔德生命的那支手枪——讽刺的是这是出于保护她女儿生命的目的。

在那最后一年,希尔德加德成立了“性改革联盟”,出版了另外两本书,在大不列颠、德国、法国闻名。与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①和著名性学家哈夫洛克·埃利斯^②保持活跃的通信,他们被她迷住了,两人都请求她去英国,希尔德加德决定听从他们的建议。英国之行是她结局的导火索。

然而冲突由来已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希尔德加德渐渐厌恶了母亲贪婪的占有欲。表面上她受教育是为了自由,但实际上她是母亲的一个傀儡,一个奴隶。“不从解放自己开始的人就不能想去解放任何人”,她在被害之前不久的一个讲座中说。据说她柏拉图式地爱着“联邦党”的书记,一位叫阿韦尔·贝利亚的年轻律师。但我认为,她是爱上了爱情,爱上了做她自己的可能性。她面前拥有整个人生。

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虽然对公众是隐瞒的,但内里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奥罗拉感到她的孩子挣脱了她;患妄想狂的奥罗拉看到了国际密谋,并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是间谍,想使她女儿堕落,其惟一目的是毁掉她这位母亲。因为奥罗拉一直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对她而言,希尔德从未单独存在过,她不过是个工具,是其创造者巨大光环之柄。接下来,她的最坏担心终于被证实了:希尔德加德告诉她要独自去英国。在出发日期前三天,奥罗拉在女儿床边彻夜不眠,看着她入睡;凌晨天亮时,她近距离朝女儿开了四枪,一枪打在头上,三枪击中胸口,希尔德加德当场被打死,死时只有十八岁。

在审判中,奥罗拉说杀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自己被视为疯子让她非常恐惧,她极力表明自己引以为荣的行为不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杀一个

^①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译注。

^②哈夫洛克·埃利斯(1859-1939):英国散文家,医生——译注。

女儿比生她痛苦多了；生孩子所有女人都行，但杀她们的孩子，不行。”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对此案进行了一场十分政治化的大辩论：奥罗拉冷静并且精心安排的荒唐行为，是不是**正常**？最后，认为她处于大脑功能完全运作状态的愚蠢判决占了上风，因此她被判处二十六年监禁。

在这里我得说明，没有记者兼作家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我正使用的所有资料——我是无法撰写这篇文章的。是法哈多于1987年在《变化16》杂志上发布了精神病学医生吉列尔莫·伦杜埃莱斯和心理学家亚历杭德罗·塞斯佩德斯的发现，他们在西恩波苏艾罗斯找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病历。直到那时人们还以为奥罗拉曾待在监狱里，1936年她从监狱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她的线索。但实际上她的神经错乱变得如此明显，所以1935年12月她被转到西恩波苏艾罗斯疯人院，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她死于1955年。

阅读奥罗拉·罗德里格斯那二十年的住院病历令人悲痛。首先是因为它的文学类型：一个最残酷和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派生物，与其说是一份医生报告，倒更像一份三十页的警察证明材料，把奥罗拉的话以一种显然的冷漠收集在那里。因为在旧式疯人院里，疯子是一个只说疯话，也就是说，讲些无意义之话的人（被我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恰好就在于赋予现实**另一个意义**）。

这份病历还让人逐渐隐约地窥见一个毁灭的惊人过程。在监狱里，奥罗拉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改革家；但在疯人院里，她不过是个听不见、看不见的疯子。精神病症把她日益封闭在虚无的发呆状态中。在头几次采访中她还是惯常的奥罗拉，卖弄学问，废话连篇，以自我为中心，让人恐惧（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仍然执著地渴望创造她自己的生灵，她制作真人大小、带有生殖器和勃起阴茎的玩具）。十年后她几乎不说话了，只是哭泣，并反复说她太受罪了，她惟一的幻想是死在疯人院外面。在她住院的最后五年，她彻底拒绝看精神病医生：“她不愿意来办公室，不愿意和我们有任何接触。”报告重复说。病历的最后一个记录显得很荒唐：“没有改变，除了她痴呆的倾向。”在二十年里他们无法看到她身上别的东西。

阅读这份漫长垂死的医疗复述，不可能不对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感到同

情。但也经历了一种原始的、几乎圣经式的感觉——她值得受到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奥罗拉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一个可恨和令人厌恶的人物。在她病历的头几页以及记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一书中（他是《大地》的总编，很了解这两位女人），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个女人的恶毒心肠：她的极端自私，她的卑鄙，她的狂妄自大，她如何残酷地利用别人为自己牟利。所有这些都藏在一种忘我和奉献的险恶话语之下——我只为我女儿、为造福人类活着。奥罗拉把那种杀人去势、占有欲极强、榨取她孩子生命的吸血鬼母亲的典型推到了最恐怖的极致，纯粹的恶装扮成奉献的爱，一个几乎不可能摆脱的母亲宇宙。希尔德加德试图逃脱，她为此付出了生命。

人们习惯把这个故事的可怕之处集中在1933年的那个凌晨，当奥罗拉把女儿的头击裂。但对我而言，真正可怕的事在前面，十八年幽闭而漫长的折磨，那个被禁闭并屈从于一个魔鬼母亲迷乱念头的女孩。“我不曾有过童年。我需要把它全部用来学习，昼夜不休息”，一天希尔德对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说。奥罗拉密切监视她女儿，不能忍受她与别人说话、娱乐。如果某天她去《大地》编辑部送一篇文章时停留片刻，与记者们开个玩笑，一直在场的堂娜奥罗拉便会僵硬地打断谈话，强迫她离开（有时眼里含着泪）。“母女俩从不互相亲吻”，一个女邻居在审判奥罗拉时说。奥罗拉疯了，越来越疯（希尔德死前一个月曾建议她去看精神病医生）。她以为共产党人在迫害她，女佣与女儿、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要谋反伤害她。在杀害希尔德之前她通宵看护着女儿，但那个女人曾在其他多少个清晨坐在熟睡的女儿床前，用神经错乱者的眼光凝视着她？这正是不祥的写照。

然而对希尔德来说，努力摆脱那个女人，那个有罪和肆意的母亲是非常艰难的！死前一个月，希尔德发表了一篇题为《该隐和亚伯》的文章，在文中她要求恢复那位圣经中的罪犯名誉。该隐是反叛者，强者，激进者，为了自由不得不杀了世俗和压制的亚伯——这清楚地暗示了女儿头脑中正在执行的母亲隐喻的死亡。但奥罗拉以愚笨者特有的按字面意思理解的方式，照直义来看待这篇文章，她扮演起该隐的角色，将女儿杀害。后来她说，当希尔德在《该隐和亚伯》上署名时，她已经签署了自己的死亡判决；奥罗拉对自

己的荒唐行为进行一种阴险的美化，断言她杀害女儿的那天晚上，女儿最后承认她有道理。希尔德已经对准备出走感到后悔，并请求母亲杀了自己：“是你创造了我，毁了我吧，你应该严厉地惩罚我。”

实际上无人知道那天晚上，在那个使人窒息和对外人关闭的家里（餐厅只有两把椅子）究竟发生了什么。奥罗拉跟女儿争吵了十多个小时，试图说服她不走，而且当中无疑从心理和情感上折磨女儿：女佣看见母亲如何把希尔德抱到她腿上，仿佛抱的是一个女孩。现在我想起那个噩梦场景，突然有个想法——结束了希尔德加德生命的那些子弹，归根结底，或许给她带来了解脱。

参考书目

- 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出版者）吉列尔莫·德尔·托罗。
- 费尔南多·阿拉瓦尔：《红色的圣母》，塞易克斯·巴拉尔出版社。
- 拉克尔·阿尔瓦雷斯·佩莱斯，拉斐尔·韦尔塔斯·加西亚－阿莱霍：《罪犯还是疯子？》，科学研究高等理事会（CSIC），《科学史迦里略日志》。
- 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未来夏娃的悲剧》，《变化 16》，1987 年 5 月 11 日。
- 罗莎·卡尔：《在希尔德加德的父亲背后》，《变化 16》，1991 年 12 月 2 日。
- 费尔南多·费尔南·戈麦斯的电影《我的女儿希尔德加德》。

■ 玛格丽特·米德 在风中筑巢

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伟人，二十世纪杰出女性之一。然而她外表却很娇小；二十三岁时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体重只有四十六公斤。1924年她正值那个年龄时，前往位于波利尼西亚的萨摩亚群岛旅行，开始她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米德那么瘦小，鬈曲的短发，蓝色的大眼睛，用功学生的眼镜，小无赖的脸，她像个女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胖了许多。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她像粒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自从1960年摔断一条腿，玛格丽特一直随身携带一根长长的栗木丫叉。看那个时期照片中的她，圆胖矮小到使人无法置信的程度，挥舞着她原始的手杖。这位女人类学家像一个童话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侏儒，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女巫，一个古老的巫婆。在任何情况下，她是一个介于笑话和传说之间、不完全是人的生灵。

值得询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变化：那些隐秘的原因，她内心发生了什么？有些人随着生命的流逝，只是衰老；另一些人，更智慧或更幸运，逐渐成熟；相反，有些人腐败，还有些人，行为失常；所有这些过程常常在人的形体上有一个清晰的反映。好吧，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在年满五十岁，第三次离婚及作为公众人物成名之后，失去了自身七巧板的一个部件，她自己逐渐一点点地散架。

但是要知道那是哪个部件。玛格丽特·米德是一个复杂、隐秘、矛盾、无法缩减到可以简单解释的庞然大物。如果她身上有什么明确之处（几乎全是模糊的），那就是她生活的速度。她在生命中奔走，仿佛在逃避什么：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在到达她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办公室之前，已经写

了三千字。她著有三十九本书，一千三百九十七篇文章，四十三部摄制或录制的作品，在偏远地区进行了十五次田野研究。但是此外，她还在不同的大学任课，当了三十年博物馆保管员，参加各类讲座，领导“营养习惯委员会”（官方机构，后来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像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似的接受了那么多采访，结婚三次，更有甚者，她还生了一个女儿——凯瑟琳·贝特森，也是人类学家。米德对女儿进行密切研究，仿佛她是个豚鼠：“我们从不简单地活着，”凯瑟琳在一本关于她父母的书中说，“我们一直在反思我们的生活。”

总之，米德承受着一种 *horror vacui*，一种对空虚的真正畏惧：她不能忍受突然对她取消一个事先的承诺，一节课，一个约会，不能忍受忽然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那是一个无法穿越的可怕沙漠）。她在大学求学期间与其他姑娘合住公寓（她们成立了一个自我命名为“游手好闲的母猫”小组），当其他女孩聊天说笑时，玛格丽特每天晚上十点整就寝，以便能早点到达第二天，早早起床，干很多工作。

而且她话多，时刻在说话（不能有一分钟的沉默，其间会回荡着不可靠），新颖而高明的演说到老时渐渐变成封闭和自我为中心的独白。但同时她也大量倾听，尤其是在她生命的第一阶段。正是这样，听得多又听得好，她建构了自己迷人的作品：倾听并理解萨摩亚的少女，新几内亚的妇女和儿童，巴厘的当地人。虽然仔细看来，那种述说和倾听他人的双重渴望或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矛盾：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话和别人的话都可以使内心的低语沉默。

米德是她那时代的一个完美女孩，一个二十年代的少女。那是一个大胆和冒犯的时代：妇女剪短了裙子和头发，在乱哄哄的地窖里听爵士乐，喝酒直到失去理智，自由恋爱，当职业飞行员。玛格丽特从不允许自己干任何出格的事，当城市在她周围发出爆裂声时，她严谨地在她那张处女小床上入睡；但她倒是剪掉了那头 1900 年式的浓密和象征性的披肩发（理发师给她剪发时都哭了），她是一代女冒险家里最冒险的一位，是女战士的世界里最身经百战的一位。

在她的两本最有趣和最优美的作品《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和自传《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中，米德以生动的风格讲述了她田野工作的快乐和担忧：女人类学家在热带丛林里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力量，蚊子的折磨，疟疾的间歇性发作（米德一生都发疟疾，一种她在萨摩亚最初九个月逗留期间染上的疾病），或每五六个星期邮件到达时无法描绘的喜悦。在她的文章里米德从不炫耀困难：她是一个老兵，一个女强人，比如她如果得在丛林里行走好几个小时，泥泞都漫到膝盖上，她不会补充说蚂蝗在吞噬她。但很容易想像她所要面对的可怕困境，在偏远和原始的地区长期生活，不懂周围的语言（米德不得不学习几种当地语言，虽然她的敌人认为她说得少而且差），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医生也没有立即救助的可能性。如1929年在新几内亚生活的那几个月，研究仅仅三年前还在交战、杀头、实行吃人肉的那些部落。今天还时常有某个科学家或记者在那个地区的原始森林里失踪。

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学进行了革命。首先因为她普及了这门学科：这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而她知道公开地**推销它**，在报纸上描述有趣的细节，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物。但是她还发展并完善了工作方式（例如运用照相技术），尤其是她提出了以前无人提过的问题。她专注于那时表面上看来是次要的课题：妇女、儿童、种类差异。她从第一本书起成名，但是以三十年代发表的《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掀起了一场革命。此书研究新几内亚三个相对互相接近的部落，在那里性别角色完全不同：在第一个部落，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以一种被动、友善、母性的方式行事；在第二个部落，他们和她们都是进攻型、暴力型的；最后在第三个部落，男人按照西方女性的模式行事（买东西，卷头发），而女人则按照男性模式行事（不修饰自我，是最有能量、最坚定的人）。

米德从所有这一切理智地推断出鉴于性别的行为差异不是天生和不变的，而尤其是文化的；因此玛格丽特以她的著作实质性地推动妇女从性别模式中解放出来（自然也解放了男人）。在那场抗议中，玛格丽特·米德不是孤独的，而是构成了一场广泛的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在环境和遗传的陈旧争

论中，主张文化因素的主导作用。如今则又流行正好相反的观点——生物主义。

她的工作曾极受争议：指控她缺乏严谨，没有充分掌握她认为自己了解的语言，降低了人类学的价值（她巨大的知名度很受人嫉妒），但事实是，尽管她的敌人费力地企图搞垮她，玛格丽特的作品整体上仍然是有启发和有效的。她的确是现代性的一个中心观念的先驱——对差异的评价。因为神及其永恒的法则在十九世纪已经死了，它们继而被极端等级化的白人男性法则所取代；要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能推翻那种权力，呈现差异和边缘——妇女，黑人，其他文化。“每种差异都具有伟大价值，值得重视”，1962年米德在一篇序言中写到。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

“女飞人”玛格丽特从童年时起就置身于永恒的运动中。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女儿：父亲是经济学家，写过五本书，母亲是社会学家，从事关于意大利移民家庭的田野研究，写满了十三本对她女儿行为的观察。米德1901年出生在美国费城，但当她满十六岁时已经住过六十所不同的住宅，吃过一百零七名不同厨师准备的午饭：出于工作原因他们不得不经常搬家；另一方面，家庭可能也不是太稳定。在如此的奔波中，玛格丽特从很小时就致力于成为她自己。例如，父亲看来极端内向，冷淡和沉默；而米德是一个充满激情、易怒、用脚踢门的喧闹女孩。十一岁时她违背不信教的父母意愿坚持受了洗礼；二十二岁时结婚，也违背了家庭的标准，并坚持保留她单身的名字，这在美国是不寻常的，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不平常和大胆的。她坚持做她自己，成为某个重要的人物，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她好像有十分清楚的主见。事实上，她在以一位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

比如，可以说她与年轻的新教牧师路德·格莱丝曼的早年恋爱和婚礼都是计划好了的活动：仿佛有未婚夫，然后结婚，那是米德在那一时刻必须做的事情，以便干净利落地安排她的生活。路德是个好人，也许甚至太好了，对他旋风般的妻子来说过于平静。玛格丽特对他好像没有最起码的激情，他

们作为恋人一起外出时，把时间都花在观察天空上，而不是互相对视（或者像一些二十岁恋人的正常所为，根本不看对方，而是满足其他更加肉欲的渴望）。

米德与一个人类学家私通，欺骗了路德，在一个离婚很不被看好的时代有过三任丈夫，那时她被视为一个有着众多情人的女人。然而男人作为愉悦的对象好像从未在她生活中占据主要角色；谈恋爱时她对同屋的女伴以及她的导师，比她大十五岁的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比对男友更感兴趣。从1955年起直到去世，她与另一个女人类学家罗达·梅特罗生活在一起。1974年她在一次讲座中说，理想的社会将是“青年时期人们是同性恋，中年时是异性恋，老年时又成为同性恋”。但米德可能没有达到任何同性恋的关系：虽然她一辈子都在谈论性并研究它，但这不像是她本人热中的一项活动。她真正的激情是工作；她与丈夫们分享的也是工作——科学探险。她的最后两任丈夫，雷奥·福琼和格列高里·贝特森，都是人类学家，米德和他俩一起从事田野工作。

她最喜欢的是高大、优雅和英俊的格列高里·贝特森。三十八岁时跟他生了她惟一的女儿；1950年应他的请求两人离婚时，米德很难过。但这是因为玛格丽特在生活中过多奔波，不可能待在他身边，“我无法跟随她，她不能停下来”，贝特森以此来解释关系的破裂。而且米德有时非常令人不快；例如她几次打断格列高里在大学教的一些人类学的课（他很腼腆，课上得很差），公开纠正他，跟他唱反调，直到他把课弃交到她手里。她喜欢发号施令，富于进攻性，以自我为中心，让人讨厌；年轻时她把自己兄弟的照片放在她的一位没有未婚夫的女友的床头柜上，成年时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她是使部下恐惧的人：每天都有某个女秘书在一个角落里哭泣。

但同时她也出奇地慷慨、和蔼和注重细节。她的吸引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拥有一群“追随者”，出于对她纯粹的爱，像奴隶似的无条件地为她工作的那些朋友（为她去洗衣店取衣服，帮她采购东西，给她送口信）。那是她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赢得的关爱：她毕生都在汇集一个数以百计的庞大友群，就像是她的家庭，或者她的部落。她喜欢公社生活，与更多的人、更多的伴

侣共同生活，这种事她干过几次；米德从未失去任何人，连她的前任丈夫也没失去。我想说的是，在她整个一生中，她都拖着那一大帮杂乱的朋友，她关照这些关系，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满足他们的需求，差不多定期去看望他们。一项巨大的关爱任务，本身就需要付出整个生命的精力。难怪米德很着急。

但我已经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某样东西被打碎了，她内心的某个东西失常。也许她跑得太快，最终把自己的影子丢到背后：她的精髓，她的平衡中心，她的实质。她有五百位朋友，却近乎像没有一个朋友。随着岁月的消逝，玛格丽特·米德逐渐变成自身的一幅漫画。她话说得越来越多，说出的东西越来越少，听得越来越少。从一个会议飞赴另一个会议，从地球的一个角落飞到另一个角落；她服用安非他明来承受此种节奏，有时连自己身处何地都不太清楚。

比如1977年，米德已年满七十六岁，她前往巴厘、温哥华和巴西旅行。但1978年初她发现自己得了胰腺癌：尽管她一直在四处奔跑，最后还是被死亡逮住了。米德总是习惯于施加她的意志，并且在自身的死亡侮辱面前感到气愤，她拒绝承认患有癌症；但是这当然对她没有什么用处。六个月后米德去世时，还在为她生物学的那个最大背叛而生气。在最后几个星期里，她消瘦了那么多，以至于又和过去的米德相像：同样的大眼睛，小无赖的表情。是那个内心的女囚在冒出头来告别。

参考书目

- 玛格丽特·米德：《一位女人类学家个人和科学的经历》，帕易多丝出版社；《一位女人类学家的信》，布吕格拉—埃姆塞出版社；《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帕易多丝出版社；《萨摩亚的少年和文化》，帕易多丝出版社；《男性和女性》，米内尔瓦出版社。
- 简·霍华德：《玛格丽特·米德，一种生活》，巴兰坦书店（纽约）。
- 凯瑟琳·贝特森：《以一个女儿的眼睛》，莫娄出版社（纽约）。

■ 卡密尔·克洛岱尔 梦想与梦魇

被绑架的卡密尔，囚犯卡密尔。瘸腿而诱人的卡密尔，天才的雕塑家，倒霉和被遗忘的艺术家。这是一位无法生存的女人可怕的经历。她拥有成功的一切条件：才华，聪慧，胆量，美貌。但环境逐渐毁了她。“大自然赋予她的所有那些美妙的才华只起到带给她不幸的作用”，她弟弟、作家保尔·克洛岱尔说。卡密尔是这位法国著名作家的姐姐；极其有名的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的情人。当他们俩，她的弟弟和她的情人，获得轰轰烈烈的成功时，卡密尔却静悄悄地逐渐沉入黑暗中。

卡密尔·克洛岱尔 1864 年出生于法国维尔纳夫，是一位房地产抵押登记官和一个外省女地主的长女，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变成她最大的刽子手。从很小时起卡密尔就与众不同：因为她的瘸腿，她出众的美貌和她灿烂、骄傲、固执的个性。她开始独自雕刻和塑像，没有老师，也没有家庭背景。十二岁时她创作了一组非常抢眼的黏土作品，引起当地艺术家的注意。他们中的一位，布歇，把她介绍给美术馆长。当他看到她的作品时，便问她是否上过罗丹的课。那时少女卡密尔连罗丹的名字都不知道，因此作品的相似是偶然的：在一个学院派常规的创作世界里，他们俩可能共有类似的力量和真实性。要指出的是，在罗丹进入她的生活之前，卡密尔**就是**卡密尔。因为毁掉她的诽谤之一是坚持把卡密尔仅仅视为她情人的一个弟子。

另一个诅咒是她的家庭。她的父亲性格倔强，暴烈，维尔纳夫的家庭生活是一场持续的叫嚷。然而卡密尔设法使自己成为严父偏爱的女儿。也许那种特权地位（她是独裁者溺爱的孩子），使她母亲和妹妹产生了某种类似怨恨的东西：可以说她们俩都恨卡密尔。十七岁时父亲送她去巴黎学习雕塑，

由母亲和其他两个孩子陪同（暴怒的妹妹和保尔），这时事情恶化了。可以想像那位夫人的耻辱，她被迫离开丈夫，放弃她心爱的维尔纳夫，搬到首都，以便可恶的大女儿献身艺术（一件不体面的事）。母亲和妹妹都是很世俗的女人；相反，父亲是自由思想家和共济会会员。

世俗常规和偏见是卡密尔的第三个诅咒。出生在错误的时代和错误的地方。早一点的话她就能像乔治·桑那样以浪漫主义为保护，更自由地生活。再晚些的话就会碰上二十年代的革命。但她生在一个老式和狭隘的外省资产阶级家庭，生在最保守、顽固和主张不变化的时代。那时少数脱离常规的小姐被看做跟妓女差不多。

当卡密尔 1881 年来到巴黎时，妇女被禁止去美术学院学习（直到 1900 年她们才被接纳进创作室，1903 年才允许她们参加对创作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罗马大奖赛”）。但任性的卡密尔在一个学院注册，与三个年轻的英国女雕塑家合租一间画室。她充满激情地不停工作，就像她一生所为（除了在医院）。不久，1883 年她认识了罗丹。他四十四岁，一副托尔斯泰式的俄国人大胡子威严的外表；她十九岁，已知道自己是一个天才，打算征服世界。他们可能很快成为情人；虽然她仍与母亲住在一起，但整天待在他的创作室里（1888 年当得知他们的不道德关系时，母亲把她赶出家门）。十年间克洛岱尔作为学徒在罗丹的创作室里工作。

可以说，在情感领域，这对伴侣的经历陈旧得无聊：罗丹认识卡密尔时，已与他终身的妻子罗西生活了二十年，而他耀眼的学徒永远退居在情人狭隘和半地下的位置。他们从未生活在一起，只是分享了几个假期；彼此庄重地称呼罗丹先生和克洛岱尔小姐。但互相以您相称的事实据说并没有妨碍卡密尔几次怀孕（据说甚至四次怀孕）。不知她是否生下孩子，把他们送入收养或是宁愿流产，但曾经怀孕的事实看来是很可信的。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经历。

如果不能确凿地知晓卡密尔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事情，那是因为她好像很倒霉。她的雕塑创作美极了，健壮又精致（代表作有《华尔兹》、《萨昆达拉》、《命运之神》、《女浴者》等），但她的许多作品已经丢失，其余的散落

在私人收藏和偏远的博物馆里。正如卡密尔的作品处于分散和半遗忘状态，她的传记也充满阴影、未知数和损失。例如，她写给父亲和罗丹的信件都丢失了，仿佛这位女性的命运就是粉碎，毁灭。卡密尔·克洛岱尔的生活犹如沙地上被风抹去的图画。

虽然与罗丹的感情关系看来相当世俗化，相反，他们的艺术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显然他影响了她，但是没有被充分承认，也没有量化的是，她对他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可能很多（他们一起度过的十年对罗丹而言是最富创造力的十年）。有时他们同时创作几乎相同的雕塑，如罗丹的《加莱义民》和克洛岱尔的《手持禾束的女郎》，是谁抄袭了谁？在上述例子中，作品更在她的风格之内。卡密尔与奥古斯特相反，她精致地雕刻大理石，因此在那种材料上制作的作品大概都经过她的手。另一方面，没有署名的作品被自然地归于罗丹，尽管至少有一次后来得以证明那作品是她的。卡密尔还参与了罗丹的无数雕塑（比如已知她至少创作了《地狱之门》的手和脚）。

在与他合作的那几十年间，尽管她从未休止地劳作，以卡密尔署名的作品却很少，她的许多努力被她的老师吸收掉了。没有证据表明罗丹给过她固定工资（像他自己开始谋生时那样：一份学徒工），也没有支付她当模特的酬劳：卡密尔无数次为他摆做姿势，那是一个消耗许多时间并且通常要给报酬的工作。当1888年卡密尔被赶出家门时，是罗丹负责她的房租和花销：一种实际上将她判为**情妇**的屈辱安排，而不是从优厚的薪水中获得公正的自立。

我不是想用这一切来说明罗丹不是一个天才：他是天才，对此毫无疑问。但克洛岱尔也是天才，他俩相识时他是一个已经成熟的男人，而她是一个极富思想的姑娘。甚至在中断爱情关系后，罗丹都可以从那种创造性和那种才华中捞取好处，因此他余生的作品，直到他1917年逝世，主要是在他与克洛岱尔合作的那段时期所产生的题材（也许常常是出自她的想法？）上做些改动。罗丹的确写过赞美他女弟子的信，并把她的作品热情地推荐给评论家；当卡密尔生病时付给她年均五百法郎的赡养费（事实上这是极少的钱）；他也有过在罗丹博物馆献给她一个展厅的想法。当被问及他对女弟子

的评价时，罗丹用这句著名的话回答：“我已经教她在哪里寻找金子，她找到的金子只是她的。”可是从整体上来看这段历史，你无法回避这种感觉，即罗丹利用了女雕塑家；当他支持她时，是出于负疚和某种家长作风。

1893年卡密尔二十九岁，已经不再是十年前那个想征服世界的女孩了。生活逐渐撕碎了她的梦想；罗丹的爱情变成了一种地下的、或许肮脏的例行公事，不管她作为雕塑家多么努力，她自己的才能不被承认：老师的阴影压制住她。所以那年卡密尔与罗丹分手（虽然他们继续见面，一起度假，直到1898年），寻找她自己的创作室。可以设想，从那时起她开始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使她日益陷入穷困，甚至接近真正贫困的边缘。雕塑是一门非常昂贵的艺术：卡密尔借贷，负债，从事工业设计，制作**新艺术**灯；但所获却几乎不能支付原材料，也付不起模特和助手的工资，因此她只好在无模特的情况下工作，所有的事都自己干，包括繁重的打磨。她住在阴暗的、缺乏最基本条件的房子里：冬天缺暖（黏土因霜冻而散架），更缺少体面的衣服：“我没有大衣和鞋子，我的鞋罩完全穿破了。”但她仍在努力，为获得一个高尚的作品，为得到承认，她是何等地尽力。她活着只是为了工作；除了与音乐家德彪西一次短暂而不甚明确的关系外，卡密尔没有再恋爱，她越来越隔绝自我。

保守的舆论和社会把她的创新雕塑列为“石膏的庞然大物”，虽然世纪末若干重要的评论家开始说克洛岱尔是个天才。但那种评价过于少数派，卡密尔依然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罗丹凭借一些比她的作品更加出格的雕塑（正如我们前面所见，也许灵感源自她的想法）大获成功。为什么他的极端性被接受，而她的不被接受？甚至崇拜她的评论家也把她视为一种不正常：“一场有违天性的革命：天才女子”，一人说；其他人称赞她的雕塑，说那是“男性的和强大的”。有一张卡密尔1899年与罗丹彻底决裂后的照片，尽管只有三十五岁，她看上去却又胖又老（看来她酗酒），正在雕刻一座珀尔修斯割下墨杜莎脑袋的塑像：被砍头的那个生灵的脸就是她自己的脸。那时卡密尔已把自己看做一个怪物，一个曾经强大但被男性英雄截断力量和喉咙的戈耳工。

于是“她疯了”，新闻报道这么说。被迫害妄想狂，偏执狂精神病。她所有的失败和强烈的不公正感都发泄在罗丹身上。在一个达到谵妄程度的现实隐喻里，卡密尔以为罗丹剽窃了她的思想，甚至操纵一个阴谋要杀害她。她把自己关在简陋的家里，不见任何人。从1905年起，她把自己完成的所有作品锤碎，以便她的敌人不能占有这些作品。

1913年3月2日卡密尔的父亲去世（她不知道此事：没人通知她），3月10日两个男护士闯进她家，强行把她关进维勒－埃夫拉尔精神病院。他们撞见她蹲在黑暗中，被她打碎的作品残片所包围。卡密尔精神失常了，这点很明显，她可能需要医疗救助。但看来此事出于母亲的报复，因为父亲已死。那种报复是可怕的，可憎的。1915年卡密尔从维勒－埃夫拉尔被转到蒙德韦尔盖，一所离巴黎很远并且当时名声很糟糕的疯人院。尽管她曾不断和动情地哀求，她还是没能从那里出来。1943年死在那个洞穴里。她被关了三十年。

在整个那段时间，卡密尔不停地哀求把她放出来。首先她要求获得自由；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她希望的破灭，她只请求把她转到巴黎的另一家医院，以便离家人更近些。最后她惟一的要求是有人来探望她。不论是她母亲（死于1929年）还是她妹妹路易丝都从未去看望过她。保尔倒是探望她，但也只是时不时地，因为他很长时间生活在国外。保尔是全家对卡密尔最关爱的人；尽管关心她，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是含糊的。事实上是他把她送进医院。另一方面，为什么在母亲死后保尔不释放她或至少给她换家医院呢？卡密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患有针对罗丹的被迫害妄想狂，但除此之外她完全清醒，真的不会伤人，真的无需把她关起来。

虽然克洛岱尔太太在物质上照顾她女儿，但在其他方面她的生硬表现被称为残忍我敢说并不为过。比如她禁止卡密尔写信和收信（除了保尔的或她们的信），以及接待来访。疯人院是个冰冷的地方（“冷得我无法起床”），那里没有任何组织的活动，因此卡密尔整天陷入一种绝对的、死气沉沉的精神不振中。1920年精神病院院长说卡密尔的妄想狂已经缓和了许多，可以尝试出院一次，但她的母亲断然拒绝。于是医生建议至少可以把她转到巴黎，离

朋友和家人更近点，“因为缺少探访对克洛岱尔小姐很有害”。可是她母亲仍然反对：可以想像，她希望女儿离得远远的，远到与世隔绝。1927年蒙德韦尔盖的新院长也同情卡密尔的可怕惩罚，给她的母亲写信请求她来看看自己的女儿，说这事“会给我们的病人带来极大快乐，留给她某种获释的希望”。但这个要求也未被理睬。“（卡密尔）有各种恶习，我不想见她，她对我们伤害得太多”，母亲写信给医生。母亲的报复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社会的——是极端保守的资产阶级在惩罚叛逆者。“指责我独自生活过，哦，吓人的罪行！”1917年卡密尔写道。

在疯人院无人知道她雕塑家的职业：那里她只是保尔·克洛岱尔的姐姐。或一个男人的情人，或另一个男人的姐姐，但从不是她自己：我已经说了，她的命运就是消失。目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保尔·克洛岱尔提供了一张照片和两栏文字，但只给就列在他上面的卡密尔一行话：“卡密尔（1883-1898），罗丹的情人和模特。”请注意，这日期仅仅是卡密尔与奥古斯特度过的那段时期，仿佛在那个关系之外她不曾存在过。她去世十二年后，继承人想收复女艺术家的尸体，把它从疯人院的墓地中取出来，这时他们得知那块地方被翻动过，尸骨已经丢失：因为没了尸骨，卡密尔连块墓地都没有。有一张她三十年代的照片，照片上的她变成了一个憔悴的老妇人，穿着一件特大的大衣，戴着一顶滑稽的帽子，一副悲伤的感人表情。就在那时，她给一位朋友写下这句可怕的话：“我掉进了深渊。这是我生命之梦的梦魇。”

参考书目

- 安妮·里维埃尔：《卡密尔·克洛岱尔，住院者》，新艺术雷神出版社。
- 雷内-玛丽·帕里斯：《卡密尔·克洛岱尔》，加利马尔出版社（巴黎）。
- 安妮·德尔贝：《一位女人》，袖珍出版社（巴黎）。
- 《其他有意义的人》，合集；关于克洛岱尔·德·安妮·伊戈内的散文，泰晤士&赫德森出版社（伦敦）。

■ 勃朗特姐妹 勇敢而自由

作家从哪里提取他所写的东西？他的小说产生于他所知道的东西还是他所害怕的东西？产生于他所经历过的东西还是梦想过的东西？请允许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一个令人不安而又陶醉的故事：这是勃朗特一家三个独特姐妹，三位迷失地生活在一个偏远村庄的腼腆处女的真实故事；孤独地置身于那里的荒原和大风中，那些纤弱少女（夏洛特，埃米莉和安妮）创作了强悍和野蛮的小说，充满光明和黑暗的巨作。像在童话故事中那样，三姐妹最后通过一件奇事获得成功；但在她们的情形中，奇妙之处不在于一个丑青蛙变成了王子，而是几个无人倾听、无足轻重的老姑娘以一种神奇的、响亮的文学声音突然打破了她们自身的沉默。

今天勃朗特姐妹是一个传奇。神话的一部分是最长寿的夏洛特自己创造的，她想在严厉的维多利亚时代法庭面前为她过世的姐妹们的文学**过分之处**辩护，使她们被当做隔绝在一个荒蛮世界里的单纯姑娘，出于纯粹的无知描写她们在周围听到但还无法理解的暴行。就这样，夏洛特把勃朗特姐妹的形象塑造成迷失在荒原里的痛苦生灵，敏感但困惑的小动物。是的，她们有过不幸、孤独和愤怒，她们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经历了这一切。幸运的是在最近五年出现了若干有关勃朗特姐妹的书（特别是朱丽叶·巴克的杰出传记），那些陈旧的评价模式开始被粉碎。

众所周知，勃朗特姐妹的父亲是一个福音传教士，被任命为哈渥兹（在英国北部约克郡）的牧师。勃朗特姐妹在那儿的教区长住宅生活，并在那里去世。至今还可以参观那所房子：墓地旁边一幢阴暗的灰石楼房。至于她们的母亲，七年里生了六个孩子，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随后死于胃癌。无法

忍受的疼痛折磨着她，挨过了可怕的七个月才过世。在长时间的病危期间，极为聪明的大女儿玛利亚，还不满七岁，就在客厅给她的弟妹朗读报纸，为他们解闷，使他们不发出声响。

她们不久就失去了母亲，由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一个矛盾而古怪的人抚养。尽管他是爱尔兰人，又十分贫穷（在那个时代这代表两种耻辱），帕特里克却成功地在剑桥大学攻读了一门专业。他高大，英俊，红头发，蓝眼睛；创作和出版宗教诗歌、教化性散文、书信和政论文章。传说他是一个极端保守的怪物，根本不关心他的女儿。他可能的确是一个受自身直感的煎熬，专横和冷漠的男人；他确实更加关心惟一的男孩布兰威尔，在他的教育上倾注了自己所有的时间和微薄的金钱，而女孩们不得不去上糟糕的慈善寄宿学校，并且从很年轻时起就工作，但所有这些在那个时代都是完全正常的：那时女人根本不被看重。

不寻常的是这个父亲鼓励他的女儿热爱读书，而且不审查她们的阅读（比如她们可以自由地阅读拜伦的作品）。从女儿很小时候起，就与她们讨论目前最迫切的事件，以**严肃**的话题来教育她们，还用许诺的眼光看待她们的写作爱好（虽然只把它视为一种娱乐），甚至赠给夏洛特一个笔记本。帕特里克可能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绝对不是世俗的。“我不否认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乖僻的，但如果我是世上那种安详、平静、明智和专心的男人之一，就很可能不会拥有像我现在所有的那些孩子”，女儿们去世之后他清醒地说。帕特里克认为世界末日随时会降临，他充满怪癖。例如他害怕火，于是教区长住地没有地毯和窗帘，在楼梯平台上总有水桶；他还喜欢武器，通常带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每天早上朝教堂的塔楼射击。他大概是个有点使人害怕的男人。

勃朗特姐妹很孤独，十分缺乏与父亲的亲密，很习惯一种淡泊的生活。1824年她们被送到科恩桥学校，随即不得不忍受那里无法言喻的折磨，毫无抱怨。科恩桥学校是为牧师之女办的一所十分便宜、几乎是慈善性的寄宿学校；帕特里克的钱极少，以为那是教育他女儿的理想地方，便把年龄介于十一岁到六岁之间的四个女儿——玛利亚、伊丽莎白、夏洛特和埃米莉——送

到那里。但学校是一个地狱般的地方。女孩们早上六点起床，在被允许吃早饭之前，要祈祷一个半小时，冻得发抖。她们总是很饥饿，吃极不卫生的、令人恶心的食物，以至于中毒现象司空见惯，整日都消磨在学习和祈祷中；星期天她们得在潮湿的山上越野步行六公里，在一个冰冷的教堂结束行程，从头到脚都湿透。然后是惩罚：控告性的招牌挂在脖子上，用树枝抽打她们。

根据所有迹象，学校的一个老师，安德鲁斯小姐，缠上了玛利亚，并以撒旦般的残忍迫害她；孩子病重时，安德鲁斯小姐野蛮地打她、惩罚她。那场可怕之事永远给作为手无寸铁的见证人的姐妹们留下了烙印，并且无疑增长了她们小说中剧烈跳动的那种对不公正和痛苦的内在认识。科恩桥学校是个屠场，当小女孩子们生病时负责人都懒得通知她们的家人。那时这所寄宿学校的五十三名女生中，一个死在那里，十一个生病离开，她们中的六个刚一到家就死去了。在那六个女生中有勃朗特姐妹。玛利亚死于 1825 年 5 月 6 日，年仅十二岁；伊丽莎白五个星期后去世，年仅十岁。她俩都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帕特里克对科恩桥学校出事的那种残暴方式感到震惊，他立刻把夏洛特和埃米莉从那里接出来。从此除了短期进过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和布鲁塞尔的一所寄宿学校之外，姐妹们都是在哈渥兹接受教育。在那儿她们上父亲的课，做缝纫，阅读，尤其是写作。经过这么多的动荡，勃朗特家的孩子们躲在了幻想中。他们双双虚构平行的世界：夏洛特和布兰威尔创造了安格利亚，主人公是愤怒的萨莫纳公爵；埃米莉和安妮想像出冈德尔，由威严的奥古斯塔·阿尔梅达女王统治。许多年里，他们制作用微型字体（需要用放大镜来读它）写成的袖珍书，讲述他们王国里的故事，那是热情又狂暴，光明又野蛮的地方。如果布兰威尔杀死一个人物或让他结婚，夏洛特在写她自己的历险时就得尊重那个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四个孩子就像神：他们写的事情发生了。那个不真实的王国对他们来说比哈渥兹的生活更加真实。

勃朗特一家完全与世隔绝：他们自给自足，献身于他们的梦想。这绝不是因为哈渥兹是一个了无生气和无人居住的地方。村子位于一个人口众多、

从事纺织业的地区；当勃朗特一家搬来时，那里有四千六百个居民，十年后增加了两千名。哈渥兹的确是那荒凉的草原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村落（教区长住宅是村子的最后一幢房子），荒原里不长树也不长花，那里总是刮着一股扰乱之风；但哈渥兹背对着那片荒漠，专注于工业化最野蛮的那些年痛苦动荡。

哈渥兹的生活条件是可怕的；孩子们受悲惨的工作日劳动剥削（直到1833年才出台一项法律，规定不满十一岁的儿童一周工作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工人们都快饿死了，村里直到1855年才有下水道系统，粪便水在大街上漫流着。肺结核、斑疹伤寒和霍乱成为地方性疾病；哈渥兹是全英国最贫穷和最缺少卫生的地方之一；婴儿死亡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一，人均寿命仅为二十五岁。三分之一的手工纺织者因新机器的采用而陷于失业，另外三分之一被转包雇用；工业革命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和破坏，以至于产生了极端暴力团体——“卢德派”（源自其领导人的名字内德·卢德，一名当地纺织工），他们从事袭击工业、暗杀业主和捣毁机器的活动（如今美国的恐怖组织——“一架轰炸机”在于类似的事，他们袭击与微电子革命有关的目标）。“卢德派”最终被无情地追捕和处决：据说公路上沾满了他们的鲜血。

勃朗特姐妹成长在这个绝望者的世界里。作家从何处提取他所写的东西？——从他对事物、对他周围本质现实的最内在体察中获取。彼时彼处的现实体现在它所有的恶劣里。今天的电视、电影和广告用一种愚蠢和空虚的幸福幌子来装饰我们的日子。但在哈渥兹没有任何那种东西；在哈渥兹，生存或是痛苦地死去，或是饥饿和贫困地活着。也许正因如此，勃朗特一家虚构了安格利亚王国和冈德尔王国；他们宁愿迷失在那片正好从教区长住宅后面开始的荒原，而不愿意接近村子（另外还有一个阶级问题：对富人来说勃朗特一家是穷人，但他们又不愿与那些工人混在一起）。

埃米莉从未放弃冈德尔；事实上她惟一的小说——《呼啸山庄》，世界文学的杰作之一——从氛围和情调上看，都属于冈德尔纪事（她二十八岁时创作了这部小说）。夏洛特倒是在二十五岁时以极大的努力放弃了安格利亚：当她第一次恋爱时奇怪地放弃了自己的幻想世界。她痴迷但却没有回应的激

情对象是她的比利时老师，一个已婚男子（勃朗特全家，大概除了安妮，看来都有病态的痴迷）。埃米莉从未恋爱过；她封闭地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里，一切好像都表明她是厌食症患者。她什么都不吃，像许多这类女病人，她很聪明，自我苛求，坚定而极端。夏洛特虽未达到这种剧烈的病态程度，可以说她一生也接近于厌食；十四岁时她的女友们就发现她“憔悴，像干瘪了似的”。她的饮食很有问题，常常拒绝吃肉，所以一直长得矮小，瘦极了。而且她像那些厌食女病人通常那样，对自己的体形着迷；夏洛特长相偏丑，她自认为“令人恶心”。

她们都患有近视，没有什么姿色，聪明，有文化，傲气，贫穷：在那个时代，这些特征只能使勃朗特姐妹的前途更加暗淡。那时妇女不能进大学，一个正派小姐的就业可能性只有当老师或家庭教师。勃朗特姐妹都曾从事过这两种卑微且报酬差的职业。但她们渴望的是写作。二十岁时夏洛特寄给著名诗人骚塞^①若干首诗，艺术家答复她说这些诗很好，但“文学不能是一个女人的生活目标，也不应该是”。这番评论使夏洛特陷入一次严重的消沉：她知道作为女人，**不该写作**，并努力顺从：“我已力图不仅遵守一个女人应该履行的所有职责，而且要对此感兴趣。我不是一直能做到这点：有时当我缝纫或教课时，我宁愿在写作。”在整个勃朗特一家人中，只有弟弟获准规划一门艺术家职业。家人都宠爱他，期望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伟大的画家。

布兰威尔是失败本身的集中体现。他傲慢，以自我为中心，软弱，他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的堕落。他打算写作，但一事无成。他开始了一门当肖像画家的职业，但九个月后就自认失败了。他找到一份监护人的工作，却因为让女仆怀孕而被赶走；他被雇用为火车站的经理，却因为账目上少了钱而被辞退。他获得另一份监护人的工作，两年后仍被不体面地开除，因为他成了女主人的情人，一位比他大十七岁的已婚妇女，最终又敲诈她。那时布兰威尔已酗酒，染上鸦片，遭受震颤性谵妄和暴躁的猛烈袭击：许多个夜晚他的父亲和姐姐入睡时不知道是否能活到第二天。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布兰威尔让我想起了六十年代的那些“失意者”。不管怎么说，他是浪漫主义时代——

^①骚塞（1744—1843）：英国诗人、散文家，主要由于同早期的浪漫主义运动领袖柯尔律治、华兹华斯结交而出名——译注。

人类在深渊中注视自我（布兰威尔在深渊中注视自己并坠入其中）的那些决裂时代之一，惯于挥霍毒品的创新年代——的产物。例如，在这位年轻的勃朗特的读物中，就有柯尔律治和德·昆西对鸦片的赞美^①。

就是在这充满险恶的最后几年里，勃朗特姐妹自己出版了她们的处女作，显示了她们的决心和刚毅：一部只卖出两本的诗集和1847年的三部小说：安妮风趣的《阿格尼丝·格雷》；夏洛特优美的《简爱》，以及精湛的《呼啸山庄》。她们用笔名埃克顿、埃利斯和柯勒·贝尔署名，任何人，甚至她们的出版商，都不知道作者是三位二十七岁、二十八岁和三十岁的外省姑娘。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反响；《简爱》成为那个时期的伟大成果，虽然评论家们认为作品充满了“男性的粗鲁、脏话和表达的自由”，这最后一个说法像是一种侮辱。评论家对安妮更加咄咄逼人，尤其是对埃米莉，他们觉得她的书“野蛮、粗野和可恨”。

在《简爱》成功之后，夏洛特向父亲坦白她就是流行作家柯勒·贝尔，这让帕特里克满心骄傲。但布兰威尔从未知晓他的姐姐们已经出书了。他得了肺结核，肉体和心理都垮了，1848年9月24日去世，终年三十一岁。布兰威尔死前还将肺结核传染给骨瘦如柴的埃米莉，她在兄弟死后拒绝进食和看医生。三个月后当埃米莉死去时，她憔悴得连棺材也只有四十二厘米宽。那时安妮也受到同一疾病的袭击，夏洛特把奄奄一息的妹妹送到斯卡伯勒^②，因为病人想看海。五个月后安妮死在海边。埃米莉死时三十岁，安妮是二十九岁。

在孤独而绝望中，夏洛特公开承认了《简爱》的作者身份并继续写作。她发表了另外两部小说，《雪莉》和《维莱特》，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无望地爱着比自己小七岁的乔治·史密斯，她英俊的出版商。1854年2月史密斯结婚时，夏洛特寄给他一封冰冷而简短的信——“我亲爱的先生，在巨大的幸福中，就像在巨大的痛苦里，同情的言语大概很少。请您接受我的祝福。”——第二个月她与阿瑟·贝尔·尼科尔斯、在教区辅助她父亲工作的年轻牧师，定了婚。阿瑟·贝尔热烈地爱着夏洛特；虽然开始时她没有落入

^①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和评论家，以《一个英国鸦片服用者的自白》一书著名——译注。

^②斯卡伯勒：英格兰北约克郡北海沿岸一区（自治市），十八世纪成为著名的海滨游览地——译注。

情网，但她听凭他激情的诱惑。也就是说，她爱他是因为他爱她。1854年6月他们结婚，婚姻的头几个月犹如童话故事的一个甜蜜结尾：夏洛特显得那么幸福，对她丈夫那么热情。但1855年1月她病了。看上去她是怀孕了，许多人认为她是因为怀孕而呕吐；但更可能的是她得了伤寒热（勃朗特夫妇的女佣那时患同样的病症去世）。她胃里什么也装不下，人迅速衰弱，3月31日刚满三十九岁就去世了。

勃朗特姐妹在肉体上几乎从没有离开过她们家狭窄的四壁和空旷的荒原，但她们敢于思索，想像，冒犯限制。不管怎样，她们是自由和不驯服的生灵：“是的，我的日子飞快奔向它的终点；/这是我所要求的全部：/生与死时一个自由的灵魂/和忍耐的勇气”，埃米莉在她最后诗作中的一首中写道。

在这么多的痛苦和悲剧中，勃朗特姐妹的一些幸福回忆此刻浮现在我脑海里，仿佛是我自己的回忆：安妮淡然死去的前一天，她在斯卡伯勒，以平静的陶醉欣赏着海上一个辉煌的黄昏；在教区长家的小客厅里，晚上，当所有的人都入睡后，三姐妹熄灭蜡烛，只留下壁炉的火光，她们三人开始围着桌子急速行走，高声虚构她们小说的场景，带着野蛮的气息互相朗诵诗歌，让幽暗的空气充满她们美妙话语的火花。不朽的强大话语。

参考书目

- 埃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命运出版社或艾达萨出版社；《诗集》，托雷莫萨斯出版社。
- 夏洛特·勃朗特：《简爱》，埃斯帕萨·卡尔佩出版社或行星出版社经典系列。
- 安妮·勃朗特：《怀德菲尔庄园的夫人》，胡伽尔出版社；《阿格尼丝·格雷》，换位出版社（伦敦）。
- 朱丽叶·加尔迪内：《勃朗特姐妹在哈渥兹》，帕易多丝出版社。
- 朱丽叶·巴克：《勃朗特姐妹》，魏登菲尔德&尼克尔森出版社（伦敦）。
- 林岛·戈登：《夏洛特·勃朗特》，文帖杰出版社（伦敦）。
- 凯瑟琳·弗兰克：《埃米莉·勃朗特的一生》，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波士顿）。

■ 结语

好了，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女性传记系列的结尾。不是因为没有更多的传记可讲，正相反：你越深入女性渺茫的大海，你会遇到越多的女性：强硬或细腻的女性，辉煌或无法让人忍受的女性，她们都很耐人寻味。历史之河的遗忘之水充满了女性遇难者，我们只需登上船，就能够看见她们。

如果我在此时此处结束，那是因为我自身的疲惫，因为我与她们一起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到了对**我的女人**产生一种祖传的痴迷地步，比如要是我看到一部关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傻电影，片中扮演女作家的女演员范内莎·雷德格雷夫，在一个场景中说她不会游泳，就会令我气愤——克里斯蒂那么喜欢游泳，游得那么好——这真是粗制滥造，我很生气地对自己说。所以这本书到此结束纯粹是一种随意，就像其他任何章节一样任意：选题，顺序。还有许多迷人的女性可讲。例如可以谈女作家简·鲍尔斯，她的一切都是如此神秘，甚至有人怀疑她是被自己的摩洛哥女仆兼情人毒死的；可以讲不可思议的亚历山德拉·大卫-奈耳，第一位于1923年进入西藏首府拉萨的西方女性，她最终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佛教神秘主义者；或者谈不可抗拒的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她自由、强大而又淫荡（只要读读她精美而热烈的小说《中暑》就可以察觉堂娜埃米莉亚是一个激情荡漾到何种程度的女人）。可以讲述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我尚未提到的女性，甚至别的许多我还不认识的女性。但那将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

显然，我也没有讲述这本书里出现的女性的全部。虽然我扩展了一点传记（当它们出现在《国家报》星期天副刊时，受到版面强制性的限制），但不可能把十五个生命的所有丰富和不同的内容全都塞进一卷书里，因此大量

的细节我都没有说。比如我没说弗里达·卡洛有一个镶着钻石的金牙套，总是在盛装场合戴上它（很奇怪我从未见过一张她微笑的照片）。也没提到埃米莉·勃朗特拒绝死亡；她试图在自己面前装作没有生病（去世那天她起床的时间同往常一样，下楼到客厅，开始缝纫），绝望地奋斗到最后。没有说玛格丽特·米德六十岁时外表已很邋遢，又胖又丑，可是旅行时总带着一个小茶壶，用它烧水获取蒸汽，来卷头发；这个不可思议的卖俏细节，我觉得很感人。而且在所有我不曾提及的关于这些女性的事情中，还得加上其他许多我所不知的有关她们的内容。因为每帧小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涵盖一个完整生命：所有传记都不过是现实的一个版本，需要补充的是，在我的叙述中，它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版本。

在《国家报》上发表的这十六篇文章带来了奇怪的反响。比如登出玛丽亚·莱哈拉加那篇文章后，与她侄女结婚的安东尼奥·冈萨雷斯·埃兰斯热情地寄给我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写给玛丽亚的一叠信件的复印件，在这些信中再次证实是玛丽亚创作了那些作品，之后由马丁内斯·谢拉署名。信件的内容很丰富，比如1926年的这封：“胡利奥将交给你一本梅塞德斯·萨阿韦德拉的诗集。我已经答应给它写序了：你马上给它写序，把它给我寄到哈瓦那（原文如此）。最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证实了马丁内斯·谢拉患有一种那喀索斯式的错觉，因为在向妻子索求稿件的同一段里，他为自己的成功而荒唐地洋洋自得。例如在通过邮局收到玛丽亚刚完成的一个作品后，格雷戈里奥对她说：“直到昨天才交给我《应该幸福》。写得好极了。有新的忧虑，洞察心理，对话优美。所以我们的作品现在流行，并将继续流传。我们已经是具有地位的国际作家了。”

这个系列里的另一些章节曾引起某些争议。最受争议的是献给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妻子塞诺维亚·坎普鲁维的那篇文章，由于受牵涉者的地位和地理上的邻近所致，这是可预见的。诺贝尔奖得主的家人和某位研究胡安·拉蒙的学者感到有责任捍卫诗人。格拉谢拉·帕劳·德·内梅斯教授，研究胡安·拉蒙的专家及塞诺维亚日记的出版者（刚出了第二卷，也是在阿利安萨出版社出版的），寄来了一长篇优美的文章，因其篇幅而没有发表，

她的论点可以用她的一句话加以概括：“胡安·拉蒙没有抹杀塞诺维亚，她也没有为他而毁了自己。”在此要表明她的看法（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多种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献给美国女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情人劳拉·赖丁的那篇文章发生的事。没几天《国家报》就发表了格雷夫斯的遗孀贝丽尔（他的第二任妻子）的一封短信，说赖丁不是坏人（“她不比其他人更好也不更坏”），在她周围没有形成任何宗派。但奇怪的是我同时收到了一个很接近赖丁—格雷夫斯圈子的人的一封长信。此人请求我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出于显然的理由”），并且很高兴终于有人“敢”写那篇文章中所谈的事。他补充说：“（赖丁）大概是个巫婆，虽然是一个有显要能量和智慧的巫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的影响效果是长远的，贯穿了几代人。有些人在离开她五十年后还不敢谈论劳拉，另一些人提到她名字时的反应是击木驱邪……但也还有一些捍卫她的人……我不知道是因为遭受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还是因为害怕在来世会发生什么事。的确，尽管她的作品不多，但留下了十二个由她正式任命的文学遗嘱执行人。因此要当心！”不用说这两封信增加了我对劳拉·赖丁阴暗和令人不安的人格的魅力。

这个系列的发表还产生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结果，一些女研究员、女记者、女朋友和女档案管理员开始慷慨地寄给我大量有关女性的资料。我只举几个事例：女作曲家马里萨·曼查多向我讲述了她的前辈们无畏的不幸（如十七世纪的芭芭拉·斯绰兹，历史上为数极少的女作曲家之一，她的流氓父亲兼经纪人为宣传女儿的职业强迫她在一张肖像里摆出裸露乳房的姿势）；墨西哥的“见证”协会寄来一张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的照片：她套在一件衣裤相连的工作服里，看上去瘦极了（请记住她是厌食症患者）；一个名叫“艾达·拜伦”促进男女在数学方面同校教育的机构，它提供了女科学家的一系列肖像。

那个艾达确实是拜伦男爵的女儿，她是计算机领域的一个开拓者：ADA程序设计语言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程序设计语言的创造者中许多是女性，如 COBOL 这个例子）。说到女科学家，在此我不禁要讲述亚历山大城

的伊帕迪娅（370-415）的残酷经历，因为它特别有启示性。伊帕迪娅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她著有几何数学专著和对托勒密规则的评注；发明了一个星盘和一个地球平面球形图等仪器。她是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捍卫理性，拒绝皈依基督教。由于所有这一切，主教西里洛，一个狂热的基督教徒，鼓动百姓反对她，并叫人暗杀了她：把她从车上揪下来，脱光她的衣服，把她折磨致死。伊帕迪娅享年四十五岁。我不知道是造成她死亡的报复性虐待，还是她的著作、她的发明一样也没幸存下来这个事实更令我恐惧。沉默也吞噬了她。

如此吸引我们的他人生活有何魅力？现在流行传记。专家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个文学专业，始于1791年在伦敦出版的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萨穆埃尔·约翰逊的生平》。盎格鲁-撒克逊的作家无疑是这个体裁的权威人士，他们把传记变成一个艺术品。奇怪的是，在西班牙，除了显著的特例外，几乎还没有人从事传记创作：也许我们过于看重自己的隐私，也许我们接受的是顽固私密的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阿拉伯传统）。

前些时候，女作家贝伦·戈佩吉曾对我说，她不喜欢传记，她觉得这个体裁纯粹是搬弄是非。相反，我很喜欢；不是因为能从嚼舌头中得到什么，而是因为它镜子般的特性。我认为阅读他人的生平时，我们在试图向他们学习：传记人物是在生活那片**未知领地**进行侦察的探险者。我们研究他们的历险和不幸，渴望推断出等待我们的那些是什么东西——一个人在胜利和失败面前，在衰老、敌意或损害面前，在他人和自我的死亡面前，如何应对。既然世界的偶然性实质越来越明显，混乱缺乏治标之药（婚姻不会永远长久，等待我们的既无天堂也无地狱，已经没有能适宜安排我们日子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我们需要一张在这么多的空白中指路的应急地图。于是当了解其他人的生活时，我们逐步绘制自己的私人地图：珊瑚礁在哪里，外海和浅滩在哪里，可以撞碎你的岩石在哪里。

生命是一个时间历程；在这路上，岁月逐渐塑造我们，也毁灭我们。或许那是生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明天我会是什么，我会把自己变成什么？这个系列的女性表明，时间的确起作用；生存本身的航行充满风险。有些女人

彻底遇难了，像埃伯哈特或卡密尔·克洛岱尔。其他人陷入一种巨大的毁坏中，但令人尊敬地战斗到底，像弗里达·卡洛和奥托兰·莫雷尔。有一些女性她们的个人发展不能说服我：可以说她们以某种方式内在僵化了，如玛格丽特·米德或西蒙娜·德·波伏瓦。还有其他少数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生命得以改善，使她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成功，优秀的乔治·桑或喜人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这样的例子。

总之，做这个系列，我得以证实自己所描写的这些女性都完全生活在常规之外。例如我在前言中指出的，她们一般都拥有许多比她们年轻好多的情人，也经常有痛苦、沮丧和痴迷，她们中间很多人已接近被社会称之为疯狂的那片无人之地。但这并非是说那些著名的女性必然都是一些疯癫的人，也不是说这十五章的女主人公与她们同时代的妇女毫无关系。恰恰相反：她们的忧虑正是她们自身时代的一种反映。我们不要忘记，在很多世纪里，那些不适应**女性**狭隘角色的女人被判为精神错乱。疯狂到底是什么？不就是你内心的世界观不被社会所接受吗？

例如，1852年1月，当夏洛特·勃朗特经受一次巨大消沉时，医生禁止她写作：认为从事脑力工作在女人身上是不正常的，会引发她们的精神危机。许多年之后，已进入二十世纪，医生们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从未意识到，在那两种情况下，写作或创作是惟一能够宽慰她们的东西）。几个世纪里，社会把妇女禁闭起来，剥夺她们的自由和感觉，已经使她们发疯。这个毁灭过程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例子^①。吉尔曼是一位美国妇女，具有艺术志向，已婚，有一个女儿，1880年她经受了“一场精神危机”。她去看那时美国最有名的专家米切尔大夫，对他说，当她旅行的时候，远离丈夫和女儿，她的病症就消失了，而一回来跟他们在一起，病情就加重。但是米切尔大夫看来根本没有关注她。

埃伦赖希和英格莱虚的著作《为了她们自己的幸福》收录了珀金斯·吉尔曼的话，她这样解释医生给她开的药方：“您要过一种尽可能家庭式的生

^①珀金斯·吉尔曼（1860-1935）：美国妇女运动著名理论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生涯，发表诗歌、短篇小说及社会分析文章。她因发表有关妇女、伦理、劳工及社会等题目的演说而闻名于世——译注。

活。始终与您的女儿在一起（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给女儿穿衣服这一简单的事都令我发抖，让我哭泣）。每顿饭后睡一小时觉。每天只能有两个小时的脑力活动。在您的余生永远别再碰一支钢笔、一支画笔或一支铅笔。”几个月里吉尔曼试图乖顺地听从所有这些建议，但这几乎要了她的命：“我危险地接近失去理智。头脑的垂死变得这样无法忍受，以至于我目光空洞地坐着，把头从一边摇到另一边。”最后，在“一个清醒的时刻”，吉尔曼明白了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想当作家，无法再忍受做妻子的被动命运。于是她离了婚，带着女儿去了美国的另一端，变成一位女权行动主义的先驱，写了一本书，在书中讲述她的经历，她因明智而幸福，不再有精神危机。

这些女性当然不是**正常的**，当然不是。当你稍微了解了那些具体生活，那种隐蔽和缄默的日常工作，你会发现现实与官方的年鉴，与社会的正统观点，与权力告诉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不光指的是妇女，也涉及到许许多多敢于在习俗惯例之外感知、要求和行动的男人。做这个系列，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发现每个生命都是一次历险，是一种对正确事物之局限性的偏离。总之，那或许才是我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正常性是不存在的东西。